劉淇昆 著

八國聯軍之師

西伯利亞
SIBERIA

俄

蒙古
MONGOR

滿州
MANCH

狹西
SHEN SI

山西
SHAN SI

PEKIN

黃河
HOANG HU

山東
SHAN

河南
HONAN

安徽
ANHWEI

江蘇
KIANG SU

浙江
CHEKIANG

福建
FUKKIEN

廣東
KWONG TONG

廣西
KWONG SI

雲南
YUNNAN

四川
SEECHUAN

東京
TONKING

海南
HAINAN

伊犁
EASTERN TUEKESTAN

西藏
TIBET

緬甸
BURMAH

暹羅
SIAM

ANAM

COCHIN CH

THE OPEN DOOR TO CHINA

THE INTFU

FASHODA
COLONIAL
EXFANSI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OOCHOW

POMOSA

HONG KONG

KWONG CHOU WAN

小呂宋

EIGHT-NATION ALLIANCE

時報出版

八國聯軍

乃正義之師

劉淇昆 著

目次

概論 4

奇觀一：中國向全世界的列強宣戰 13

奇觀二：清廷欲盡殺外國使節和洋人婦孺 14

奇觀三：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 16

奇觀四：清軍攻不破一個外國使館 17

奇觀五：中國戰敗是中國之大幸 23

奇觀六：義和團、清軍燒殺淫掠，恣意禍國 46

奇觀七：傳教士恩重如山，中國恩將仇報 68

奇觀八：八國聯軍扶危救難，解民倒懸 104

奇觀九：八國聯軍改造天津的業績 149

奇觀十：中國官民對聯軍感恩戴德 165

奇觀十一：為聯軍竭誠效力的帶路黨 171

奇觀十二：英勇作戰、屢建功勳的華勇營 178

結語 192

附註 195

概論

八國聯軍之戰，是被華人歪曲或誤解最嚴重的一段中國近代史。筆者對這段歷史一句話的概括，就是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八國聯軍爲什麼進軍北京？這次軍事行動的唯一目的是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國外交官和正在被大屠殺的外國傳教士、僑民和華人基督徒。而且，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國正式宣戰[1]，外國聯軍攻占天津，威逼京城，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爲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給這場戰爭起個名字。「八國聯軍」不能作爲戰爭的名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則是顛倒黑白，強姦歷史。國外普遍使用的「中國解救遠征」（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又偏離了華人的視角。若遵循甲午戰爭的命名法，這場戰爭應稱「庚子戰爭」，因爲戰爭發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亂引起。

北京市民架梯子協助八國聯軍攻打京城（照片中的市民比聯軍軍人還多）

庚子之亂，亂自拳匪。「拳匪」是對義和團最準確的稱呼，其首領（李來中、張德成、曹福田、朱紅燈、林黑兒等）及骨幹是一群騙子、流氓、土匪。他們招搖撞騙，聚眾設壇，裝神弄鬼，吞符唸咒，號稱神靈附體，刀槍不入。他們以反對外國傳教、剷除洋人、二毛子（華人基督徒）爲名，聚眾鬧事，爲非作歹。自 1896 年義和團興起之初，殺人、放火、搶劫的記錄便不絕如縷。1900（庚子）年 1 月，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對義和團的本質作了一針見血的概括：「該匪等雖托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只在於糾眾劫財」[2]；義和團「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3]。陝西巡撫端方指義和團「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發洋財之願」[4]。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該拳匪等聚眾設廠，借仇教爲名，燒殺搶掠，擾害地方，並膽敢恃眾戕官，實屬窮凶極惡，法所難容」[5]。中國當代歷史學家侯宜傑指出：「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團民打洋教的對象不僅僅限於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時有大量並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還有官署、官員；其行爲就是搶掠、勒索、敲詐錢財，銀錢、衣物、車輛、牲畜、糧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連犁、磨、鋤和鍋碗瓢盆等粗賤之物也在搶掠之列。綁架人質更是爲了勒索贖金，不遂所願，則『撕票』繼之。焚燒殺人同樣如此，『凡稍殷實者皆目以教民，殺其人而分其財』，『以焚殺爲斂財之具』。」[6] 首先打出「興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可能是打家劫舍的世界紀錄保持者；1899 年 1 個月的時間裡，他平均每天搶劫 3 個村莊。[7]

清廷（西太后）被義和團的騙術所惑，相信義和團「神術可恃」，想利用他們打洋人，譽其爲「朝廷赤子」[8]；義和團遂「奉旨練團」，「扶清滅洋」。「滅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滅之列。洋人、洋婦、洋孩固然格殺勿論，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誅，洋貨、「洋玩意」均在掃蕩之列。義和團殺害外國傳教士、洋人工程師、華人基督徒和他們的家人，燒

教堂，扒鐵路，焚車站，割電線，拔電桿，毀橋樑，搗學校，砸醫院，破郵局，毀機器，沉輪船，燒（西）藥房，搶銀行，搗報館；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一時間，紅色恐怖（義和團「坎字門」紅衣、紅頭巾、紅搭膊、紅裹腿）籠罩中國大地和京都地區。

義和團民一瞥

義和團稱外國人爲「毛子」，華人基督徒爲「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行洋禮等依次爲「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對大毛子、二毛子自然格殺勿論；其餘等而下之的「毛子」義和團亦視如寇仇，輕則毆辱搶劫，重則亂刃加身。時人記載：「當拳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9] 拳匪「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10]「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對華人）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11]（火柴舊稱「洋火」，乃舶來品）。「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

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12] 義和團「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甚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爲尤甚」[13]。「有保定人張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婦女五人，則挖坑倒裁填土，而裸其下體，入一蠟燭，取火燃之，以爲笑樂。又或取婦女，裸其下體，以槍尖入其中，捩機發射，轟然一聲，糜爛而死。」[14]「在天津的匪首……見有姿色婦女，強迫她們習紅燈照，日間陽令學習，夜間恣意姦淫。令人髮指。」[15]「街上行人，見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爲神，生殺任意，無辜受虐者，不知凡幾。」[16] 義和團仇殺的對象還包括當時渴望改革的進步人士：「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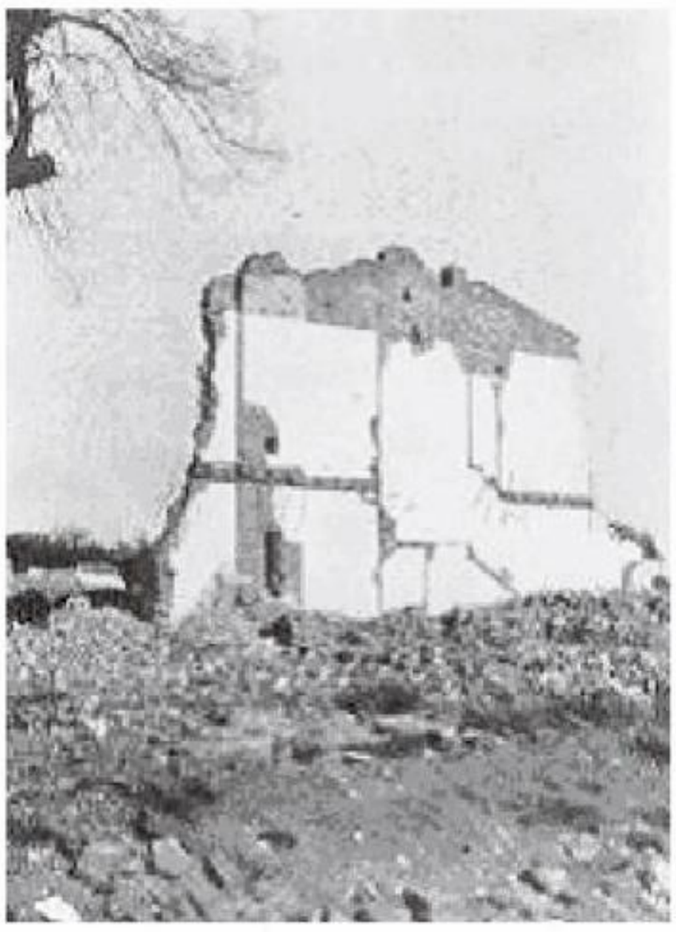
太原大屠殺中遇難的 Farting 牧師一家

被義和團殺害的兩名傳教士 Cooper、Barrett

從 1899 年秋到 1900 年夏，各國政府多次通告、照會，請求中國政府信守它簽訂的國際條約中有關傳教保護條款，平息暴亂，制止仇殺基督教人士和毀滅教堂。最初各國政府單獨照會清廷，例如美國駐華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在 1899 年 11 月，4 天之中（即 11、16、25、26 日）給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出 7 次通告，報告在山東、天津各地針對基督教會的殺戮、搶劫和暴亂，敦促清政府採取保護措施。[18] 到了 1900（庚子）年初，由於義和團的肆意破壞、恐怖殺戮愈演愈烈，各國開始聯合採

取敦促行動。到 6 月之前，不計非正式的外交接觸，各國先後聯合向清政府提出過 4 次正式照會，分別在 1 月、3 月、4 月和 5 月；但是所有的外交努力均歸於失敗。[19]

被義和團摧毀的北京天主教堂



北京監理會教區的斷垣殘壁

6 月 6 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招撫義和團，「欲倚以抵制外洋，爲強中國之計」。6 月 7 日起，在清廷的縱容、鼓勵下，義和團大規模「進京勤王」，旬日之間達 10 萬餘人。「紅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20]。「各處城廂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皆搶掠焚燬一空。」[21] 僅在 6 月 12 日，京城就有 11 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義和團焚燬[22]；教民的居所化爲灰燼，街巷屍骸遍布。「遇教民輒屠其一門」「搜殺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媼，下至二三歲小兒，殺輒付之以火，白晝橫行，莫敢誰何」[23]。「遇天主教及耶穌教均不能放過，俱以亂刀剁之。後又開膛，其心肝五臟俱同豬羊一樣，屍身任其暴露，犬鳥奔吃，目不忍觀。天橋壇根一帶屍橫遍野，血肉模糊」[24]。「單在北京地區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數已在 1 萬 5000 至 2 萬之間」[25]。「拿一女鬼子，釘在崇文門柵欄上」[26]。「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團民要殺，官兵云：『留之，咱們好賣』。後問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

要五分厚肉片者，均爲零割，以快人心。」[27]「北京之流氓強盜，皆與之（指義和團——引者註）聯合爲一，故其勢愈盛……必有人告彼，內城之中，見教堂及洋人，可以隨意焚殺，故均猖狂至極，群大呼燒殺二字，愈喊愈高……如發瘋狂，至於數時不息。」[28]「見洋人就殺，見洋貨就燒，不殺洋人沒飯吃，不燒洋貨氣不消」[29]。義和團更將莊王（載勳）府前的廣場闢作屠場，在那裡一殺就是上千人，人頭滾滾，屍積如丘，血流成渠[30]。僅在農曆六月初四一個早晨，「莊邸門外殺死教民九百餘人……即數歲之小孩亦不免」[31]。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巴黎革命廣場的斷頭臺，殺人最多時每天不過 50 人，哪裡比得上我們中華民族的壯舉！教民既絕跡，義和團便捕斬私仇，濫殺無辜。據時人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伕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32]世界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殘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殺戮在中國首都上演了。《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指出：「北京完全成了一個妖魔鬼怪活動的活地獄」。

殺人不眨眼的拳匪

「殺戮西人，驅逐彼族，可謂不遺餘力」同樣發生在天津；「拳匪盤踞內外，過十萬人」[33]。「是時天津一帶，統被拳匪蟠據……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燬」[34]。「城中自有團匪以來，焚殺任意，搶掠無禁。甚至搶衙署，劫監獄，無人過問」[35]。政府的武毅軍「到處掠奪，目不忍睹」[36]。「天津所有大小耶穌天主各教堂，均已被焚。塘沽碼頭之各貨物及房屋等，亦皆燒燬無遺」[37]。「沿河所見，浮屍甚多，或無頭，或四肢不全。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愴形萬狀，不忍矚目。且有淺擱河邊，鴉雀集喙者。氣味惡臭，終日掩鼻」[38]。天津「六街三市，幾絕人跡」[39]。

天津海河上漂浮的遇難者屍體

拳匪在行兇殺人

血腥、恐怖的滅洋、滅教不僅發生在京津地區，而且發生在山東、河北、山西、河南、蒙古、遼寧、黑龍江、湖南、浙江、江西、陝西、四川、江蘇、安徽、貴州等省。紅衣、香案、神壇散布中國之際，即義和團的屠戮肆虐九州之時。被禍最慘者，除京、津地區外，爲山西、河北、東北以及蒙古（蒙古全境屬於大清國）。義和團的變種在一些地方亦應運而生，如河南的「紅槍會」、四川的「紅燈教」、浙江的「神拳會」等等。北方的外國傳教士、工程師和僑民，歷盡千難萬險、蒙受重大犧牲逃去北

京、天津的公使館、領事館避難；東北的外國人向俄國逃亡；華中、華南的外國人則紛紛向上海或香港逃難。

6 月 10 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西太后派極端仇外的端王載漪出任首席大臣。同日，北京的外國公使館對外通訊斷絕[40]。6 月 11 日，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頭被清軍殘殺、肢解，「先斷其四肢，又割其身體」[41]；並被剖腹取出腑臟，塞入馬糞，棄於路旁[42]（此殘殺受到端王載漪的嘉許）。6 月 17 日，西太后命莊王載勛任步軍統領，會同軍機大臣剛毅、端王載漪及載濂、載瀾等親貴統領義和團[43]，「自是兵匪合而爲一」。「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44]（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6 月中下旬，清廷下令攻殺教士教民」。天津租界的對外通訊 6 月 16 日被切斷。在西太后「迅將紫竹林洋人剿辦」[45] 的命令下，18、19 兩日，清軍及義和團猛烈進攻紫竹林租界和外國領事館。「華兵以極大之克虜伯砲六尊，轟擊租界，自十八號起，接連不斷，絕不稍間，在津西人情形，甚爲危急，房屋被毀不少，美領事署亦在被毀房屋之內。」[46]

清廷於 6 月 16 日至 19 日連續召開 4 次御前會議，「籌議和戰」。18 日的御前會議，慈禧批准端王載漪「請攻使館」之議。19 日，清廷正式決定向「萬國」開戰（清廷戰爭決策的緣起，後文有專門論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俄國、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 11 國的公使館送交了《宣戰照會》[47]（這是當時與中國有邦交的所有國家）。清廷給在京的義和團發放粳米 2 萬石、銀 10 萬兩，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起攻打外國使館[48]。與此同時清廷詔命各省籌款調兵，勤王抗敵。6 月 20 日上午，外國公使團的領袖、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在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的路上，被禁軍「神機營」的軍官殺害；「戮其屍，懸首於東安門」[49]。

下午 4 時整，清軍從使館區北面和東面開火，開始了中國政府軍隊對外國使館有組織的進攻[50]。「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炮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51] 次日——6 月 21 日，清廷發布《宣戰詔書》，詔命全國臣民對西方各國「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各處喧傳開戰諭旨，匪勢愈張，如河決山崩，莫可抵禦矣」[52]。清軍猛烈攻打京城的各國公使館，同時攻打天津的外國領事館，妄圖殺盡各國外交官以及躲在使領館裡的外國傳教士、僑民和中國基督徒。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暴民、這樣的喪心病狂、這樣的人道災難，西方各國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種選擇嗎？

在北京街頭被殺害的
德國公使克林德

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成為一片廢墟

庚子戰爭是中國的國恥。恥辱不是因爲戰敗，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現出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野蠻和狂妄，是中國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此戰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空前而絕後，其奇特之處容筆者一一道來。

奇觀一：中國向全世界的列強宣戰

中國在大規模殘殺外國傳教士和本國基督徒、焚燬教堂、殺害外交官之後，向所有的邦交國家（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宣戰。幾年前的甲午戰爭，一個日本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清廷挑戰全世界的列強，《宣戰詔書》宣稱要對各國「大張撻伐」、「張我國威」，這種愚昧和狂妄，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這場戰爭的奇特之處還在於，清廷雖然對 11 國宣戰，但是那些國家並未應戰，它們只是一再申明出兵中國的人道救援目的，一致表示對中國的戰爭狀態並不存在[53]。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指出的：「列強並未與中國宣戰，只是爲了鎮壓叛亂才派了遠征軍」。這實際上是對戰爭發動者（中國）的變相保護，避免了在正式戰爭中一方可以滅掉另一方，推翻其政府、肢解其國家的前景。

奇觀二：清廷欲盡殺外國使節和洋人婦孺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以「數千年衣冠禮儀之邦」自命的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竟然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殺盡各國外交官和眷屬。戰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中國政府竟公然懸賞捕殺境內所有的洋人：「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54]。西太后曾這樣批覆山西巡撫毓賢的奏章：「予命凡洋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55]。這種殺盡外交官、殺盡洋人婦孺的野蠻、殘酷，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Atwater 夫婦的四個女兒拳亂中在山西慘遭殺害

Davis 夫婦全家 7 月 31 日在太谷遇難

庚子戰爭中，北京所有的外國使館均被摧毀；各國外交官、眷屬及使館庇護的中外人士躲到碩果僅存的英國公使館避難。在清軍的猛烈攻擊下（包括火攻、水灌、炮轟、挖地道爆破），使館內外國人 74 人遇難，其中有 6 名兒童，150 人負傷[56]。在對使館的野蠻進攻中，清軍爭搶外國

人的屍體，因爲憑洋人的人頭可以領賞[57]。對外國傳教士，中國要斬盡殺絕。根據教會保守的統計，241 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其中天主教傳教士 53 人（包括 5 名主教），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 188 人（內有兒童 53 名）[58]，此統計未包括遇難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對以前客死中土的外國傳教士，則刨墳掘墓，剉骨揚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爲椎碎」[59]。中國的基督教教堂大部分被破壞、焚燬。

外國公使館變為一片廢墟

英國公使館內死難者的墓地

以使館、教堂爲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爲瘋狂屠戮對象，政府懸重賞殺盡一切外國人，包括婦孺，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未曾犯過的戰爭罪行。

奇觀三：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

清廷對 11 國宣戰，外省督撫中的頭腦清醒者，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許應騤、袁世凱等，看到亡國之禍就在眼前，「從古無亂民橫行慘殺而可以治國者，亦未聞無故與六七強國一同開釁而可以自全者」，遂發起「東南互保」，公開聲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清廷對外宣戰僅僅 5 天，這些地方大吏策劃的《中外互保章程》即於 6 月 26 日與各國駐上海領事簽訂。該條約明確規定，各地方政府不奉行朝廷的宣戰詔令，並且努力保護外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列強也不得在這些地區啟釁[60]。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等省先後參加了「互保」[61]。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並與各敵國簽約互相保護（清朝內地 18 省，12 省與敵國互保），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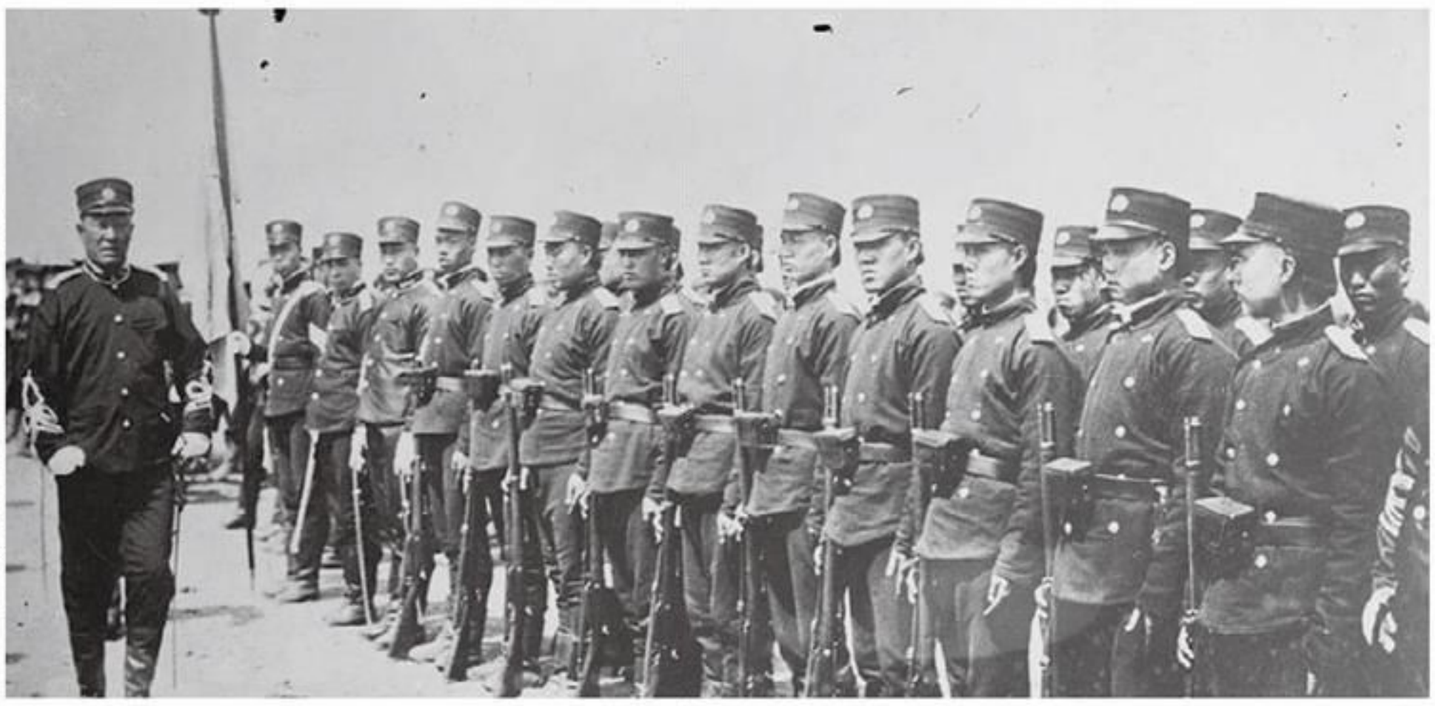
奇觀四：清軍攻不破一個外國使館

如前述，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一個國家用戰爭手段、正規軍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國使館，本應易如反掌，得手不過「一彈指間」，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後以失敗告終。如此敗績，古往今來有先例可循嗎？（有一種謊言，說攻打外國使館主要是義和團幹的，這是爲中國政府開脫罪責。義和團在戰爭爆發前對使館進行過武力騷擾；戰爭爆發之後，是清政府的正規軍對使館進行了大規模的進攻。）

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攻打外國使館的清軍主力是武衛後軍（即甘軍）及武衛中軍。武衛後軍官兵 1 萬 1 千人，另有 3 千後勤人員；武衛中軍官兵約 1 萬人，4 千後勤人員[62]。「使館區內被圍者約 3,000 人，當中 2,000 人爲尋求保護之華人……432 名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63]。來自英、俄、法、美、意、日、德、奧的這 432 名軍人是庚子年 5 月底，當義和團的「滅洋」已成燎原之勢，各國經清廷允許，派到京城保護使館的。這就是首批八國聯軍，它清楚彰顯了聯軍扶危救難的使命。

兵力對比如此懸殊，武器裝備呢？過去中國人一個遮羞的說法是我們的大刀長矛對鬼子的洋槍大炮。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軍隊早已經現代化了。當時拱衛京畿的清軍主力「武衛五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宋慶的毅軍和武衛軍統帥榮祿自領的中軍）以及御林軍（禁軍）的武器裝備實際上勝於八國聯軍，尤其是在戰爭的初始階段。聯軍因爲是執行緊急的人道救援任務，倉促成軍，無論是兵員還是裝備都非精良（比如英軍主要由印度人、法軍主要由越南人組成，聯軍缺乏用於偵察和追逐敵軍的騎兵[64]）。

北洋水師副將、英人琅威理在軍艦上



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與德國教官

以聶士成統領的武毅軍爲例，看看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水平。武毅軍兵員 1 萬 5 千人。步兵的裝備：訓練用槍——德制 11 毫米口徑舊毛瑟步槍 1 萬支；實戰用槍——奧制 8.5 毫米 Mannalicher 步槍 1 萬支；德國最新銳 7.92 毫米 Gew.98 步槍數百支；每營均配備克魯伯 37 毫米口徑速射炮。騎兵的裝備：德制 7.92 毫米 Gew.98 步槍及 1,400 支奧制 8 毫米口徑連發騎槍。炮兵：最新型克魯伯 75 毫米口徑速射炮 16 門、克魯伯 60 毫米口徑速射炮 32 門、格魯森 57 毫米速射炮 32 門。每個炮營另配備當時世界最新銳的馬克沁重機槍兩挺。軍官裝備 6 發轉輪左輪手槍[65]。軍官與騎兵掛刀。實際上，清軍不僅武器裝備現代化，而且已經改革舊軍制，以西法編練新軍；設立武備學堂（軍官學校），聘請外國教官，並派遣軍官出洋留學。

再看看義大利軍隊從天津附近的西沽武庫中繳獲的武器清單[66]：

36 門克虜伯大炮，口徑 87 毫米（1897 年埃森製造），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66 門克虜伯大炮，口徑 70 毫米（1897 年埃森製造）

42 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 57 毫米

42 門諾爾登費爾德式機關炮，口徑 47 毫米

42 門大炮，其中一部分爲諾爾登費爾德式，一部分爲上海機器局製造，口徑 37 毫米

10 門速射機關炮，口徑 37 毫米

20 門小口徑的速射機關炮

3 萬支貼有最新出廠標記的曼里徹式毛瑟槍和來福槍

3 萬把刺刀、軍用品及其他

（時值 250 萬至 300 萬英鎊）

清軍的大炮

八國聯軍繳獲的清軍炮彈

對這些武器的先進、精良豔羨不已、自歎弗如的義大利海軍中將西蒙事後寫信對英國公使說：「最新式的曼里徹式卡賓槍的型號，比聯軍中的奧匈部隊列裝的卡賓槍更爲先進，似爲剛出廠的新品；而克虜伯大炮比德軍現役的所有大炮口徑更大、瞄準更精、射程更遠、更爲新式」。西蒙調侃說：「戰鬥伊始就意外繳獲清軍這麼多先進武器，等於給聯軍 1 萬 6 千名軍人配備全副武裝還有富餘，只可惜我們的士兵一人只有兩隻手。」

據不完全統計，自 1895 年至庚子戰前，中國從美國共購買槍支 422 萬 8,400 桿，戰陣大砲 71 尊，野戰大炮 123 尊，霰彈砲 297 尊。中國從

德國購買毛瑟槍 46 萬桿，尋常槍 300 萬桿[67]。更不必說，十九世紀末中國已能自製槍支大砲，包括（仿製）先進的克虜伯砲和馬克沁重機槍（馬克沁重機槍 1884 年由德國研發成功，拿到專利權；中國的金陵製造局 1888 年就已經開始仿造了[68]）。其時，中國也能夠建造現代軍艦了。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的海軍裝備亞洲第一，在世界上名列前幾名。

在北京，4 百多人的外國使館衛隊的武器裝備與清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只「配備三支機關鎗及四門小火炮」[69]（因爲武器匱乏，其中一門小火炮是從使館附近的一家舊貨店買來的古董，經修理後湊合著用）。義和團的武裝雖不及正規軍，但因爲清廷望其「滅洋」，軍需槍械已有政府供應：「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70]。昏聵的直隸總督裕祿讓義和團到軍械所去自取武器[71]，並撥給餉銀 20 萬兩。清廷甚至發布諭旨，「命各督撫將軍修理槍砲添造子藥，分給團民」[72]。

英國公使館北鄰翰林院。翰林院不僅是至尊至貴的衙門，也是珍藏卷帙浩繁的各類古籍善本的巨大圖書館（藏書樓），其收藏包括《四庫全書》的底本。清軍爲了火攻公使館，在焚燬附近的大片民居之後，竟然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將翰林院縱火燒燬，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付之一炬[73]。只是燒了翰林院，公使館仍然可望不可即。

為火攻外國使館，清軍、義和團焚燬了前門附近的大片民居

使館區之戰歷時近兩個月；「甘軍死四統領，亡士卒過千。用砲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萬顆」[74]（此統計未包括武衛中軍的損失、消耗）。8 月 15 日聯軍破京，使館解圍，人員獲救。

京城的戰場除使館區之外，就是西什庫教堂（亦稱北堂）。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均被義和團焚燬，碩果僅存的西什庫教堂成了外國傳教士及 3,200 名中國天主教徒（「男教友一千，婦女兒童二千二百」[75]）的避難所。守衛北堂的是 43 名法國和義大利士兵（他們是從使館衛隊分出來的）[76]；攻打北堂的義和團「投入數萬人」[77]。6 月 17 日起，清軍也披掛上陣，軍機大臣剛毅督師。教堂一旦被攻破，將是慘不忍睹的大殺戮。可是西什庫教堂巍然屹立，清軍和義和團就是攻不下來。「『拳匪久憚西什庫教民槍砲，每逢助攻，吶喊作勢而已』。即使剛毅督戰，亦不起作用，在敗退時拚命奔逃，差一點將剛毅踩死」[78]。中國軍民廢物到如此程度，夫復何言[79]。

被摧毀的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北堂）外圍

義和團焚燬的北京王府井天主堂

1 萬 8 千人的外國聯軍在天津集結、整編完成後（實爲日俄英美法意奧七國聯軍，其中日軍 8,000 人，俄軍 4,800 人，英軍 3,000 人，美軍 2,100 人，法軍 800 人，意軍 53 人，奧軍 50 人[80]），8 月 4 日分兩路向北京進發。聯軍勢如破竹，擊潰裝備精良的十幾萬清軍以及大批拳匪，8 月 15 日攻

占北京。中國以十倍的兵力抵禦入侵之敵，短短十天時間就丟掉了首都，而敵軍的傷亡輕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歷經北倉、楊村、蔡村之戰和北京攻城戰，聯軍陣亡只有百餘人[81]）。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這樣的笑話？

奇觀五：中國戰敗是中國之大幸

庚子戰爭中的交戰雙方，就國家根本利益而言，就廣大民眾的福祉而言，一方（西方國家）其實是爲另一方（中國）好。中國的失敗乃是中國之大幸；若八國聯軍失敗，將是中國的大災難。這難道不也是戰爭史上的今古奇觀？

戰爭爆發前兩年（1898），光緒皇帝主導的變法維新在西太后爲首的守舊頑固派反對之下失敗了。「西太后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輕皇帝處於長期監控之中，並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英國《泰晤士報》當年的評論）。西方國家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的社會制度及發展方向；它們支持中國的變法維新，希望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從中世紀的野蠻國家進化爲現代的文明國家。對在「百日維新」中發布了一百多道改革上諭、戊戌政變後被軟禁在中南海瀛臺的光緒帝寄予同情；對再次垂簾聽政的西太后「頗有違言」[82]。因爲擔心光緒被謀害，外國公使把打聽皇帝的境況當成例行公務。各國公使請求派醫生給據說疾病纏身的光緒檢查身體；（法國）醫生檢查後證明光緒無大病，西太后聞之忿然不悅[83]。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爲、梁啟超在英國、日本協助下逃往海外，發起「保皇會」，繼續高舉反「后黨」、倡變法的大旗。「政府懸十萬金，購有爲頭不得，太后由是痛惡外人」[84]。近代革命家蔡元培一針見血地指出：「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85] 仇視新法，抱殘守缺，抗拒歷史發展的潮流，這就是鴉片戰爭以降中國和西方國家矛盾的癥結。

西太后

光緒皇帝

戊戌政變後，西太后以光緒帝「痼疾在躬，艱於誕育」爲由，欲行廢立之舉：廢光緒而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爲帝。廢立活動兩起兩落，經營了一年多。然而「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西太后廢黜光緒的圖謀，終因國內疆臣的反對和外國使團表示不滿而未能如願（列強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皇帝的廢立，但是列國在外交上有冷落溥俊的權利）。西太后廢立之舉成空，對列強「益恨之刺骨」[86]。溥俊與皇帝的寶座失之交臂，其父「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87]。在義和團滅洋、滅教的高潮之中，（庚子年）6 月 16 日午夜，由載漪的親信（軍機章京連文沖）僞造的一封外國照會送達清廷。這個所謂「歸政照會」表示列強將逼迫西太后歸政光緒帝[88]。對嗜權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禍，於是不惜一切後果，走上了「洋鬼子，全殺盡」的戰爭之路。該殺的洋鬼子當然不限於身在中國的；擒賊先擒王。慈禧老佛爺和她的寵監李蓮英在深宮之中拚命唸咒，唸那能夠千里殺人的魔咒，每天 70 遍，希望把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德皇威廉二世、日本明治天皇……通通咒死[89]。這恐怕也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克敵制勝之妙法、絕招。

端王載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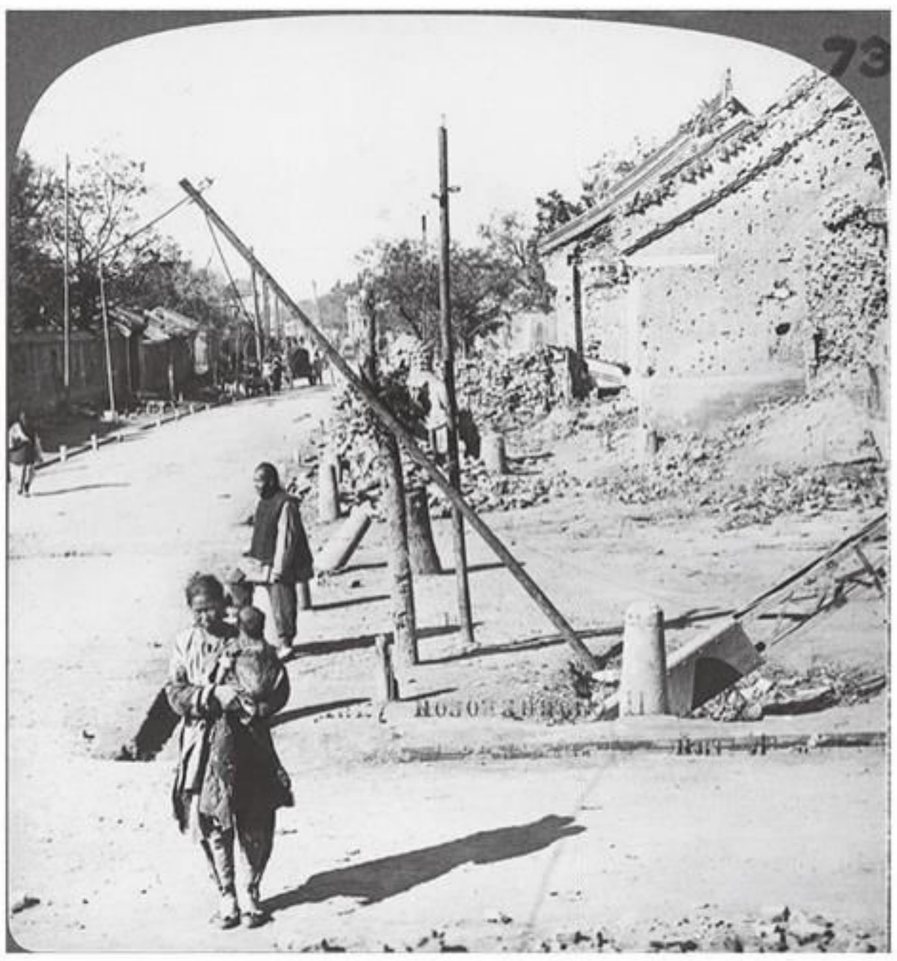
大阿哥溥俊

義和團喧囂的「滅洋」也是超越國界的，似有犁庭掃穴之志：「京中之洋人與二毛子指日可滅絕，然後先去天津、上海燒盡洋房，殺盡洋人，再分隊馳赴各國掃平巢穴，直待九月間，便可斬草除根，天下太平矣。」[90]

「中國人眞的曾經決定剷除公使館，這簡直不可思議。而且從他們攻擊的暴行和殘忍程度以及他們的策略來看，除了澈底滅絕外國人，他們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意圖。」[91] 以上論斷是外國人的「事後諸葛亮」。中國人要將「洋鬼子」趕盡殺絕，由於它的「不可思議」，由於清廷的兩面派手法，西方國家在戰爭之初並不瞭解。八國聯軍登陸，只爲拯救他們的外交官、傳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只爲幫助清政府平息拳匪的暴亂，這爲當時西方國家的公開聲明和一切外交文件所證明。西方國家難道不是爲了中國好？

中國當代歷史學家馬勇指出：「當八國聯軍即將進入北京的時候，清廷內部一片混亂。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清楚聯軍眞實目的只是來解救公使，挽救僑民、教民；雖然聯軍與清軍在過去一段時間發生過衝突，

但從總體上說，由於榮祿處理得當，中國方面與各國公使的聯繫時斷時續，大致說來，各國公使對清廷以及榮祿，還有一點起碼信任，所以各國公使和聯軍將領通過管道勸說清廷不要離開北京，聯軍一定會保證兩宮在紫禁城的安全（西太后的心腹重臣榮祿也力諫太后，即使洋兵進城，亦不可離京[92]；光緒帝也不願出走——引者註）。清廷當然知道聯軍的好意，但是事關國家體制和尊嚴，假如聯軍進京之後少了一點約束，兩宮威嚴受到任何傷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爲鄭重起見，兩宮在作了一些善後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後，於 8 月 15 日凌晨在槍炮轟鳴聲中出西華門」[93]，離京而去。清廷出走，出乎聯軍的意料；聯軍指揮部甚至想讓熟悉中國情況的日本人去把清廷追回來。



彈痕累累的法國使館廢墟

法國士兵在抵禦義和團

以上是從戰爭的起因分析。從戰爭的結果看，掃除中國政壇上的頑固反動派，諸如載漪、載瀾、載勛、剛毅、英年、趙舒翹、啟秀、徐桐、徐承煜、毓賢等人，是《辛丑條約》的重要內容（第二款「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清除朝廷中這些昏暴、愚頑之輩，爲之後的憲政改革掃清了道路。爲中國政壇清掃垃圾的同時，西方各國在條約談判中要求清廷爲被西太后殺害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等五大

臣平反昭雪，開復原官[94]。這些忠義敢言之士當初不顧個人安危，力挽狂瀾，反對啟釁外國、濫殺洋人、進攻使館。中國政府的祛蠹除奸，是被八國聯軍逼出來的。戰爭甫結束，還在「蒙塵西安」的清皇室於庚子年 12 月 1 日發布上諭，申明：「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事，乃可作後事之師。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要求朝臣們在兩個月內就政治改革建言。西太后「當在行在時，下詔罪己……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採納」[95]。翌年（1901）1 月 29 日清廷即下詔變法，啟動了晚清改革（亦稱「庚子後新政」）。這「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96]。清廷派五大臣到英美等 13 個國家考察，決定立憲，進行政治、經濟、司法、文教、軍事等領域的全面改革。在戊戌變法被鎮壓僅僅兩年之後，清廷的幡然醒悟及在歷史長河中的闊步前進，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的勝利催生出來的？

庚子之亂中力挽狂瀾，反對濫殺洋人、攻打使館而被西太后處死的四大臣

許景澄

徐用儀

袁昶

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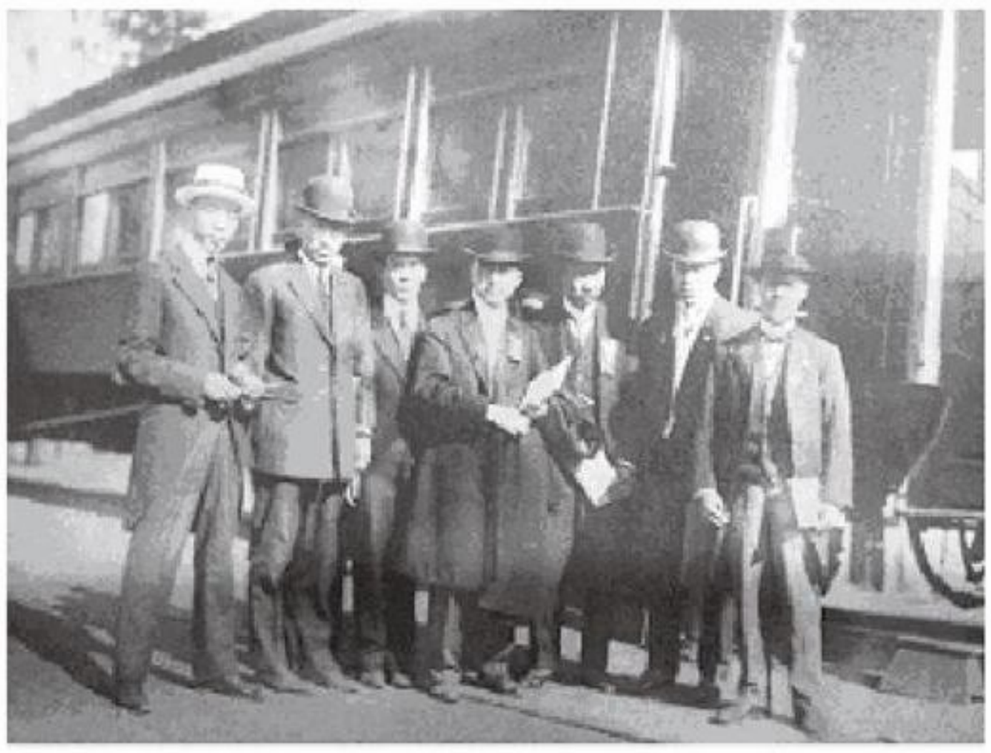
醇親王載灃赴德國為克林德被害謝罪致歉，途經香港時留影　載灃

當代中國史學界，在歷史研究爲政治服務的禁錮之下，也有人衝破禁忌，對庚子戰爭和《辛丑條約》作出較爲公允的評價。歷史學家馬勇指出：「在《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和隨後的商約修訂談判中，西方各國刻意誘導中國改善、改變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構，與世界接軌，與國際同步，鼓勵中國盡早採納在各國行之有效的自由經濟制度。」[97]「《辛丑條約》……是一個國際共識性的文件，這個國際共識性的文件是什麼意思，就是中國必須改革……中國必須要宣布不得再有排外的教育，不能再排外，應該宣揚普世的觀念……《辛丑條約》達成的共識就是要改造中國，你的政治架構要改變，你要把總理衙門給廢掉，和西方國家一樣設立外務部，政治架構要改，所以後來 1901 年的時候就宣布了一個新政，新政裡面最重要的提法就是一切向西方學習，所有的模式都向西方學習，和西方同步，所以這個應該是中國在 20 世紀進步的起點。」[98]

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期盼，甚至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都不乏記載。《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記述了庚子戰後英國議會討論中國問題的一些片斷。在上議院全體會議上，斯賓塞伯爵詢問英國外務大臣蘭斯唐關於庚子賠款的數額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議通過付款安排，支持中國政府中的改革派：「各省督撫於此次之亂，亦有彈壓百姓，不使鬧教，而

令屬地安靜如恆者，其間尤以東南各督撫辦理爲最善。聞該督撫中明達者頗有數人，有欲在本省舉行新政之說。究竟實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國能贊助之，以免被阻於頑固政府否？其能舉辦新政之督撫，不應強其亦出賠款，應即以此爲助其行新政之用。」連（部分）戰爭賠款都不要了；上議員建議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撫中的改革派，讓他們用被赦免的戰爭賠款推行新政。這種對中國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國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1905 年中國首批官派留美學生聚會時合影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

反過來，我們不妨設想，如果八國聯軍失敗了，西太后、端王和義和團得以任意妄爲，達到了「滅洋」的目的，實現了「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中國會是一種什麼局面。清廷將斷絕與西方各國的外交關係，扼阻與西方各國的貿易往來，驅趕或殺盡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文明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歷經三、四十年的「洋務運動」取得的成果將付之東流，使中國擺脫蒙昧的「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將被迫中斷，中國將重回閉關自守，重回中世紀的野蠻。正是八國聯軍的勝利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

康有爲在八國聯軍進京後，從新加坡寫信給日、英等各國領袖，代表了維新派對戰爭的看法和對列強的期望：「閣下：在排外陰謀中，西太后和她的謀臣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董福祥、趙舒翹和馬玉昆狼狽爲

奸，巨大的災難已經降臨我國。您現在充分意識到卑鄙的義和團和清朝反動軍隊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壞。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國人能堅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國際公法的中國人都眞誠地哀悼德國公使的被殺。現在和平在望，聯軍已經打敗了廢黜我國合法君主的賣國賊部隊。我請求您注意下述建議，我相信，如能實行，將保證：(1) 公正地懲罰眞正的罪犯，(2) 對遭受非法攻擊的各國人民和代表實行賠償，(3) 永久和解我國的國際關係……我懇求，您能友好地考慮我的建議。(1) 使光緒皇帝復位。(2) 逮捕所有的反動官員……您將受到億萬人民的感激。」[99] 康有爲痛斥了「后黨」和義和團的排外陰謀、戰爭罪行及其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頌揚了八國聯軍平息暴亂的功績，提出了懲兇、賠償各國損失、使光緒皇帝復位等正義訴求。

無獨有偶，聯軍進京 3 天之後，8 月 18 日，當時在廣州的孫中山與「興中會」骨幹 8 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表達了革命黨人的願望；這就是《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孫中山等人在給英國（暨各國）政府的上書中總結了清廷在庚子戰爭中的 10 大罪狀：「誨民變、挑邊釁、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僨師、忘大德、修小怨」。他們請求英國政府聯合各國，一舉推翻滿清政權，「除去禍根，聿照新治」；提出了遷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則[100]。

康有爲、孫中山對西方國家的呼籲、期望，清楚地表明了維新派和革命黨人——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的前驅——支持、歡迎八國聯軍，視聯軍爲懲惡揚善的正義之師。他們希望聯軍幫助結束中國的皇權專制，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或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爲主張），或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孫中山主張）。

清政府發動庚子戰爭，在沒有喪失理性的清廷官員、外省督撫看

來，幾近於自殺。爲避免亡國之禍，一些疆臣除發起「東南互保」之外，還曾祕密計議，如果西方列強掀翻清皇室的寶座，則推舉素孚眾望的李鴻章爲中國的大總統，以延續國脈[101]。

李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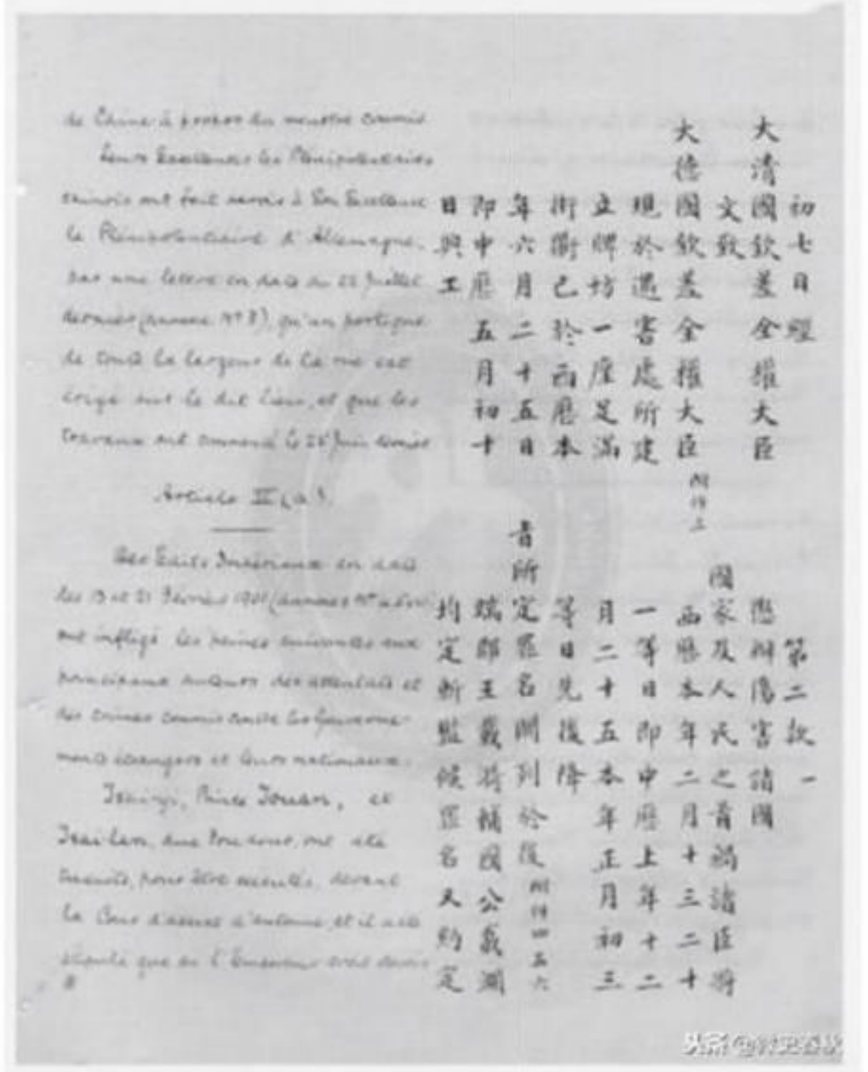
康有為

孫中山

這些疆臣實在是過慮了。庚子戰爭，中國「醞成重大禍亂，致成窮兇極惡之罪」，但是西方各國沒有顛覆中國政府、更無瓜分中國的打算。在戰爭之始，美國通過駐外使館向德、法、英、意、俄、奧、比、日、荷、西、葡等 11 國發出照會，再度申明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1900 年 7 月 3 日通告，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況的准許下，我們認爲說明美國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堅持 1857 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在治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公民的生命財產。……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目的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管理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的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之間）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美國的照會並沒有要求各國做出回應，「但是歷史記載的結果出人意料！竟然是：所

有國家反應積極，態度明確，表示合作。這就是說，所有在華列強一致同意美國強調的保證中國領土完整、行政管理完整的原則。」[102]

庚子戰爭中國慘敗之後，西方列強不僅兌現了它們在戰爭之初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承諾，而且在善後中對中國寬大爲懷。戰後簽訂的《辛丑條約》並非按國際慣例在戰爭結束後交戰雙方的「和約」（peace treaty）。該條約的正式名稱是「中國爲一九〇〇年的騷亂事件與十一國最後的議定書」（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國發動的國際戰爭僅被當作一場（國內）騷亂（Disturbances）；騷亂的主要責任者自然是拳匪。西方各國未讓中國政府承擔發動戰爭的罪責，也未按戰敗國對待中國。清廷被列強如此輕輕放過，怪不得《辛丑條約》的內容「電奏西安時，慈禧得報實在是鳳顏大悅」[103]。



《辛丑條約》的第一款、第二款

《辛丑條約》各國代表的簽字

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費時最久、爭論最烈的是條約第二款

——懲辦禍首（竟然糾纏了 6 個月）。「各國在善後談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賠償，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動義和團排外的責任，追究德國公使、日本使館書記官、傳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責任。這確實出乎中國方面的預料。」[104] 滅洋、滅教的罪魁禍首是西太后，這是明擺著的；正像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的：這位婦人「公然挑釁、破壞了國際公法的每一個原則」（其時國際公法傳入中國已經 60 年）。荷蘭公使曾向中方全權代表李鴻章透露，（作爲談判條件）各國公使擬讓慈禧歸政光緒。僅僅讓頭號戰犯慈禧放棄獨裁權力，而不加以任何懲處，這已經是寬大無邊了，但遭到李鴻章的斷然拒絕[105]。西方列強最後尊重了中國對最高統治者不能碰的底線。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國堅持要西太后承擔罪責，交出權力，歸政光緒帝（這一直是各國的願望），中國將是什麼局面。這點並非做不到，只要列強對清廷的壓力足夠大。自然，西太后會負隅頑抗。但是她如果想讓滿清政權爲她殉葬，她辦不到；滿清親貴、朝廷重臣、外省督撫最後會拋棄她的。如果光緒帝能夠親政，主導憲政改革，中國的歷史將改寫。明治維新在日本創造的奇蹟同樣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蒙受的巨大苦難將可以避免。西方列強的寬宏害了中國啊！

端王載漪是僅次於西太后的二號戰犯。戰後清廷在上諭中嚴譴載漪：「拳匪之亂，肇釁列邦，以致廟社震驚，乘輿播越，推究變端，載漪實爲禍首。」西方各國對罪大惡極的載漪，開始堅持要求清廷將他處死，但他是皇室懿親，清廷不答應。退而求其次，各國要求判他「斬監候」（即「死緩」），清廷連死緩都拒絕，最後載漪僅被流放。[106]

野蠻進攻各國使館、縱兵燒殺淫掠的甘軍統領董福祥亦爲庚子戰爭的「首禍諸臣」之一。此人死有餘辜，但他是手握重兵的悍將，逼急了變生肘腋，可釀大禍。清廷未加刑於他，只給予革職處分[107]。西方各國對

清廷的「苦衷」亦能諒解。（實際上清廷玩弄兩面手法；在處分董福祥的同時，慈禧命光緒賜董福祥手書：「他日聞鼙鼓思將帥，捨爾其誰屬哉」，囑董守時待變。[108]）

庚子戰爭的（部分）首禍諸臣：

山西巡撫毓賢

甘軍統領董福祥

軍機大臣剛毅

大學士徐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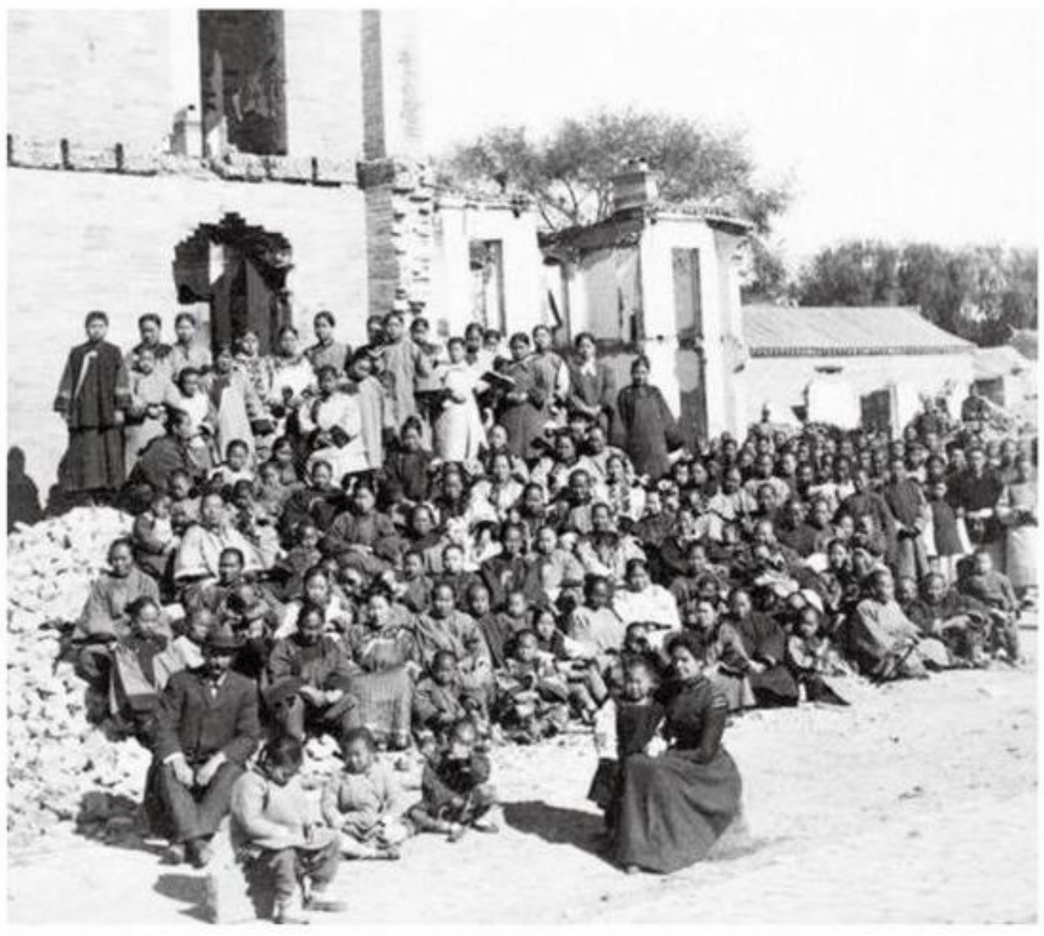
國人對《辛丑條約》規定的 4 億 5 千萬兩白銀賠款難以釋懷。二十世紀初，戰爭賠款首先是對戰勝國軍費的補償。戰爭的開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戰。庚子戰爭，清廷向 11 國宣戰，與八國聯軍作戰，各國的軍費加起來自然是一個大數目。而且庚子賠款並不限於軍費賠償。在庚子之亂血腥、恐怖的滅洋、滅教中，各國的駐華使館被毀，千百座教堂被夷爲平地，外國銀行被焚燒，外國企業被踏平，洋人的資產被洗劫。中華大地上這場滅洋、滅教的浩劫，外國政府、教會和僑民的財產損失以億萬計（還不算生靈塗炭，死傷枕藉）。

北京民衆在菜市口幫助斬首清廷戰犯

殺害克林德的兇手恩海戰後被捕、問斬[109]

中國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說法：庚子賠款 4 億 5 千萬兩，是要每個中國人負擔 1 兩，以此懲罰、羞辱所有的中國人。這是無稽之談。賠款的銀兩數和當時中國的人口接近，僅是巧合。「各國公款、私虧按和約大綱第六條向中國取償清單……約共銀四萬萬二千六百七十二萬兩。又以上各數，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後，每月加費約一千三百餘萬兩（「每月加費」並非利息，而是八國聯軍的軍費——引者註）。倘刪除零數，則截至西七月一號爲止，當約合四萬萬五千萬兩左右之數。」[110]

「爲了解決中國的對外賠款問題，列強駐華公使組織了英、德、比、荷四國組成的『賠款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有關賠款的標準、範圍，確定中國對各國政府、社團及個人的賠償原則。隨後又成立了美、德、法、日四國組成的『中國財政資源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國的實際財政情況與賠償能力。」[111] 美國爲減少賠款額、減輕中國的還款負擔，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後文有進一步說明）。各國通過協商，經過對損失的細緻調查和對中國還款能力的評估，達成了共識：「既要中國就戰爭實際花費和損失進行賠償，又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更不能過度透支這一國家的財政力量……要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中國能夠支付的賠償總額不得超過 4.5 億兩。至於各國如何分配，當然只能參照各國實際損失和實際軍費支出。」[112]



劫後餘生：獲得教會營救的北京教民
（前蹲者為史密斯女士）

上海傳教士悼念遇難的中國教民

英、德、比、荷駐華公使組成的賠款委員會擬訂的《各國索賠章程》全文如下：

一、失毀物產，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賠。

二、索賠之款，計有三種：一爲各國賠款；二爲各行及各西人賠款；三爲華人曾經西人僱用者之賠款。

三、所有失毀物產，應開列詳細章程，以便索賠。

四、索賠清單，須交呈其本國公使，如事關各國者，則交呈資格最深之公使。各公使既將交呈索賠清單驗過，如一切悉按此次定章開列，即送交中國政府索賠，不再另列細單。

五、各物理合索賠者，均須照實價開列。應賠之款，亦許給息。平民以五厘，商家則以七厘行息。息錢未付之前，不得以息生息。至被毀之物，能與以下所列第七款章程相同者，始可給息。息即自被毀之日起算。

六、如各行各西人經帶兵官飭令將其所屬之貨物供給軍營以爲保守之需者，則其所屬之國或兵官必有字據承認，不向中國索賠。被毀物產，須有實證：即按照其本國國律開單，交呈其所屬之公使驗明，並無可疑之處，始代向中國政府索賠。

七、被毀之物，須將未亂前本有此物之實據，交呈其所屬之公使照驗。如該公使以爲毫無疑竇，即能向中國政府索賠。失主所業何事，以及其平時進款若干，其所失之物亦可按之估價。

八、應賠之款，俱照關平估出。

九、無論何國何人，俱當按照以上所列各章開單，方能索賠。[113]

該章程確立了公正的索賠原則和嚴格的索賠手續。

庚子賠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的前提下計算出來的；因此西方各國不能損失多少，得償多少，而只能按比例獲得賠償。多數國家的原始索賠金額，遠高於它們得到的實際賠款。比如德國政府原索賠 7 億 5 千萬兩白銀；俄國光爲被破壞的滿洲鐵路就索賠 1 億；法國光爲雲南邊界的損失就索賠 1 億 4 千萬[114]。單就庚子賠款而言，西方各國得不償失。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抱怨說：「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115]。因此之故，各國寄希望於「合理的賠償部分可以通過已經增加的保證外國的權利和豁免權的安全來實現；更爲重要的是，通過中國向全世界開放平等通商來實現」[116]。

英國公使館內的防線

解圍之後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斷垣殘壁

中國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說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只有數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的 4 億 5 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多少年的財政收入。具體而言，蠱惑人心者以乾隆年間的財政收入爲例，稱乾隆年間是中國最富足的時代，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不過兩三千萬兩白銀。由此可見，庚子賠款「留給賠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難」。

以乾隆年間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論證一百多年後庚子賠款的不堪重負，是一種蓄意的欺騙。「據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周育民在《1840 年——1849 年的清朝財政》中的數據統計來看，1840 年時，清政府財政收

入爲 3.9 億兩銀子；到了 1843 年鴉片戰爭結束時，竟然到達了 4.2 億多兩白銀的財政收入，是乾隆時期的國庫收入 10 倍！……這樣的高稅收，一直到清朝最後幾年依舊如此。1908 年，清朝財政收入爲 2.3 億，1909 年是 2.63 億；直到清帝退位的前一年，1911 年時，清朝的財政收入都有 3 億兩白銀。」[117]（晚清時期，海關徵收的外國商品進口稅幾乎占了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118]）庚子賠款的 4 億 5 千萬兩白銀，不過相當於清政府一、二年的稅收（而且還款期長達 39 年）。

清政府的稅收高嗎？民眾的稅務負擔重嗎？平心而論，清政府的稅收以現代國家的標準衡量低得驚人。4 億 5 千萬國民，平均每人每年的稅務負擔不到 1 兩銀子！怪不得在《辛丑條約》的談判過程中，清廷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提醒議和大臣奕劻、李鴻章，在與列強討論賠款問題時，切不可言中國當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謂用西人西法，力必有餘，恐其侵我財政」[119]。

八國聯軍繳獲的清軍大砲

八國聯軍繳獲的清軍重機槍

庚子之亂這場「千古未有之奇禍」[120]對西方各國和基督教會造成的巨大損害，清政府並非心中無數。清廷的決策中樞「軍機處」致電在北京的議和代表稱：「賠款各款，勢不能輕」；李鴻章「對於列強提出之賠款總額，本來預料當系二十萬萬馬克」[121]（相當於 6.55 億兩白銀）。根據（忠心耿耿爲中國服務的）總稅務司赫德的估算，「中國對外賠款『連借

款利息計算在內，共需十數萬萬』」[122]。但是西方各國在善後談判中主要關注的並非經濟賠償；湖廣總督張之洞（亦爲清廷政務處參預大臣）洞見於此，致電軍機處，就列強的動機分析說：「各國皆非圖利而來」[123]。當代歷史學家馬勇指出：就賠款而言，西方國家「並沒有拿其他的損失之外的……《辛丑條約》談判結束以後，清政府就感覺到，清政府就覺得遠遠低於它們原來的估計，清政府當時估計，因爲打的損失那麼大，會讓中國可能賠很多」[124]。

英國公使館外的路障和火炮

被洋人救助的中國難民

4 億 5 千萬兩白銀的賠款是重還是輕？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加利亞與德國結盟。戰敗之後，保加利亞與協約國於 1919 年簽訂了《納依條約》。保加利亞除被迫割讓土地給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希臘之外，並須賠款 4 億 4 千 5 百萬美元[125]。保加利亞乃東歐一蕞爾小國，而它的戰爭賠款額高於庚子賠款（《辛丑條約》第六款列明「海關銀一兩，即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即美國元零七四二……即英國三先令」；庚子賠款折合美元爲 3 億 3 百 30 萬，折合英鎊 6 千 7 百 50 萬）。根據 1919 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戰敗國德國除喪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業、礦產資源外，須賠款 113 億英鎊，且要以黃金支付[126]。此賠款是庚子賠款的 167 倍；若以國民人均負擔計算，則爲 1255 倍（1919 年德國

人口約爲 6 千萬）。

庚子賠款不僅賠洋人，而且賠華人。賠款的對象列明在《辛丑條約》第六款，是「各國、各會、各人及中國人民」。庚子賠款用來賠償中國人民之損失，當代中國人可能聞所未聞；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丑條約》及《各國索賠章程》之內，而且實實在在付諸於西方國家的行動之中。庚子賠款確有一部分支付給中國遇害教民的遺屬，作爲撫恤金[127]。庚子之亂是近代史上罕見的浩劫，僅直隸（河北）一省，「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128]；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報朝廷：「合計通省殺害教民多至數萬丁口，所毀房屋多至數十萬間」[129]。如果要求澈底賠償，庚子賠款的 4 億 5 千萬兩白銀，就是光賠中國的基督徒都不夠！

天津教民被洋人船隻搭救

天津紫竹林教堂的外國神父與其庇護的中國教民和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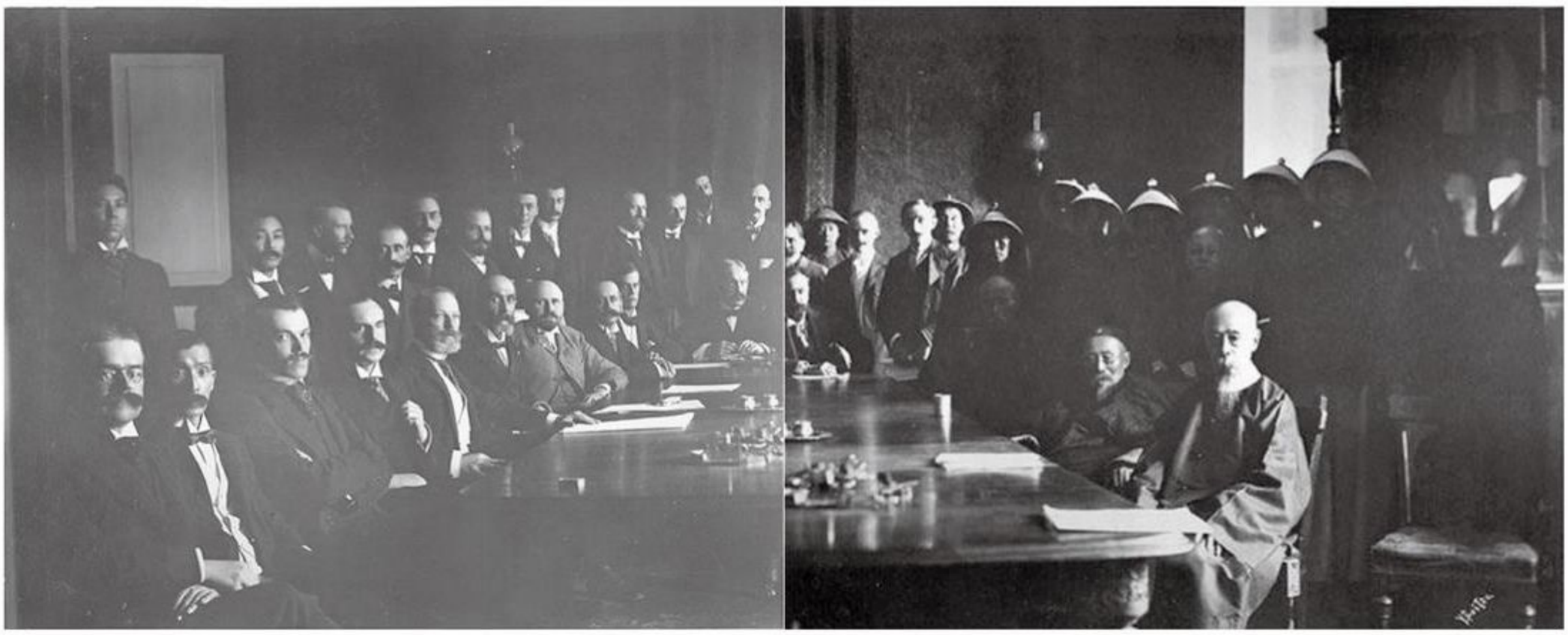
國人被長期灌輸帝國主義侵略窮兇極惡、西方列強搾取敲骨吸髓，但是謊言在事實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西方國家不僅沒有藉機敲詐之意，倒是不無關懷同情之心。

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W. Rockhill）其時寫信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匯報談判的情況：「我們的目標是，在談判中運用我們政府的影響，影響跟我們一起談判的國家（在華列強），本著對中國平等的友誼，追求

公正與合理……關於談判的第三點，即各國就他們在中國的損失和花費、輸送遠征軍到中國解救圍困、保護在京外國住民和恢復秩序以及賠償社團、公司和個人在暴亂中的損失，美國政府主張這些賠償總數不應超出一個合理的範圍，應當在中國支付能力之內」（這是美國政府內部的機密文件，不是對外發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辭）。當六千七百五十萬英鎊（即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額基本確定之後，列強之中只有美國反對；美國主張將此數額至少減少三分之一。美國對中國利益的竭力維護，引起聯軍統帥瓦德西的不滿，他發牢騷說：「看來美國不想使任何人從中國得到任何東西」[130]。

英國人的態度呢？庚子戰後，在英國上議院全體會議上，斯賓塞伯爵質詢英國外務大臣蘭斯唐關於庚子賠款的數額：「賠款一事目下進步如何？蓋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與中國關涉尤巨。如各國索賠過巨，中國無力以償，則中國政府受害實非淺鮮……故籌款一節，更須謹慎從事，切不可令中國一蹶不振也。各國現欲中國籌款賠償，亦嘗計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經費足用否？」[131]

如果有人對英國上議員（對庚子賠款可能導致中國政府經費不足）的憂慮感到驚異不止，對下面的史實或許會感到更加不可思議：爲了減輕中國的還款負擔，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西方國家談判代表竟然讓中國海關提高進口稅；這等於把部分還款負擔轉嫁到它們自己身上。中國談判代表徐壽明當即表示：「洋貨肯允加稅，深感各位美意」[132]。西方國家的美意最後落實到了《辛丑條約》第六款；提高洋貨的進口稅通過 3 個方面實施。一是整體提高進口稅率；二是以前免稅的貨物，今後要課稅（除「米及各雜色糧麵」等少數貨品外）；三是「現在照估價抽收進口各稅，凡能改者皆當急速改爲按件抽稅」。



《辛丑條約》簽字儀式（右首第一人為奕劻，第二人李鴻章）

西方國家在談判中對中國態度的溫和、體諒，讓聯軍統帥瓦德西一度相當不悅：「其間最令人悲歎者，即各國與華人周旋，何等溫柔軟弱。各國對於所有殘忍屠殺教徒牧師，直至最近猶復發現於山陝境內之事，所有摧毀各處教堂及牧師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墳墓之事，所有自古未聞圍攻使館兩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133]

中國人的仇外宣傳，只談庚子賠款，而迴避西方國家以後紛紛退還賠款的史實。首倡義舉的是美國；以後，英、法、意、比、荷等國也競相效仿，將退款用來資助中國的教育文化、科學研究、保健服務及其他迫切需要的領域[134]。實際上所有被賠款的國家以後都退還了部分款項；其中英國退回賠款額的 40%，比利時 50%，俄國 20%，荷蘭 20%，義大利 15%。中國最後只償付了庚子賠款的 58%[135]。

上面列出的各國退回賠款的百分比，沒有提到美國。美國退回了多少庚子賠款呢？百分之一百！美國獲賠款 2,444 萬；從 1909 年 1 月起，它將已經支付的 1,366 萬全數退還中國，由中外合組的基金會管理，以保證退款的合理使用。「庚款退得最澈底的是美國人，它眞的就是一分錢沒要」[136]。

美國用庚子賠款創立的清華學堂

美國用庚子賠款資助的第一批赴美留學生

第二批清華留美學生，內有胡適、趙元任、竺可楨

用庚子賠款修建的北平圖書館

美國用部分庚子賠款創立了清華學堂，先後送出的留美學生數以千計。其他國家也效仿美國，用退還的庚款培養中國留學生，這導致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西方留學潮，對中國的現代化影響極爲深遠。中華民國的（早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科學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款留學生。

國人還有一個不經之談，說《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從此「正式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丑條約》使中國喪失主權了嗎？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認爲沒有；光緒帝的《罪己詔》明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誠然，《辛丑條約》規定：大清國兩年之內不能進口軍火，拆除大沽炮臺，允許諸國「常留兵隊分保使館」，「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處（如一、二年後各國查明中國保護得力，亦可酌量情形撤去各處駐守

之兵隊）」。這些條款確實有損國家的主權，但這是中國自找的。歷經庚子之亂瘋狂的滅洋、滅教，目睹清政府和義和團對外國人斬盡殺絕的政策和實踐，西方各國在痛定思痛之後，不能不對此類暴行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使館留兵駐守、保證京師至海洋的通道不被切斷，種種舉措目的只有一個：保證各國使館的安全；萬一「滅洋」的暴亂再起，各國可以及時援救。

當然，這種安全措施也可視爲對中國的懲罰。這種懲罰過分嗎？不妨比較一下庚子戰後中國的境遇和二次大戰後德國、日本的境遇。二戰結束，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政權澈底覆滅，但是盟軍對德國和日本長期軍事占領，至今依然（已達 70 多年）。兩國的軍備受到嚴格管制，甚至不能擁有國防軍（只能有「自衛隊」）。試問，這些國家的主權何在？如果說中國在庚子戰後淪爲「半殖民地」，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又淪爲什麼？四分之三殖民地？德、日兩國在二戰中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戰爭罪行，危害程度遠比德、日爲輕；但性質之惡劣，實有過之。正如前文所言，以使館、教堂爲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爲瘋狂屠戮對象，政府懸重賞殺盡一切外國人，包括婦孺，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幹過的。

6 月 3 日聯軍從天津乘火車前往北京救援，
大批天津市民在圍觀

聯軍前任司令官西摩爾

庚子戰後，光緒帝在《罪己詔》中坦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137] 這說的是實話，道的是眞情。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在全國臣民面前，對列強的見諒表達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見，這種對政府和民眾愚暴無知的慚憤、對列邦寬宏大量的感激，今日在國人之中不僅消失殆盡，而且不是已經轉化爲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滿腹怨毒、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蔑嗎？

奇觀六：義和團、清軍燒殺淫掠，恣意禍國

庚子國難，中國民眾蒙受了巨大的苦難，國家經歷了一場浩劫。然而浩劫既非源於戰爭，苦難亦非來自攻入國門的外國軍隊。在滅洋滅教的狂暴中，國人不僅肆意屠戮外國人，殺害基督徒，而且濫殺無辜，姦淫擄掠，恣意禍國，誠爲今古之奇觀。

八國聯軍在中國燒殺姦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眾多謊言中相當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確有其人，但不是外國聯軍，而是中國人自己。在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兵匪焚掠京師」，「都門內外，教民骨積如山，血流成渠」[138]。「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鑿鑿見證，史不絕書。當代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中指出：「庚子夏天發生於北京的奸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奸被殺的無法統計」「義和團和各路清軍在北京搶夠了，殺夠了，再分頭攻打東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來助興」。清人李希聖記述道：「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139]。而對於八國聯軍的行爲、操守，蔡東藩在《清史演義》中評價爲：聯軍「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蔡東藩作爲「一代史家，千秋神筆」，他的歷史演義被公認爲通俗的中華通史）。在本文的開始，對庚子之亂中義和團及清兵大規模的燒殺淫掠已經作了簡要的陳述，下面補充一點細節。

被義和團及清軍焚燬的北京街區

在直隸（河北省），在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縱容、支持下，義和拳亂遍地狼煙，全省各縣無一倖免。庚子年（1900）5 月 12 日，義和團在涞水縣高洛村大開殺戒，「義和神團天下第一壇」壇主張德成親自指揮。該村有 34 戶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裡望彌撒時闖進去，大殺大砍，將（一名）外國傳教士和華人信徒全部殺死。然後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斬盡殺絕。接著搜索財物，放火燒屋，34 戶人家 140 餘人無一倖免[140]。5 月底，在盧保鐵路（盧溝橋至保定）服務的外國工程師和眷屬 36 人爲逃避義和團的殺戮，僱船由保定逃難去天津，途經雄縣小龍王廟，被拳匪截殺，死傷慘重[141]。6 月 1 日，義和團占據順天府永清縣，攻擊教堂，殺害兩名英國傳教士（Charles Robinson，H・Nerman）。同日，直隸霸州縣「聖若瑟會」的外國修女領著教會收養的 22 名孤女，爲逃避義和團的殺戮、凌辱，逃亡到固安縣地界，不幸落入團匪之手。義和團在各個村落貼出廣告，公然販賣這「二十二名黃花閨女」，「非常便宜！售完即止！」6 月 19 日，法籍傳教士路懋德、趙席珍（Remi Isore）在武邑天主堂被殺。在任丘縣，680 名天主教徒慘遭義和團殺害。青縣的義和團首領王之臣率萬餘團民進入滄州，「凡地方富室，概指爲洋教，焚劫殺掠，凶橫異常」[142]。6 月 29 日，肅寧縣尚村逃往獻縣張莊避難的 167 名教民，在獻縣城北的李家莊附近被殺。在保定，「6 月 30 日和 7 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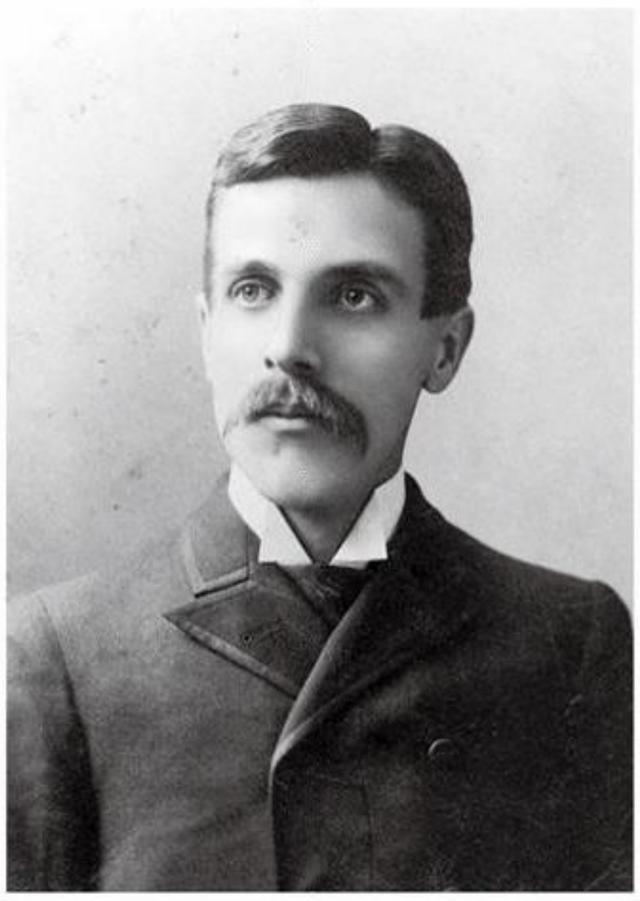
日兩天，有 15 位來自內地會和兩名美國差會的傳教士被害」[143]（內地會、差會均爲西方傳教士組織）。在保定城內，拳匪殺害教民數百人，焚燬了即將完工的天主教保定總堂。7 月中旬，義和團和清軍製造了聞名於史的「景州朱家河教堂慘案」，一次屠殺中國天主教徒兩千五百多人、外國神甫兩人（聖任德芬與聖湯愛玲）；槍殺、刀砍、火燒，手段凶殘，婦孺皆被難[144]。朱家河屬天主教會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庚子拳亂中共有 5,153 名教民、7 位司鐸、235 名修女慘遭殺害，674 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145]。在天主教會的「直隸北境代牧區」，超過六千名教民與神職人員遇害[146]。「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147]。

景州朱家河教堂慘案

清軍及拳匪殺害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

直隸省殺人如麻，山西省尤有過之。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頭號劊子手是山西巡撫毓賢，此人在西方以「山西屠夫」著稱。「6 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 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

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 月 9 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爲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縛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148]（事後毓賢上奏朝廷，「言彼設一巧計，將洋人盡數擒捉，以鏈鎖之，均在撫署處決。其漏網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後逃走，藏於城牆之下，其後查得，已死。」[149]）



美國傳教士 Williams7 月 31 日在太谷遇難

美國傳教士貝如意 7 月 31 日遇難時恰逢 35 歲生辰

庚子年 7 月 9 日在太原發生的慘案在國際上以「太原大屠殺」（Taiyuan Massacre）著稱；中國人稱其爲「太原教案」。這個事件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點，在一個省最高級別的官衙之內，那麼多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子女、隨從慘遭殺害；二是作爲封疆大吏的巡撫親自操刀。浸信會的一個信徒目睹了在巡撫衙門這場殘忍而冷血的大屠殺，他提供了更多的細節。「首先被帶上來的是英國浸信會傳教士 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抓住他。Mr. Farthing 輕輕地把妻子推開，

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來，一言未發。劊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頭顱。緊接著被殺害的是 Mr. Hoddle，Mr. Beynon，Lovitt 博士和 Vilson 博士，他們的頭顱都是被劊子手一刀斬斷的。巡撫毓賢這時候顯得不耐煩了，嫌殺人的速度太慢。他讓他的衛隊協助劊子手去砍殺其餘的人；他的衛士個個佩帶長柄的重劍。接下來遇難的 3 個傳教士是 Mr. Stokes，Mr. Simpson 和 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 被一刀斬首，但是前兩個受難者被剁了好幾刀，人頭才滾滾落地。殺完新教的男性傳教士之後，婦女被帶了上來。Farthing 夫人手拉著她的 3 個孩子，孩子們緊緊依偎著母親。劊子手揮刀砍下母親的頭顱，孩子們也被一一砍頭。劊子手以殺人爲業，砍頭只需一刀；而毓賢衛兵的行刑手法相形見絀，有些婦女人頭落地之前，要被接連不斷地刀劈劍砍。Lovitt 夫人被帶上刑場時，戴著眼鏡，手中牽著她年幼的兒子;直到受刑時她牽著孩子的手都未放開。她對周圍的人講:『我們到中國，帶來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對你們沒有任何傷害，只給你們帶來好處。爲什麼你們如此對待我們？』一個士兵奪去了她的眼鏡，連砍兩刀，Lovitt 夫人人頭落地。當所有新教傳教士被殺害之後，羅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帶上來。留著長長白胡鬚的主教（即已在中國傳教 10 年的山西北部教區主教 G. Grassi ——引者註）問巡撫毓賢，爲什麼他做這種傷天害理之事。毓賢二話不說，拔出佩劍，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鮮血噴湧而出，染紅了主教的白鬍子，接著他被梟首。主教之後，神甫和修女們一個個被砍頭。之後，Mr. Piggott 和他的傳教團隊從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場；Mr. Piggott 和 Mr. Robinson 仍然戴著手銬。Mr. Piggott 在刑場上向周圍的人群布道，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頭顱被劊子手揮刀砍下。Mr. Robinson 也從容就義。Piggott 夫人一直牽著她兒子的手，至死沒有鬆開。母親被斬首之後，兒子遭到同樣的酷刑。這個團隊的其他婦女和兩個女孩子，都被同樣地殺害了。」[150]

在山西巡撫衙門被殺害的傳教士 Lovitt 全家

在山西巡撫衙門被殺害的傳教士 Farthing

僅在 7 月 9 日一天之內，毓賢就在他的巡撫衙門殺害了 33 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2 名天主教傳教士以及 20 餘名華人隨從。傳教士遇害之後，他們的衣服、戒指、懷表被掠走，他們的頭顱被懸掛在城門示眾[151]。曝屍一天之後，中國教民將被「剖心棄屍」的外國傳教士祕密埋葬；五天後 200 名教民爲此被處死，隨後大屠殺在山西全省展開。「被禍最慘者，爲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152]，洋人、教民以及無辜民眾死亡累累。到 8 月底，至少有 159 名外國新教傳教士（以及 46 名他們的子女）和 12 名天主教傳教士在山西被屠殺（其中「中國內地會」58 名外國傳教士遇難，21 名子女同時被殺害；「美國公理會」、「英國浸禮會」以及「壽陽宣教會」在山西的傳教士也幾乎全部殉難——引者註）。在該省北部共有 15000 到 20000 名中國教民被殺害[153]。

9 月中旬，當西太后「西狩」經太原時，她向毓賢詳細詢問了當地「滅洋」的情形。毓賢得意地稟告：「奴才布下了天羅地網，把洋鬼子殺了個雞犬不留」。西太后極口誇獎：「你幹得好，就是要從山西澈底剷除

洋鬼子！」[154]（雖然其時清廷已經開始向外國求和，鎮壓義和團）。

在山西忻州遇害的赫伯特 · 狄克松牧師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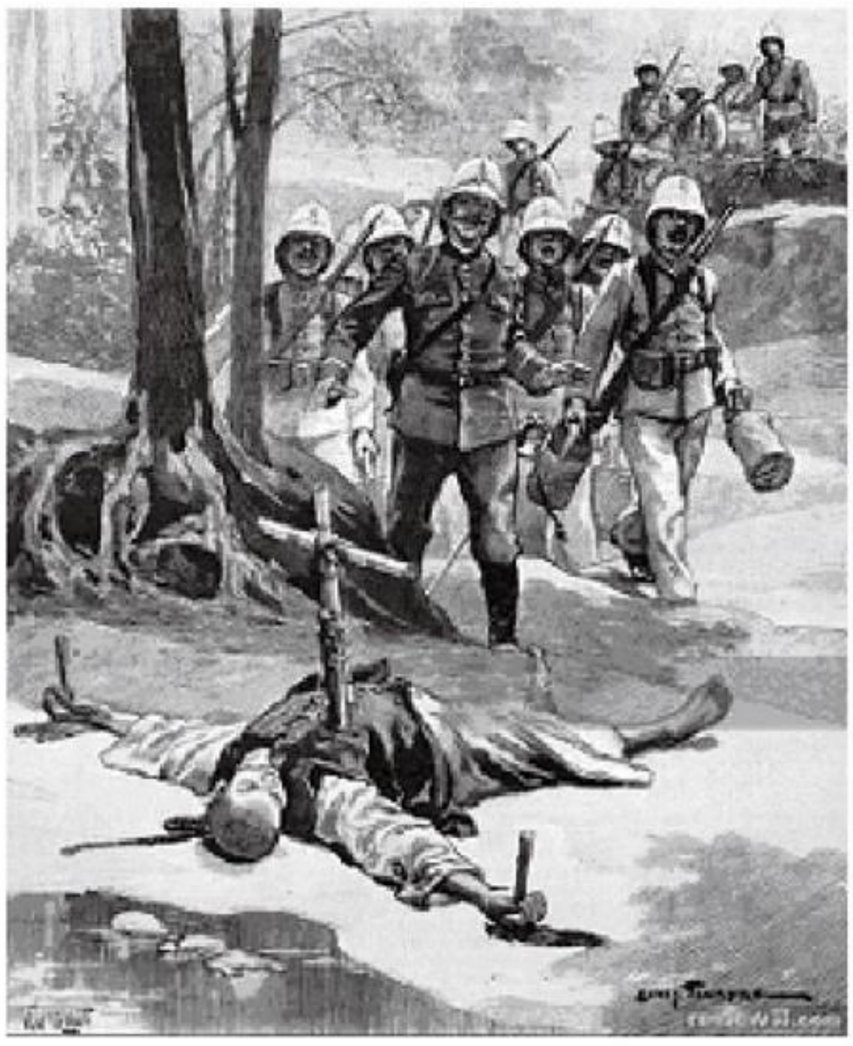
在蒙古被殘殺的韓默理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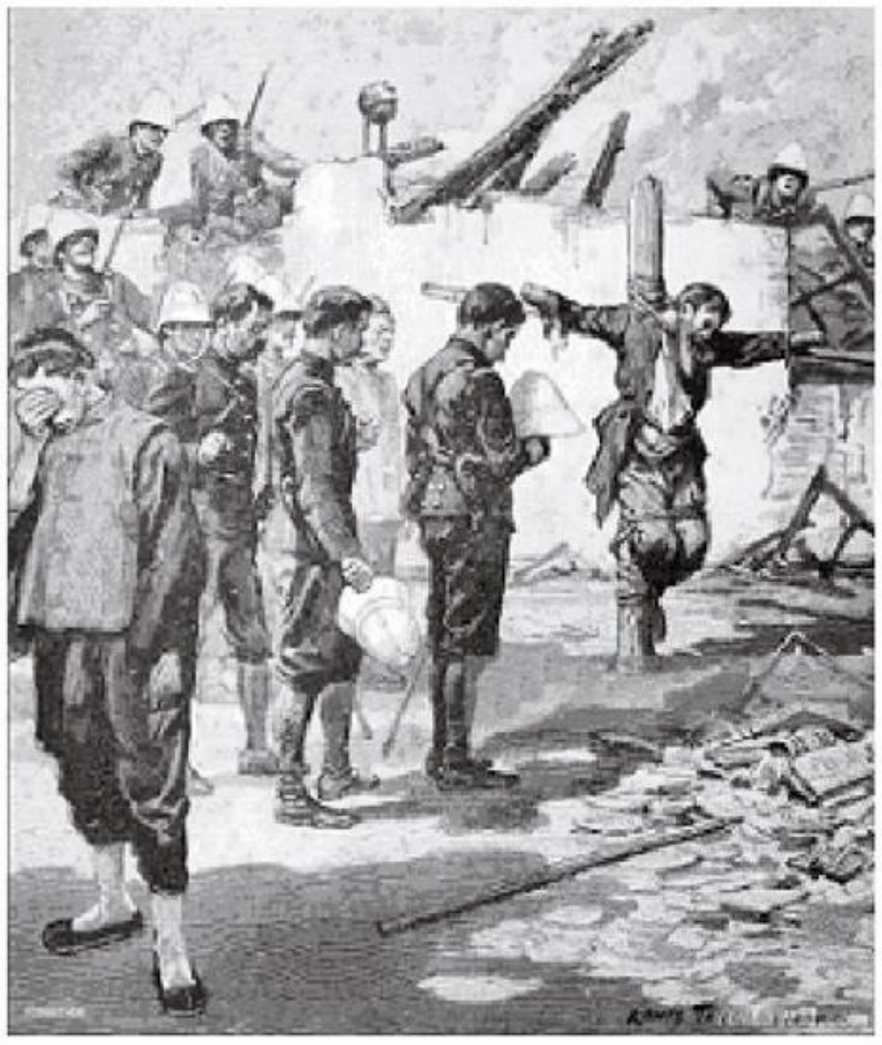
在蒙古，庚子年 7 月 5 日，在滅洋、滅教的腥風血雨之中，在蒙古西南教區的二十四頃地的主教座堂內，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Bishop Ferdinand Hamer）和 6 名外籍傳教士，於虔誠禱告之後決意留在教堂內固守，以保護蜂湧而至的中國信徒。次日，韓默理主教決定僅僅自己留守，命令那 6 名傳教士逃往三道河，以求保全。主教單獨留下來，照顧、保護在教堂內避難的數千名華人教徒。

此後，薩廳東段所有的教堂均被義和團攻破，並全部被焚燬；每天都有驚魂落魄、死裡逃生的教徒前來投奔二十四頃地的主教座堂。7 月 19 日凌晨，由歸化城派出的兩百名清軍馬隊趁守衛的教徒疲憊不堪，攻進村內。於是殺戒大開，血流漂杵，大批天主教徒和他們的家人被殘殺，包括聖嬰會收養的所有孩子。殺人伴隨放火，義和團縱火焚燬了整個村莊與教堂。

韓默理主教被捕後，遭義和團「手足合繫，貫以竹竿，抬之遊街」，受盡了凌辱。之後，韓默理主教與「教友五人，同置一車……跪於車中，頭上有大刀一，橫懸頸後，車動則刀切六人之頸」，鮮血淋漓，命若懸絲。韓默理等六人再被運到托克托廳城，被施以酷刑，「以鐵索穿肩骨，

囚以籠……背上插一小旗，上書『老洋魔』三字」，拉去河口鎮遊街示眾。7 月 24 日，韓默理主教等六人被押回托城，再往陶村遊街示眾。在受盡非人的折磨、凌辱後，韓默理主教最後在托城南灘被扒光衣服，用浸滿燃油的棉布塗抹全身，隨後放火活活燒死，並割下首級示眾[155]。





西方傳教士被酷刑處死，教堂化為灰燼

在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了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區也受害深重，計有 3,200 多名信徒被屠殺[156]。

在奉天（遼寧省），庚子年 6 月 30 日，義和團在盛京（瀋陽）相繼燒燬了大東門外的英國（新教）教堂、教會醫院和講書堂。之後，團民包圍了小南門外的（天主教）耶穌聖心主教座堂，欲將教會神職人員和教堂庇護的華人信徒斬盡殺絕。法裔主教紀隆（Bishop Laurent Guillon）組織教徒抵抗，以求免於屠戮。義和團連攻數日，未能攻破教堂。7 月 3 日清軍前來助陣。在清軍猛烈的炮火支援下，義和團終於攻陷教堂，並將這座建成僅十餘年的宏偉壯麗的哥特式大教堂完全摧毀。紀隆主教、5 名法國神父、2 名中國神父、2 名修女以及 400 餘名信徒全部被活活燒死在教堂內。此即著名的「瀋陽教難」[157]。據不完全統計，遼寧省光是天主教徒就

至少有 1,400 多人在庚子拳亂中遇害[158]。

拳匪在殺害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時，驚異地發現「洋人傳教士是一群傻蛋」。下面是一個拳匪的自述：「我殺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祈禱，我一刀捅死那妖婆，那男的流淚祈禱，說要寬恕我。寬恕我？你腦殘吧！還不夠？我又一刀捅死那小洋妖，那男的哀嚎著繼續祈禱，還要寬恕我。你這瘋子！你們這群傢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怕被洋神附體，要速戰速決，於是一把揪住那男洋妖的胸襟，狠狠一刀捅進了他胸膛，得意地看著他，沒想到的是從他懷裡掉出了一把左輪槍，上滿膛的。懷裡藏著槍，眼睜睜地看著我殺了他全家，從此，我知道了：洋人傳教士是一群傻蛋！」[159] 洋人傳教士爲什麼這麼「傻」？庚子之亂中在蒙古遇難的洋人傳教士林牧師在他的遺書中作了回答：「我們手中有武器，但我們不能使用它們。若是神的旨意，我們就甘心殉道。」[160] 在山西太谷傳教的 Dwight H. Clapp 等人面對拳匪的屠刀時作了同樣的選擇。在他們寫給美國親友的信和遺留下來的日記中提到，他們備有少量自衛的槍，但決定放棄使用，而選擇從容就義。Mr. Clapp 在遺書中的名言是：「殉道者的鮮血是眞理的種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161]

Charles 牧師全家在汾州遇難

庚子拳亂中，義和團殺害外國傳教士固然血債累累，但他們主要殘害的還是自己的同胞。拳匪任意誣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誰的命就要誰的命。大清臣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戰戰兢兢。義和團「鑒別」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謂焚表：「匪中規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爲焚香，取黃紙燒之，如紙灰不升，即目爲眞二毛子，必殺無赦。」[162] 焚表鑒別，殺人遊戲也；凡被焚表之人，十之八九難逃一死。

不同於一般百姓，義和團是敢於犯上的。御林軍「虎神營」的翼長阿克丹（二品大員）因爲曾經入教，被義和團斬首示眾。安徽提督姚氏（從一品官）身著官服在京城大街上，僅僅因爲讓拳匪「弗得妄言（殺洋人）」，即死於拳匪刀下。「姚身攜三百金及金鐲、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親友等有來撫屍慟哭者，均爲匪所殺。」[163] 工部尚書陳學棻到衙門視事，一夥拳匪羅皂而至。陳尚書責備他們「無狀」，「匪怒以刀砍之」，既而開槍掃射，陳尚書和其他 3 名官員倒在血泊之中，當場斃命[164]。武毅軍統帥聶士成幾乎是庚子戰爭中唯一認眞抵抗過聯軍的清軍將領。因爲他彈壓過拳匪的殺人越貨、肆意破壞，拳匪對他恨之入骨。就在聶將軍身先士卒、與聯軍戰鬥方酣之時，拳匪闖入他家，將他的老母、妻子、女兒綁架而去。親兵報到陣前，聶將軍大怒，分了半營人去救家人。拳匪喪心病狂，與外國聯軍合擊聶軍，聶將軍中炮陣亡[165]。拳匪打算拿聶將軍「戮屍」，因聯軍追來，倉皇逃命，才未得逞[166]。德國軍人用紅毯子覆蓋聶將軍的遺體，將遺體交還清軍。付都統慶恆是義和團的靠山、端王載漪的親信，因爲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13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斬脛斷脰，合室陳屍」[167]。「寧河人王燮……爲京城左營游擊，拳匪執而剮之，焚其餘骸」[168]。在天津，拳匪在街上行走時，遇到文官坐轎，喝令下轎，武官騎馬，喝令下馬；而且必須脫帽，在路邊肅立。如果不從，白刃

相向[169]。

義和團殺「二毛子」竟然殺進了皇宮禁苑。在端王載漪帶領下，拳匪闖入深宮。大師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氣揚地宣稱：宮裡也有二毛子，得查驗，連太監、宮女都要驗。西太后問他如何查驗，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額頭拍一下，就有十字紋出現（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於情勢，讓他們驗了一些太監、宮女。6 月 25 日，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率拳匪 60 多人闖入光緒臨時居住的寧壽宮，口稱尋找二毛子，當面「呼帝爲鬼子徒弟」，欲加害光緒帝，被西太后阻止[170]。

G. B. Farthing 夫婦及三個孩子，
1900 年 7 月 9 日在太原被殺

Mary Louise Partridge 7 月 31 日在太谷遇害

誅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光緒帝；二虎：慶王奕劻和李鴻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員）是義和團肅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圖」。他們認爲清廷官員只有 18 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可留。義和團的這個「非常之事」原定在毀滅北京的外國公使館、殺盡洋人之後即付諸實行[171]。是八國聯軍粉碎了他們的圖謀。

1898 年太原府基督教傳教士年會合影。照片中 35 人，其中 21 人庚子年殉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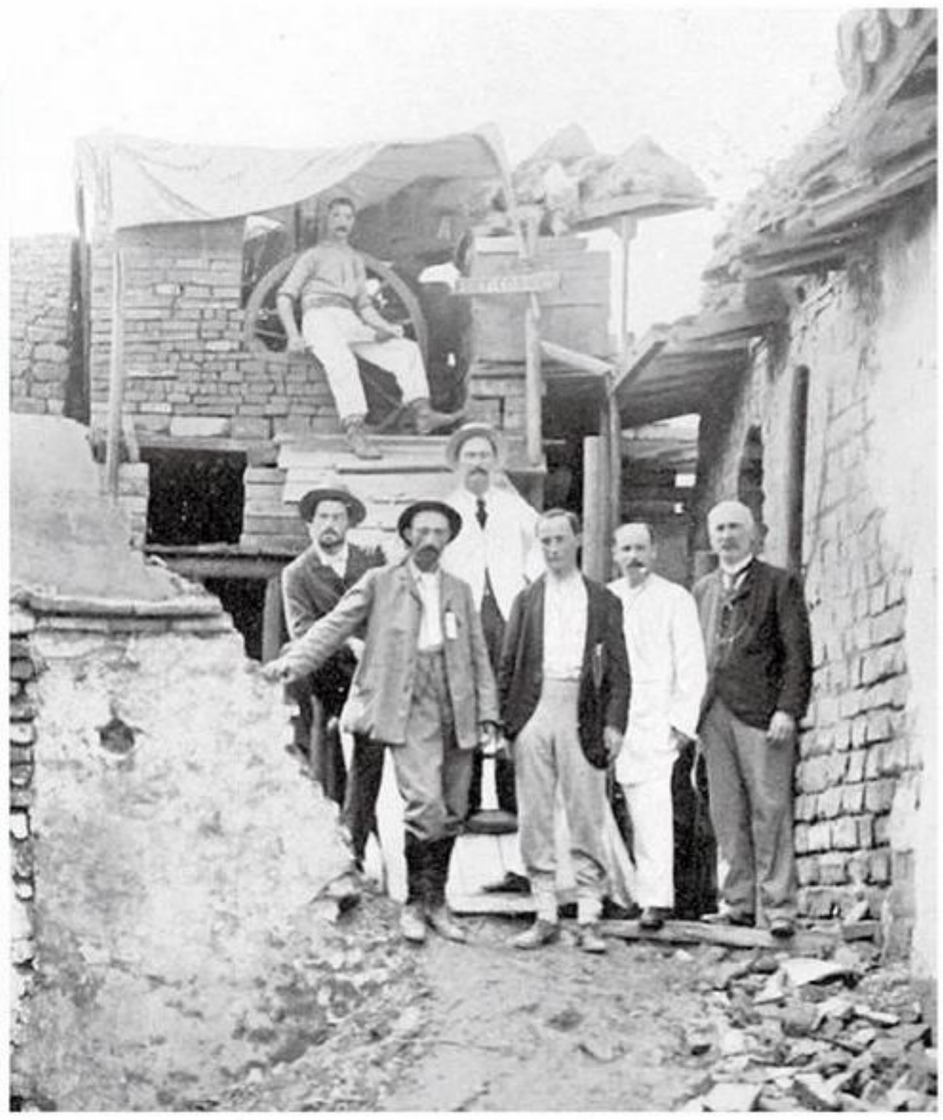
「兵匪焚掠京師」是義和團、清兵禍國殃民的高潮。庚子年 6 月 7 日起，義和團大舉進京，致使「紅巾滿都市」。義和團「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宮內也是神壇香案充斥，眾太監唸唸有詞誦符咒。李蓮英亦陪著慈禧拜神唸咒。慈禧每念一遍，李蓮英便高呼：『又有一個洋鬼子被老佛爺咒死了！』」[172] 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並於六月九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爲折服，並親自習畫「靈符」[173]。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端王等人穿起義和團服裝，學習唸咒請神。「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京城在各地「設點發米」，供應拳民。6 月 9 日董福祥的甘軍入城；這支「回子兵」軍紀敗壞，惡名遠揚。「由是兵匪遂合而爲一，益肆無忌憚，任意焚掠」[174]（董福祥與義和團首領李來中結拜爲兄弟）。當時義和團營中流行的順口溜「吃麵不擱醬，炮打交民巷；吃麵不擱醋，炮打西什庫」就是他們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自供狀。「逢吃教者，無論男婦老少，隨意殺在當街矣，無人

過問。教民之屋，無論市房住宅，任意焚燒燬折，無人敢救。」[175]「崇文門內，屍如山積，燈市口、勾欄胡同、大柵欄、珠寶市等處，被害尤甚」[176]。「拿起鏟刀片，好把鬼子砍。練好義和拳，洋人變泥灘」[177]。「市區內屬於 7 個外國傳教士機構的 34 所住宅、18 座教堂、12 所男童學校、11 所女童學校、4 所職業訓練學校、11 個藥房和 7 間醫院，均被義和團摧毀。英國外交官在西山造價高昂的新別墅以及（在西山）屬於教會的 33 個產業被焚燬殆盡；裡面的財物被附近的村民搶掠一空。」[178]

在義和團的恐怖殺戮之中，公使館的外國人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市區拯救中國教民和他們的家人。6 月 16 日晨，他們去天主教西禮拜堂（西直門教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中，多爲教民家屬所居，拳匪到處搜殺，被殺者已不少，有數胡同屍骸遍布，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屍，堆置一處，有裂成數塊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動，其象尤爲可慘。予等漸集難民於一處，其數愈集愈多，有婦女經此恐嚇，成爲癱瘓者；有須臾之間，全家只餘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瘋顛。予等頭上均滿汙血跡，有數人已不能耐，無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見野蠻殘忍之情形，至於此極也。」[179]

同樣的慘劇發生在北京天主教南堂。「6 月 2 日，俄兵三十人，美軍十五人，前往天主教南堂，搭救遇劫基督徒。天主教南堂，爲一六五零年，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神父所建，乃京城首座天主教大教堂。俄美軍人趕到時，南堂正遭義和團武裝洗劫，洋軍隨即與之交火……洋軍救出華人教徒三百餘人，送北館暫避。是日，南堂基督徒死傷慘重，據俄檔案《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至八月二日》載：『眾多基督徒慘遭傷害，南堂遭毀，焚燒殆盡。婦孺老叟，未及逃遁，屍骸遍地。獲救教徒，跪伏於地，哀慟嚎啕，舉止失控，已逾精神崩潰。』」[180]

英國公使館加固外牆抵禦清軍



使館內倖存的六位牧師，後坐者是英兵墨菲

義和團濫殺無辜到何等程度，御河橋上的屠殺是又一個例證。團匪「擁三百餘人於御河橋，皆手刃之」。一個團匪在認出一個熟人後高喊：那個人我認識，他不是二毛子，別殺他。持刀殺人的團匪回答說：他死後在陰間入教吧，這樣就不冤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殺害[181]。義和團連教會慈善機構收容的傷殘者和嬰幼兒都不放過。例如團匪將柵欄墳塋、嬰孩院、養病院一併焚燬，「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餘人、工人十餘人皆死於匪手」[182]。此外義和團大規模燒殺搶掠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聲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餡不可[183]。義和團還仇恨上海人，因爲上海華洋雜處，十里洋場。「義和團見南人必問曰：爾上海人乎？若應之曰然，則槍刃交下矣。」[184]

京城的婦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駭人聽聞的淫辱、殺戮。「常見奉教婦女途行時，遇義和團即跪下，率被拉去斬之」[185]。英《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記記載：「暴民們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殺來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還把他們家中較漂亮的女孩賣了當妓女」。出生在中國的英人普特南・威爾（即 B. L. Simpson）在《庚子使館被圍記》

中回憶說，在他參加的一次外國使館人員去市區救助華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眞殘忍已極，捆此婦人以火燒之，拋至路旁爲照路之用」。原來這個婦人被「點天燈」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太古一公園内的墓地，埋葬著在山西大屠殺中遇難的基督徒

被摧毀的北京聖約瑟夫天主教堂

義和團出於蒙昧和傳統封建意識，對婦女有一種特別的歧視，認爲女人的身體是汙穢的（至於他們姦淫婦女時的想法，則另當別論）。爲了防止女人身體汙穢的散播，義和團發布禁令，禁止婦女出門。「自此日起，匪黨不令婦人出門，防汙穢也，違則殺之，不知而被害者甚多。」[186]（義和團鼓吹只有「紅燈照」成員才能反制女性的不潔淨，「紅燈照儘是少女幼婦，故不畏髒穢之物耳」[187]。）

姦殺以發洩獸性，搶掠以財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貨等物，搜搶一空，飽載而歸，謂之淨宅」[188]。「凡有富厚之家，皆指爲教民，則所掠無算……盜賊所不敢爲者，彼乃公然爲之」[189]，連京城的高官顯宦、豪門府邸亦被殃及。大學士徐桐視滅洋「爲數千年來第一快事」[190]，但義和團搶劫起來是六親不認的。團匪闖進他的府第，擄劫其家眷。徐桐「見勢不佳，不得已長跪團匪頭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

什物付諸一炬矣」[191]。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燬。尚書孫家鼐家居東單頭條，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下體盡裸，而匪猶未滿，以槍擬尚書，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銀——引者註）」[192]。尚書徐用儀和立山「其邸第即爲拳匪搶劫一空」[193]。「貝子溥倫等家的府弟亦皆罹劫」。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華工作了半個世紀，他畢生積蓄被義和團洗劫一空。義和團的搶掠如此猖獗，以至於京城流行著一首童謠：「大師兄，大師兄，你拿錶，我拿鐘；師兄師兄快下體，我搶麥子你搶米」[194]。

「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令住戶人等，不得收藏洋貨，燃點洋燈。於是家家將煤油或箱或桶潑之於街。又傳言殺儘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洋書付之一炬」[195]。「又哄傳各家不准存留外國洋貨，無論鉅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燬，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196]

教民離開北京逃難

被義和團焚毀的北京正陽門城樓

城區遭難，郊野亦然。「京畿村市，無論民教，概被團黨搶劫焚燬。村民扶老攜幼，爭先逃難，哭聲遍野。」[197]「團匪現在無論好歹，並不問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殺害，已有數十處村莊居民，均已逃往他處避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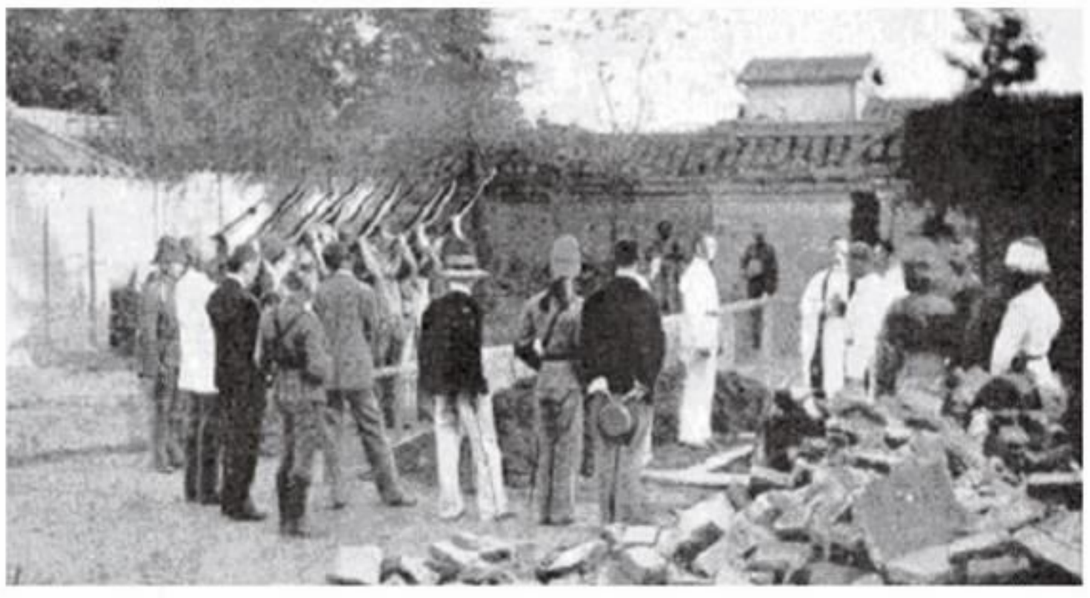
故各村業已人跡一空」[198]。民眾在逃難途中仍難逃厄運。團匪對「所有行囊包裹，無論鉅細，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銀錢洋貨之物，盡數扣留，輕則空身釋放，重則解送莊王府究懲。貧苦小民或可捐資贖放，富厚之家無一倖免，性命依然未逃，錢財大半蕩盡。」[199]

義和團的另一項「專長」是放火。放火不僅是他們發洩仇恨、肆意破壞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們「作法」以揚威的騙局。「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爲最長」[200]；以至於「見火起之處，即知彼拳匪所到之處」[201]。歷史文獻《西巡迴鑾始末》有「兵匪焚掠京師記」章節，其中半數文字談及清兵拳匪之縱火。縱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畫，又向土中作符篆狀，眾齊聲呼曰：『照！』火立發」。其實拳匪「預伏人於屋中，施火油以應之」[202]。6 月 16 日義和團在前門外大柵欄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藥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聽其指揮而不許撲救，結果沖天火焰延燒 3 日不滅，把京城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廢墟。千餘家鉅商大鋪、7 千餘間民宅化爲灰燼；正陽門城樓亦被燒塌（國人後來把正陽門城樓被毀栽到了八國聯軍身上）。京師 24 家鑄銀廠全部被焚燬，所有錢莊銀行不得不停業。通貨既無，市場交易被迫停止[203]。「自此以後，無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204]。

被義和團和清兵焚劫之後的北京街區

義和團無法無天，囂張到了縱火焚燒清政府各部的衙門。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確記載被義和團焚燒的就有吏部、禮部和戶部衙署。「自各部衙門被焚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逃避匪亂[205]。至於焚燬中國海關辦事處、郵政局、外國銀行，更是不在話下。截止到 8 月 15 日聯軍破城，史料明確記載的京城大火就有 71 起；幾乎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義和團湧入並占領北京的 6 月份發生的[206]。

清軍也不甘後人。「二十六日（西曆 6 月 22 日——引者註）九點鐘時，各街巷聞槍聲忽作，叫囂哭喊之聲，無異雷震。是爲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則取其次者。約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攫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槍無數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尚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兵丁。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尚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爲鄰，故受禍尤慘也……是日命婦（國家或君主正式冊封封號或爵位、甚至擁有食邑的女性——引者註）之爲兵戕害者亦有數人，小民更難數計。」[207]7 月 15 日，「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御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軍槍擊火焚」[208]。八國聯軍逼近北京，「從 8 月 9 日開始，甘軍、武衛中軍『連日三五爲群，持刀直入官紳宅第，搶奪騾馬車輛，聲稱借用』。清兵、拳匪在城內大肆搶劫，米鋪、當鋪、錢鋪，均被搶劫」[209]。8 月 15 日聯軍破京，清軍和拳匪潰逃前肆行洗劫，飽掠而去：「各路武衛軍隊，也四散奔逃。還有這班義和團，統已改易前裝，大肆搶掠。可憐潰兵敗匪，擠做一糟，百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210]



英國公使館內為死難者舉行葬禮

拳匪、清兵兩個月的恣意暴行、燒殺搶掠，使京城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天熱屍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當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外國記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被義和團拳民和中國人毀壞殆盡。這個事實可以向人證明，北京已是一座廢墟之城。各處的外國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國人，同情中國基督徒或有財產的中國人都被屠殺了。」[211]

義和團禍國殃民，惡貫滿盈。在八國聯軍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獸散。匪首張德成在天津被聯軍攻占前夕，「亟席捲所有逃去」[212]；後於直隸（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巨款被百姓圍攻，白刃齊下，剁成一堆肉[213]。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潛歸故里（河北靜海縣），被村民綁縛送官，凌遲處死[214]。

拳匪首領曹福田的塑像赫然
豎立在今日之中國

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終獲
八國聯軍解救

清末民初，義和團是「邪教」、「土匪」、「劫盜」乃朝野的共識。1949 年之後，「黑手高懸霸王鞭」，拳匪也翻身了，被吹捧爲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英雄、鬥士；庚子之亂被吹噓爲「威震中外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試問，義和團「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大搶掠與反侵略有何相干？所謂「扶清滅洋」，招牌而已。「只因燒殺搶掠、綁票勒贖向爲社會所不齒，並爲歷代官府所不容，義和團的頭目們……特創了『扶清滅洋』的口號」[215]。當拳首號召、動員拳眾時，則拋開這個口號，說出了心裡話：「今焚燒教堂，收沒二洋人（指教民）資產，報仇洩恨，以圖富貴，千載一時也」[216]。拳亂之初「各鄉村團民，尚多粗食布衣」；之後便「衣多綢縐，人人洋洋得意，誇富爭榮」[217]。

義和拳民

至於說到義和拳民的作戰表現，如果說清軍在庚子戰爭中常常是一觸即潰，拳民則是未觸先潰，望風而逃。戰爭之始，一些拳民被首領蒙蔽，以爲吞符唸咒，神術可恃，尚敢衝鋒陷陣。遇到傷亡後，「拳眾漸知槍砲之不可避，遇西兵則相率鼠竄」[218]。實際上，戰爭開始以後，絕大多數拳民仍在到處打洋教、發洋財，燒殺搶掠，根本沒有投入抵抗聯軍的戰鬥[219]。「該團日以仇教爲名四出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爲心」[220]。偶上戰陣，義和團「臨陣以童子爲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

前隊倒斃，即反奔」[221]；所以死在戰場上的以童子爲主。「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除了 1900 年 5 月 18 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 4 名義大利兵（見《庚子中外戰紀》）外，實際並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222] 拳匪首領張德成一次率大隊人馬進犯天津紫竹林租界；「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223] 就連起初被義和團蠱惑的直隸總督裕祿，後來也向朝廷奏報義和團的臨陣脫逃、假冒戰功：「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藉口時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224]「每聲張臨敵，率皆繞城而行，去敵尚遠，群伏屋角籬根，須臾肅隊而歸，輒喧呼曰『大得全勝』」。聯軍攻占天津，「所有拳眾，都脫去了紅衣，撕去了符咒，手執大日本順民，大英國順民，大法國順民，大俄國順民，大德國順民等旗號，爭著跪接洋兵了。那些紅燈照，也都脫去紅衣，逃入娼寮當婊子去了」[225]。「天津陷，殘（拳）匪爭解巾帶……且多有迎降引導者。向者目洋人爲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226]。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時，「義和團外鄉之人，連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裝易服。一日一夜之間，數十萬團民蹤跡全無，比來時尤覺迅速也」[227]。「洋兵破城，遂變紅巾而爲洋僕」[228]；「曩者爲拳匪者，今多自稱奉（洋）教」。

梁啟超對義和團作過這樣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樹扶清滅洋之旗者，其後聯軍入京，即相持順民旗作乞憐之狀。」[229] 嚴復對義和團如此蓋棺論定：「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

矣」[230]。歷史會公正地將義和團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庚子戰後為「山西教案」死難者舉行的悼念儀式

奇觀七：傳教士恩重如山，中國恩將仇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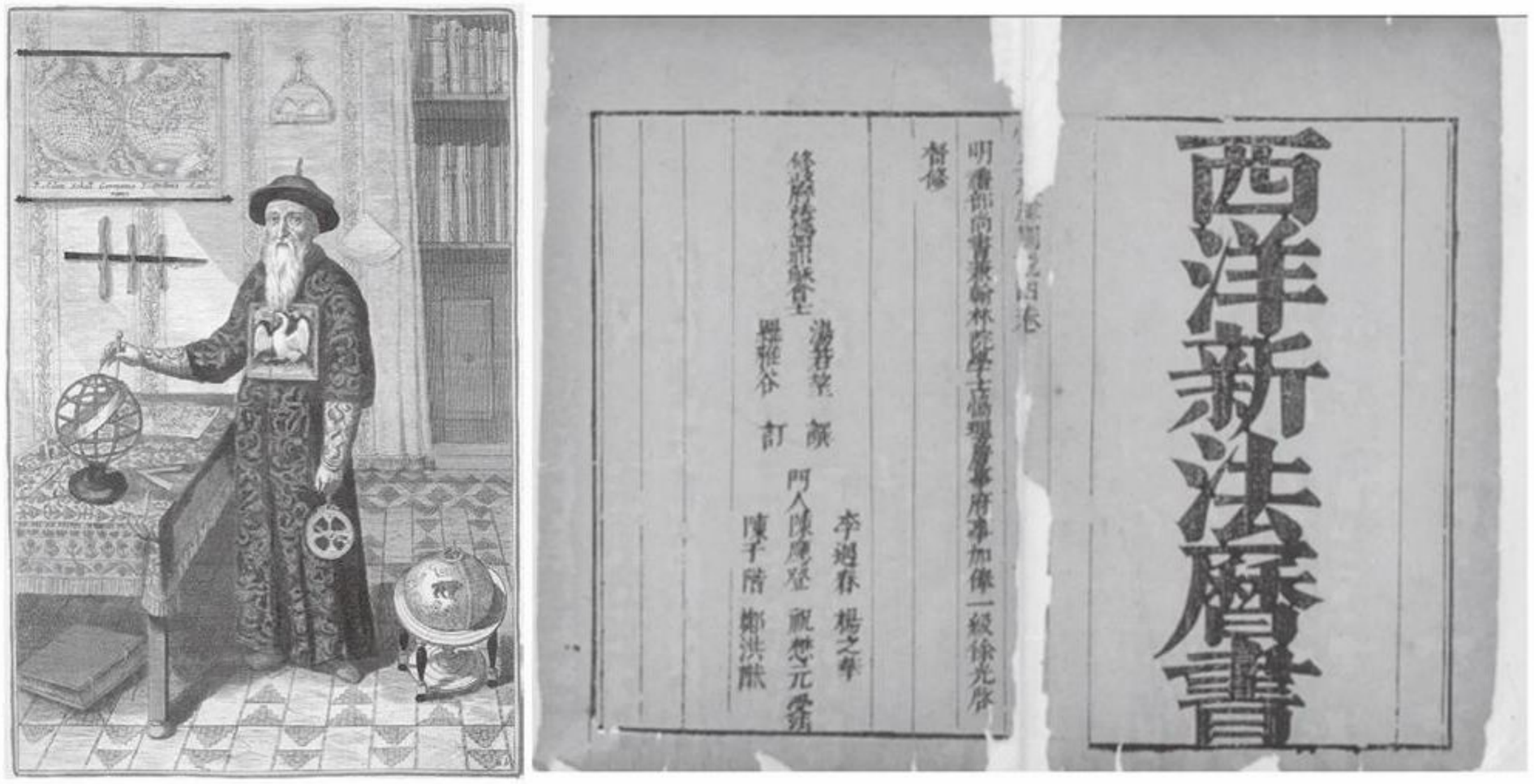
庚子之亂對基督教規模空前、手段兇殘的宗教迫害，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個國家的恩將仇報之舉。

對庚子之亂這場「滅洋、滅教」的浩劫、殺戮，國人罕有懺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詞：中國人痛恨洋人傳教，因爲那是「爲帝國主義侵略打頭陣」，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中國人痛恨「二毛子」，因爲他們仰仗洋人的勢力，橫行鄉里，欺侮同胞。凡是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瞭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談。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教授說得好：「現在，無數的中國人提起傳教士，還只說那都是鴉片販子、外國間諜、文化侵略等，這不是讓人覺得這個民族驚人的無知、驚人的健忘或驚人的忘恩負義嗎？」

義和團和清軍殘殺外國傳教士

「基督教始終主張全人類的得救」[231]；傳教士的使命是傳播「信耶

穌，得永生」的福音。那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他們含辛茹苦、涉險犯難，在中國傳播福音的同時，本著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大力興辦慈善、醫療和教育事業，救助窮苦，醫治傷病，普及教育，傳播科學知識和現代文明理念，誠爲可欽可敬的仁人志士。「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教……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經過教廷選拔而爲宗教獻身的聖徒」[232]。他們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是德國天主教神父湯若望。這位博學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曆法修訂、火炮製造、採礦冶金技術均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聲望如此之高，生前被孝莊皇太后認作教父[233]，死後被康熙帝讚譽「垂不朽之榮」[234]（雖然湯若望也曾遭受過奸佞的迫害）。至於那些皈依基督教的華人，「考察史實，絕大多數教民皆爲安分守己的良民」，「據《清末教案》所載 1842 至 1861 年各省封疆大吏 8 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發現教民有不法行爲」[235]。入教以謀私利在所難免，尤其是在剛剛皈依時。其絕大多數是窮人，教會的慷慨施捨（衣、食、醫藥、教育）對他們確有吸引力。初時被『利』吸引，逐漸爲『義』感化；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準高於常人是不爭的事實。教會對信徒有嚴格的戒律約束和道德規範。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始於天主教會。雖然教會的傳道、布道對民眾敞開大門，教會的慷慨施捨廣被於城市鄉間，但是被教會正式接納爲信徒，手續是嚴格的：「成年的中國人對天主教表示感興趣以後，要經過一個領受信仰精髓的持久的教誨過程，有時要經過幾年才最後給他們施洗禮。」[236] 基督教新教對皈依者也有嚴格的要求：「新教傳教士對於領受聖歹者的要求傾向於嚴格（聖歹：基督教的主要儀式之一，是一種對耶酥的崇拜儀典——引者註），因此，新教徒中間『好教徒』的百分數比天主教徒多」[237]。



身著清朝官服、為中國創制「西洋新法曆書」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造了令人驚歎、數不勝數的「第一」！中國第一個西醫診所，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與李文斯頓醫生一起，於 1820 年在廣州創辦的。中國第一所西醫醫院，是美國傳教士伯駕於 1835 年開辦的廣州博濟醫院。中國第一所婦產醫院，是美國傳教士道濟於 1871 年在北京創辦的道濟醫院。中國第一所痲瘋病院，由傳教士傅德於 1891 年在廣東創辦。中國第一所瘋人院，由美國傳教士嘉約翰於 1898 年在廣州創辦。中國確診的第一例血吸蟲病人，是美國傳教士羅感恩於 1903 年在湖南常德發現瘧原蟲和鉤蟲卵後診斷的（羅感恩爲治療、控制血吸蟲病和其他流行病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第一個牙科診所，是加拿大傳教士林則博士於 1907 年在成都創辦的仁濟牙科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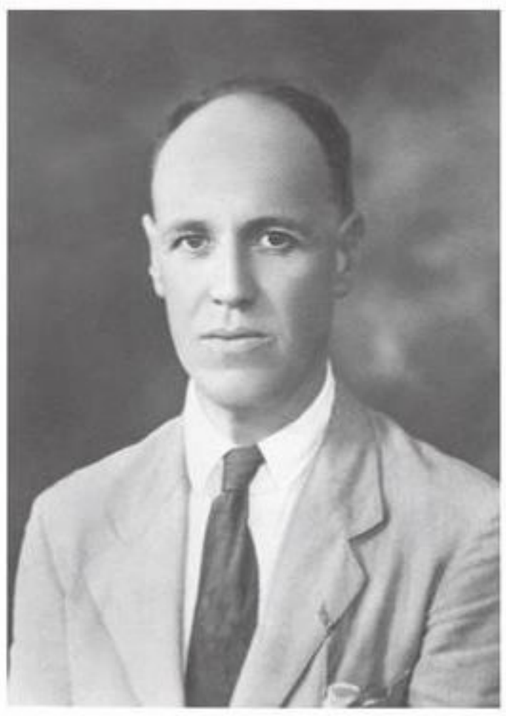
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由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夫人和美國耶魯大學的包留雲 1837 年在澳門建立；招收的第一批學生容閎、黃寬、黃勝成爲 10 年後由美國傳教士布朗帶到紐約留學的中國第一批留學生。中國最早的盲文——康熙盲字，是蘇格蘭聖經公會傳教士威廉 · 穆瑞創製的。1874 年他在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盲校——瞽叟通文館，教導盲人讀書識字。中國第一所聾啞學校，由美國傳教士米爾斯夫婦於 1887 年在山東登州（今

蓬萊）創辦。中國第一家幼稚園，由英國基督教長老公會的牧師韋玉振夫婦於 1898 年在福建廈門鼓浪嶼創辦。

中國第一所科技學校「格致書院」（格致：自然科學）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於 1874 年在上海創辦。次年，傅蘭雅出版發行了中國第一本科技雜誌《格致彙編》。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由英國傳教士阿爾德塞女士於 1844 年在寧波創辦。中國第一所女子醫科學校——廣州女子醫學校（即後來的夏葛醫學院），由美國傳教士醫生富馬利於 1899 年在廣州創辦。中國第一所大學——山東登州文會館（齊魯大學前身），由美國傳教士狄考文於 1882 年創辦。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是英美教會於 1905 年在北京合辦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後併入燕京大學）。中國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大學，是 20 世紀初由英美教會創辦的燕京大學。

中國第一個公共圖書館是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圖書館。中國第一套漢語拼音方案是 16 世紀 80 年代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羅明堅創造的，成爲後世一切漢語拼音方案的鼻祖。中國第一部英漢—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以中文字典之集大成者《康熙字典》爲據，歷時 7 年編撰而成，所用中文參考書達萬卷之多，1815 年東印度公司出資刊印，字典長達 4595 頁。中國第一份中文期刊，名《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由蘇格蘭傳教士米憐於 1815 年 8 月創辦。

遠涉重洋來華的西方傳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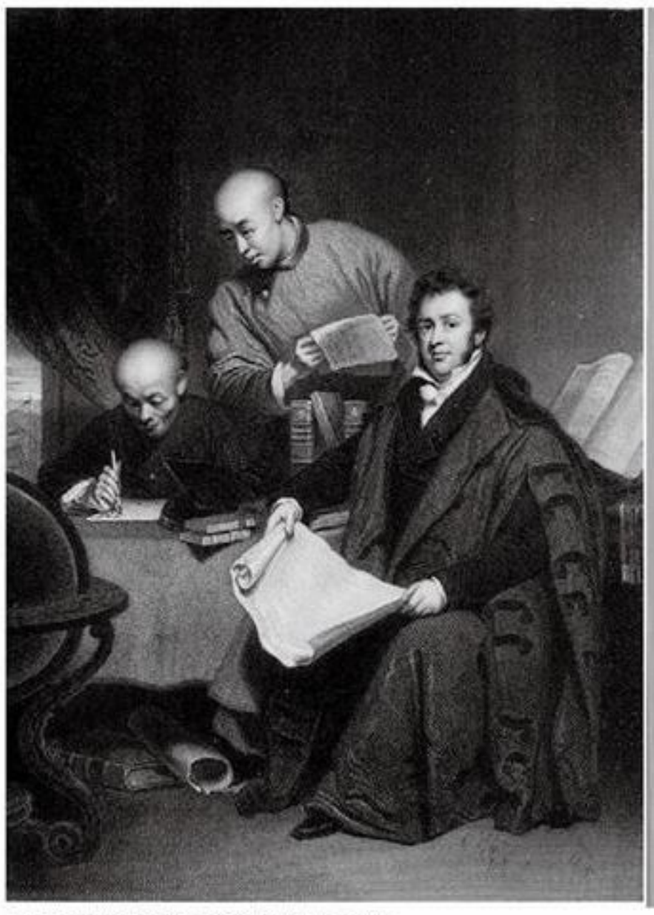


為傈僳人造字的富能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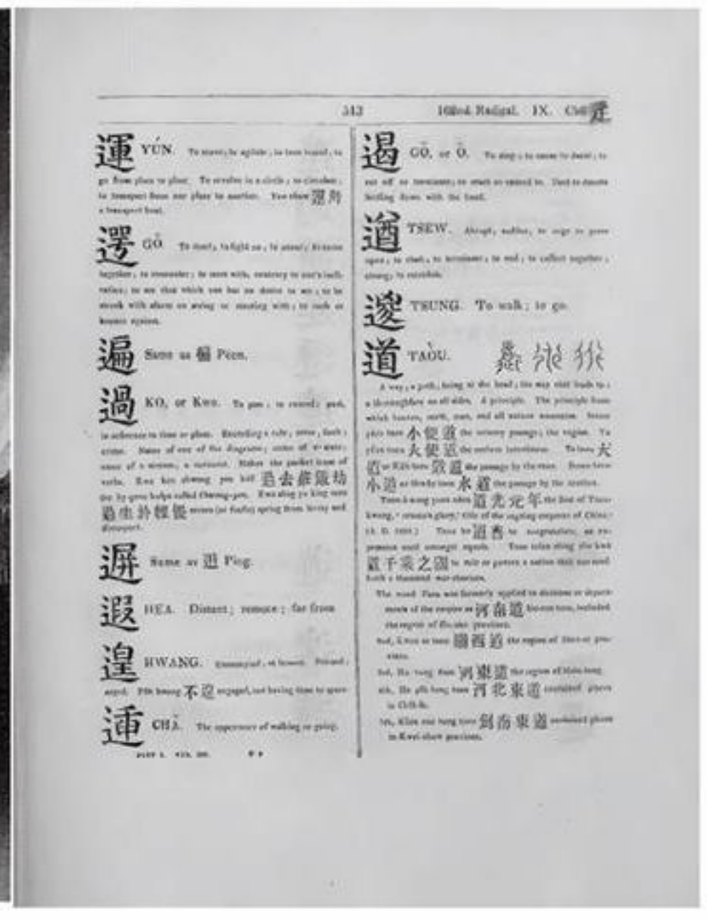
中國第一位西醫醫生黃寬，1847 年隨傳教士布朗夫婦赴美，1857 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858 年回國行醫。中國第一位女留學生、寧波的金雅妹於 1872 年（8 歲時）由養父、美國傳教士醫師麥嘉締帶去日本學習，1881 年赴美國學醫，1888 年學成歸國。中國第一個戒（鴉片）煙所，是英國傳教士慕雅德於 1869 年在寧波成立的。中國第一個反對婦女纏足的組織——天足會，是英國傳教士約翰 · 麥克高望於 1874 年在廈門成立的。第一個幫助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也是基督教會，比如英國傳教士富能仁爲雲南邊陲的傈僳族人創造了拼音文字。

中國的第一張全國地圖和（各省）分省地圖是外國傳教士兼科學家用 9 年時間爲康熙帝繪製的。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1584 年在廣東製作的，先後被十二次刻印。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漢語詞彙皆首創於此地圖。中國第一個氣象臺——上海徐家匯氣象臺是 1873 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創建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是康熙帝在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和法國傳教士張誠的協助下締結的。中國第一部基於西方天文學理論的曆書《西洋新法曆書》是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爲中國創制的；參與者爲耶酥會傳教士湯若望（日耳曼人）、龍華民（義大利人）、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等。此曆書一直沿用至今（即俗稱的「農曆」）。

興辦登州文會館的狄考文



馬禮遜與華英字典



72

Photo by Ottavius Davis, Edinburgh.

THE REV. W. H. MURRAY.

80922

The Inventor

OF

The Numeral-Type For China

BY THE USE OF WHICH

ILLITERATE CHINESE
BOTH BLIND AND SIGHTED

CAN VERY QUICKLY

BE TAUGHT TO READ AND WRITE FLUENTLY

BY

CONSTANCE F. GORDON-CUMMING

AUTHOR OF "WANDERINGS IN CHINA," "AT HOME IN FIJI," "FIRE FOUNTAINS OF HAWAII," ETC. (PUBLISHED BY BLACKWOOD)
"TWO HAPPY YEARS IN CEYLON," ETC. (PUBLISHED BY CHATTO AND WINDUS)

A NEW EDITION

DOWNEY & CO. LTD.
12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1899

製作第一套漢字盲文的威廉 · 穆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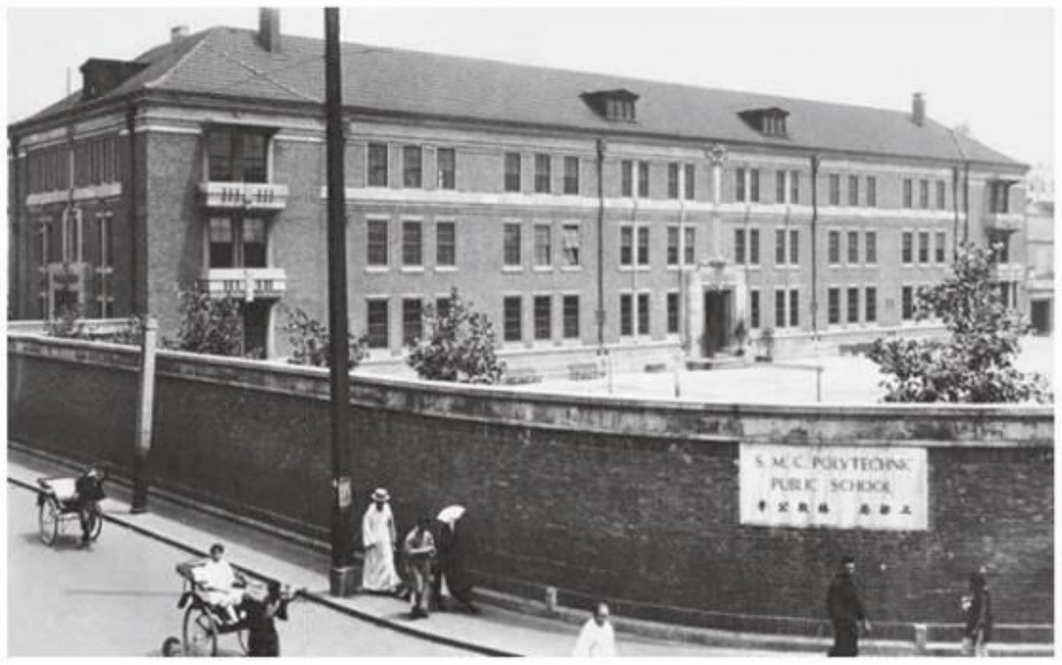
創辦登州啓喑學館的米爾斯

第一所孤兒院

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

第一所女子學堂

第一份現代報紙



傅蘭雅與他創辦的格致書院

第一間西式醫院

「19 世紀中葉以來，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東傳是中國宗教史上的重大變化，亦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大轉折，其社會影響是極其深刻的……育嬰慈善慈幼事業是教會在中國興辦的近代慈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慈幼機構」[238]。教會興辦的慈善慈幼事業，不僅規模宏大，覆蓋廣泛，而且在種類上開中國千古之未有，比如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

「西方教會在華創辦的所有慈幼機構中，育嬰堂和孤兒院是最主要的」[239]。教會的悲憫慈愛、救助嬰幼，從下面的一個事例可見端倪。1892 年，察哈爾省（今河北北部）發生大饑荒。在饑荒初起的第一個月內，當地的基督教堂就收養了 1,500 名被丟棄的嬰兒[240]。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官方還是私人，誰在饑荒之中，在短期內收養過這麼多棄嬰，如同天使，拯救了這麼多幼小的生命？（這場飢荒中，中蒙古代牧區主教巴耆賢籌借了 5 萬法郎從事救濟災民的工作。[241]）

1892 年廈門教會育嬰堂收養的棄兒

外國修女和她們收養的孤兒（以被丟棄的女孩和殘疾兒居多）

基督教會的慈幼機構不僅爲數眾多，救濟廣泛，而且比中國舊式的育嬰堂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例如舊式育嬰堂，女童的出路往往是賣出去作童養媳。在丟棄女嬰成風的中國，這注定了不少女孩子不幸的人生。對基督教會而言，孤兒院出賣孩子以贏利是不可思議之事（哪怕這種商業行爲是爲了維持孤兒院的運作）。教會爲辦孤兒院投入了大量資金。比如早在 1843 年，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即在上海設立聖嬰會，花錢去贖買將被遺棄的孩童，並開始著手建立孤兒院[242]。「教會所辦的慈幼機構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慈善救助方式。每遇災荒或戰亂，大量的嬰孩被遺棄，教會則將之收入，給以衣食。」[243] 收養之後，則注重施教；除了教授文化知識，在到達一定年齡後還進行職業技能訓練。在文化學習方面，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是，學習的目的不是爲了應科舉，而是積累知識，包括現代科學知識和外文。爲了孩子以後的生存和發展，孤兒院同時重視職業技能的訓練；「而在傳授技能時，教會還提供一些勞動實踐機會，即提倡『教』與『工』的結合。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一定年歲的男孤學習縫紉、木工、製鞋、印刷等技術；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製鞋、雕刻、油漆、紡織以及農田耕種等活兒，並設立一所印書館，讓孩童進行實際操作。」[244] 對女性孤兒，學習「女紅」（針線、紡織、刺繡、縫紉等）也往往是必修課。對被社會遺棄的嬰幼兒，基督教會不僅拯救了他們的生命，給予他們衣食、教育和職業訓練，而且向他們幼小的心靈傾注了終生受用不盡的至寶——愛。

土山灣孤兒院的孩子在傳教士指導下學習雕刻

教會孤兒院的女童在學習女紅

以上海土山灣孤兒院爲例，看看基督教會在慈幼事業中具體是如何運作的。「1840 年，以法國耶穌會爲主的大批外國傳教士來到上海，在徐家匯建造天主堂、修道院、天文臺、藏書樓、教會學校、慈善機構等，形成了上海天主教教務中心」[245]。耶穌會的「第一批傳教士在 1842 年夏天抵達了上海港。很快，他們被他們所看到的，上海縣城和其周遍郊區的大量溺嬰和棄嬰震撼了……收養棄兒和那些父母利己主義的受害者，並使他們免於死亡，迅速成了耶穌會士最重要的事業。」[246] 傳教士們先是將這些棄兒分散收養。當耶穌會設立的聖嬰會籌集到足夠的資金後，在上海徐家匯購置土地，平整山丘，建立了土山灣孤兒院。孤兒院占地 85 畝，建有平房、樓房共 34 間，前後收容孤兒 2,500 餘人。這些孤兒們得到教會收養，不僅得以生存，而且衣食無憂，健康成長。當他們到達入學年令時，孤兒院爲他們安排了系統的課程，不僅傳授知識，開啟才智，而且到一定年令還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上午 7 至 9 點，上國語、代數、物理、化學、地理、外語等課程；下午 1 點半至 3 點，上修身、打樣（工藝美術課——引者註）等課程。每日除上課外，其餘時間在工藝訓練所實習雕刻、木工、鐵工、機械等工藝。……孤兒年滿 12 歲就可以開始學藝，6 年畢業後，可選擇留院工作或外出謀生。」[247] 在 19 世紀中葉，這些孤兒就得到代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學的教育，以及外國語的訓練；與中國當時皓首於四書五經、沉迷於子曰詩云、埋首於八股文章的讀書人相比，恐怕算得上是特別有學問的了。

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創辦的上海土山灣孤兒院

天主教修女懷抱中國孤兒

「土山灣孤兒院在撫養孤兒之餘，還創辦了土山灣孤兒工藝院，對繪畫、雕塑、印刷、木刻、金工等藝術領域都有所涉及，很多新工藝都發源於此，土山灣對中國近代繪畫、照相、印刷出版、海派雕刻等手工技藝有著深遠的影響……書畫大師任伯年、劉海粟、徐悲鴻都曾在此任教。徐悲鴻……稱土山灣畫館爲「中國西洋畫的搖籃」。中國雕塑藝術奠基人張充仁、雕刻工藝大師徐寶慶均在土山灣開始了藝術啟蒙」[248]；因此土山灣孤兒工藝院不僅是「中國西洋畫的搖籃」，也是公認的中國近代工藝美術的搖籃。基督教會把慈善慈幼事業竟然辦得如此碩果累累、燦爛輝煌。

「土山灣印書館是土山灣孤兒院的另一個重要機構，『分石印、鉛印、五彩印等名目，所印中西書籍，久已膾炙人口。』在這裡，教會教孩子們排版、印刷、雕刻、石版畫等相關技能。」「1874 年，土山灣工藝院購進滬上第一家鉛字印刷廠，開始現代印刷事業。在公共租界英國倫敦會墨海書館歇業後，土山灣成爲上海最重要的現代印刷廠。同年，土山灣印書館從歐洲進口石印設備，次年又引進珂羅版技術，是中國最早使用石印和珂羅版印製技術的機構；1894 年，土山灣印書館成立照相製版部，在中國首次引進照相版技術。」[249] 孤兒院的學生有幸成爲中國掌握現代印刷技術的第一批技師。

土山灣孤兒院辦得如此出色，對社會的貢獻如此之大，當一些歐洲名人去參觀時，「他們看到的景象使他們目瞪口呆。英國領事阿禮國先生（後晉爵），曾在英國陸軍少校陪同下參觀孤兒院，他寫道：『只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們可以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成就如此偉大的事業。』」[250]

「19 世紀 5、60 年代以後，隨著基督教勢力的進一步擴張，教會舉辦的慈幼機構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爲數眾多。從有關文獻著述來看，『屬於法國系統的天主教辦的較大育嬰堂或孤兒院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南昌、青島、武漢、重慶、貴陽、長沙、廣州等地』……英國天主教

所屬各差會也在中國創辦了一些慈幼機構……另外，美、德、義大利等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也在華建有育嬰堂或孤兒院……另據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前身，由中、西委員共 51 人組成——引者註）的調查統計，清末民初 20 年間 (1901 ～ 1920)，西方各國天主教差會在中國創辦了 150 多所孤兒院，廣泛分布於蘇、浙、皖、粵、蒙、直等省區，累計收養的孤兒在 1.5 萬人以上，其中多數爲女孤。」[251] 這僅僅是對天主教會在 1901 ～ 1920 短短 20 年間在中國創辦的孤兒院的統計。自然，基督教新教教會也同樣熱心地在中國創辦慈幼機構，救助嬰幼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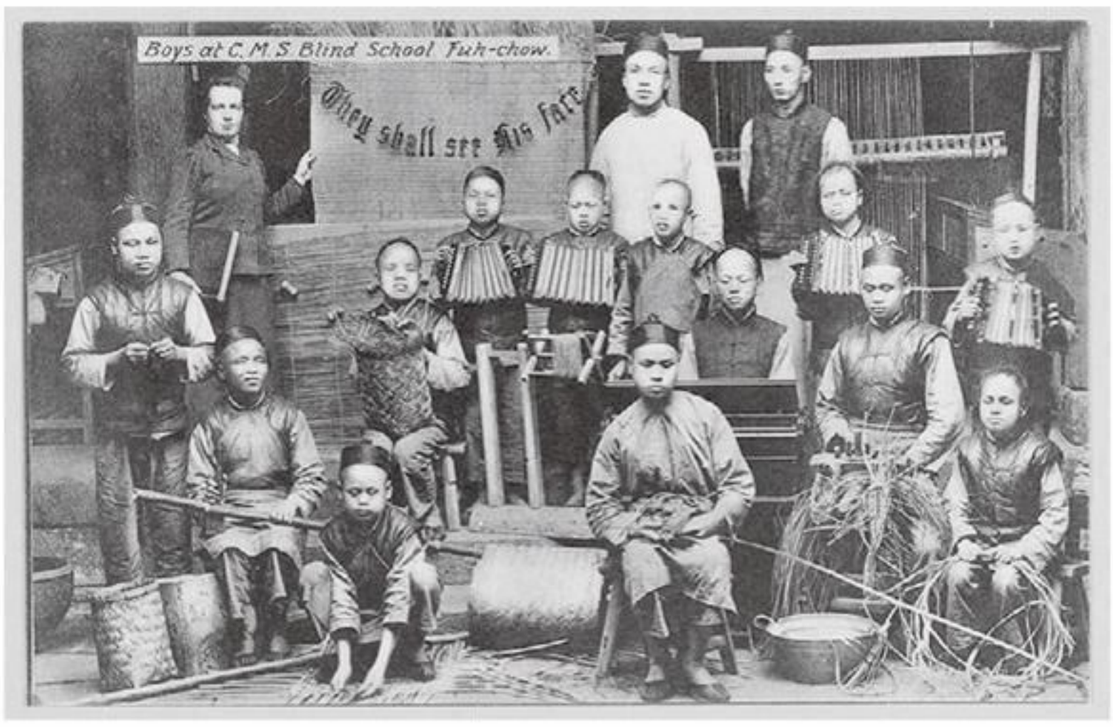
基督教會辦的孤兒院

1892 年廈門教會育嬰堂收養的棄兒

「除育嬰堂、孤兒院之外，外國傳教士創辦的慈幼機構還有盲童學校、聾啞人學校，對殘疾兒童進行特殊的慈善教育。創辦盲童學校的教會，主要有循道會、信義會、宣聖公會、浸信會、路德會和北美長老會（均爲新教教會——引者註）等。如，漢口最早的一所盲人學校——訓盲書院，即由循道會李修善（英國傳教士——引者註）於 1888 年創辦，學制爲 4 年學藝、5 至 7 年學科。」漢口訓盲書院的教學法對近代中國殘疾人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李修善在教學實踐中根據中國語言的特點創造了盲文——聲母韻母法，非常簡便易學，遂被推而廣之，爲全國各盲校普遍使用。傳教士辦的盲童學校還專門爲盲童印刷了許多盲文書籍，供他們閱讀。「根據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的不完全統計，1920 年，全國

有 12 省區建有盲人學校 24 所，在校女盲童 488 人，另有成年女盲人 10 人，男盲童 204 人，共計 702 人。就全國範圍而言，據估測，教會在華創辦的盲校至少不低於 30 所，在校盲童人數也在千人以上。就整個近代期間而言，經盲校培訓教育獲得一技之長的盲人亦將是數以千計。總之，西方教會在近代創設的盲童學校，不僅對盲童予以收養，供給衣食，而且爲盲人立身社會、掌握生活技能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幫助。」[252]

基督教會 1874 年創辦的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



西方傳教士在給盲童上音樂課

爲了幫助不幸的聾啞人，西方傳教士創辦了中國亙古未有的聾啞學校。第一所聾啞學校是美國傳教士米爾斯夫婦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的。1887 年，米爾斯夫人用美國羅徹斯特聾啞學校贈送的 50 美元，開始在登州招收聾啞人入學。次年，學館取名「登州啟喑學館」。學館採用羅徹斯特聾啞學校的教材，並且創造性地根據中國語言的特點，自編了《啟喑初析》教材，用口語、手指語和手勢語教學。由於當時國人對聾兒教育不理解，因此開辦之初，只招來兩名學生。入學之後，其中一個學生進步很快，學會了寫 700 個字，認識 1,330 多個漢字，並且能分辨出方言在音節上發音輕重的不同，彰顯了聾啞教育的成效。米爾斯夫婦克服辦學過程中的種種困難，學校逐漸擴展，學生人數不斷增加[253]。他們的創舉和辛勞爲其他西方傳教士在這個慈善領域開闢了道路；繼之而來的有北京交道口教堂聾啞學校、武昌聾啞學校等。

賑濟慈善事業是基督教會在中國興辦的慈善事業中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 世紀 70 年代之前，教會的災荒救濟限於個別西方傳教士爲救濟中國災民捐款散賑，尚無周密的組織計劃，更未形成相當的規模。教會災荒救濟的轉折點，是光緒初年山東、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華北五省發生的特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山東的旱情發生最早，因此最先引起西方各國駐魯教會及傳教士的注意。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和媒體，向在華的外國人詳細報道了魯西北的災象慘況，於是一些西方人士紛紛解囊賑濟山東災民。正在各地傳福音的西方傳教士，此時也暫停了傳教工作，八方奔走，設法籌募善款，賑濟災民[254]。籍此，教會賑災的組織化也應時而生。

在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大力推動下，「1877 年 3 月，一批傳教士、洋商及外交官員在上海聯合成立了山東賑災委員會。該會會務由英國牧師慕維廉主持，負責各口僑民的募資捐款，而有關災區的散賑事宜，則由李提摩太統一辦理……截至這年 11 月，山東賑災委員會從世界各地募集到賑款 30,361 兩，其中經李提摩太放賑的有 19,119 兩，受助饑民達 7 萬餘人。1877 年夏天，旱災已蔓延至華北五省，更多的外國傳教士也大約在此時進入華北各災區活動。『天主教會修會先後派到災區的傳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會先後派到災區的傳教士有 30 餘人。』於是，外國教會主持的賑濟事業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1878 年 1 月 26 日，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外交官和外商在山東賑委會的基礎之上，聯合組成了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總部設在上海，常務工作由英國牧師托馬斯（後爲慕維廉）主持。在此期間，英美等國的一些大城市，如曼徹斯特、紐約等地，多次舉行公眾集會，備述中國饑荒情形，以爭取其國內工商階層的同情和捐獻。其他國家在華的一些傳教士也盡力相助。至 1879 年底，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共向海內外募得善款 204,560 兩。這些善款分批分期由傳教士

解往災區，再由另一批傳教士分災區負責散賑……他們抱著『救人救徹』的慈善理念，往往選擇官賑所不及之處，在某一特定的災區內進行經常性的賑濟，使賑款眞正能惠及饑民，使之全活。同時，還有不少傳教士不辭辛勞，不憚疫癘，千里奔波於災區，悉心致力於賑務，以至有積勞殞歿者……此外，西方傳教士在『丁戊奇荒』的賑濟活動中還將近代西方組織嚴密、募捐散賑科學的辦賑模式第一次引介和運用到中國，催生了中國東南地區紳商的大規模義賑。」[255]

與中國兒童親密無間的西方傳教士

「丁戊奇荒之後，清末歷次大災幾乎都有傳教士的足跡，教會的賑濟慈善事業有了較大發展。其時傳教士或受差會派遣，或受慈善團體的委託，紛紛前往災區進行勘災、放賑等慈善活動。進入 20 世紀以後，賑災儼然成了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的最重要的活動。」[256]

基督教會不僅對中國慈善事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拯救了千千萬萬的孤兒、殘疾人和饑民，而且教會也是中國現代教育當之無愧的奠基開拓者、普及推廣人。中國的傳統教育，以子曰詩云爲聖訓，四書五經爲經典，科舉考試爲目的。教育的極度落後和扭曲，是國民愚昧、思想禁錮、科技空白、國家貧弱的重要原因。另外，由於民眾普遍生活貧苦，讀不起書，文盲率極高；當時識文斷字者不及人口的萬分之一。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殫精竭慮，在中國開創、推廣現代教育，興辦大、中、小學，出

版現代教育教材，開展識字掃盲運動。基督教會爲普及教育、開啟民智、科學啟蒙，爲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歷史性貢獻。

「傳教士們每到一處，除了傳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會，而是興辦新式學校……在 1876 年，還只有不到 6,000 名學生在傳教士辦的學校就讀，而到了 1889 年就增加至近 17,000 名。那時候，進外國人的學校還被視爲不光彩的事，所以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大多是生活無著的貧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遺棄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兒」[257]。「傳教士辦學，除免費供給學生在教育和生活需用外，又籍派發金錢給學生家長以作招徠」[258]。「到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進教會學校已經蔚然成風，日益成爲中上階層家庭所追求的目標」[259]。「1877 年，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出版各類現代教育教材 59 種，3 萬冊，是爲中國民間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 1914 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 4,100 多所（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據《劍橋中國晚清史》，新教「到 1906 年開辦了近四百所高等專業學校，包括許多大學在內」——引者註）……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從蒙學、小學、中學到大學，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會和傳教士爲中國形成現代教育科學體制開闢出前進的道路。」[260]

1877 年傳教士在中國設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

教會開辦的華中大學開始招收女生

「西方宣教士帶著極大的熱情辦學，教會學校迅速增長：1842 年，

50 所（鴉片戰爭前）；1877 年，347 所（第一屆全國宣教會議）；1899 年，2,000 所（義和團教案前）……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中國矗立起 6,000 多座教堂，幾乎每一座教堂附近，都有一所教會學校……20 世紀頭 10 年，各差會興起聯合辦學的熱潮，教會學校的規模和水平大幅提高，進入正規化和世俗化，形成小學、中學、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教會除興辦大、中、小學，進行正規教育外，還致力於平民的掃盲教育。」[261] 傳教士辦學的一個典範是美國傳教士郭顯德，他個人在山東煙臺創辦了 40 多所學校（並建立醫院和博物館）。他的傑出貢獻先後受到清光緒皇帝和民國袁世凱總統的嘉獎。1890 年，基督教新教教會成立專業機構——中國教育會，監督、指導與中國教育有關的一切事物。除了出版高水平的教科書和其他書籍之外，「它還制定了 14 年一貫制的綜合性的教學大綱，同時也是全體新教徒中實施教育標準的公認的監護人」[262]。

教會學校的學童

燕京大學女校

中國第一批知道「數、理、化」爲何物的學生，第一代有科學知識的讀書人，全部是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或由傳教士送往西方留學，學有所成的。1905 年清政府順應時勢，宣布「廢科舉，興學堂」。其時中國大地上由基督教會創辦的新式學校已經遍地開花結果，大、中、小學林立，現代教育教材齊備。近百年來，國人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爾後成爲社會棟樑之才的不計其數。到 20 世紀 30 年代，大約 50%的中國精英分

子是由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263]。

另外，有悖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教士在推動中國婦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現」[264]。「中國以前不是完全沒有女子教育，但限於富裕人家的家庭內部，且內容狹隘（《紅樓夢》中，富貴如鳳姐者都是文盲——引者註）。19 世紀 30 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265]「到 1905 年，基督教新教教會小學共有 7,168 名女生，中學共有 2,761 名女生。在傳教士的倡導下還培養出了幾名女醫生。還努力在成年婦女中開展識字運動和提供家政學的基本教育。」[266] 基督教天主教會對婦女教育的貢獻也不遜色。

中文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白話文運動，也是西方傳教士啟動的。「中國當時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與民眾日常使用的口頭語言相去甚遠，不經過長期的專門訓練，幾乎無法正常地閱讀和寫作……傳教士爲了在較短的時間裡，把福音傳給一般未受過教育，或僅受過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從一開始就嘗試將書面語言通俗化。他們用接近通俗語言的『淺文理』（即簡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頭語言翻譯聖經，撰寫福音單張。而這是在以提倡白話文爲標誌的『新文化運動』正式登場的半個世紀之前。」[267]

教會學校中的女學童

天主教修女給女子學校的學生上音樂課

中國的公共圖書館也是由西方傳教士首開先河。「中國古代也有藏書樓，但是其功用是儲藏，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大相逕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庫教堂北堂圖書館。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於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其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於開啟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268]

「前清、民國時期，基督教或天主教會創辦的大學，其中大部分稱得上當時的世界級大學。它們是燕京大學、北京輔仁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華中大學、金陵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滬江大學、嶺南大學等。這些大學起點很高，在體制、機構、計劃、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直接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中國教育現代化過程中起著重要的示範與導向作用，爲中國培養了大批知識界的精英，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深遠影響，爲中國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69]

下面是基督教會在中國創辦的一些著名高等學府的照片：

20 世紀初美、英基督教會聯合創辦的燕京大學

1888 年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創辦的金陵大學

1879 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創辦的聖約翰大學

美、英傳教士 1906 年創建的北京協和醫科大學

1913 年美國多個教會創建的金陵女子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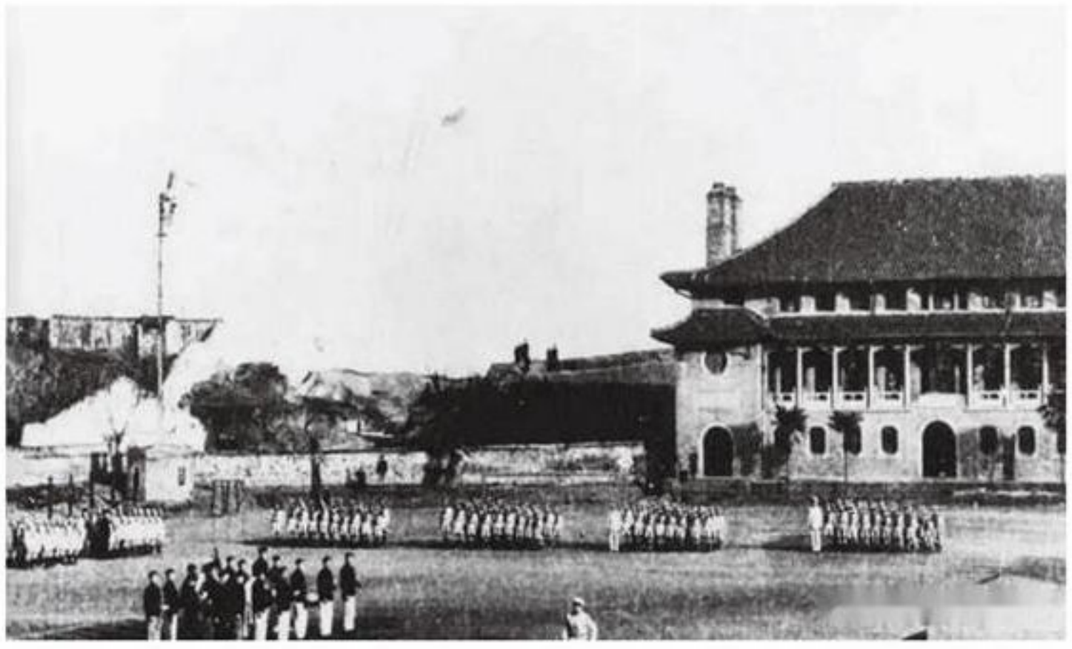
美北、美南基督教長老會創建的之江大學

1914 年美國基督教會創建的湘雅醫學院

1905 年美、英、加五個教會創建的華西協和大學

1925 年法國天主教會開辦的北京輔仁大學

1904 年美、英、加多個基督教會開辦的齊魯大學



20 世紀初英、美基督教會創辦的華中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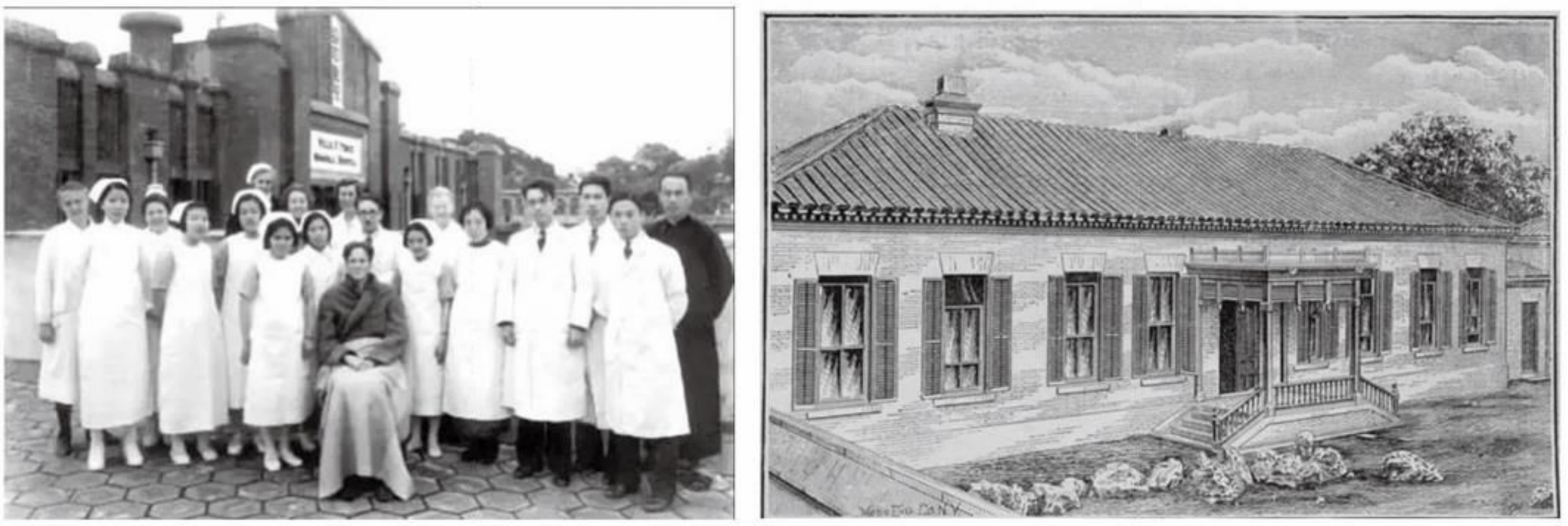
20 世紀初美國基督教會創辦的福建協和大學

中國的現代醫療衛生事業同樣是基督教會開創、興辦、普及的。早在 19 世紀 30 年代「就已經有傳教士在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設立小型的醫院。此後他們幾乎每到一地，都會創辦醫院。不僅是爲了傳福音，也是看到了當時中國人的切實需要。」[270] 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在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解剖學、外科學、內科學、微生物學等領域突飛猛進，西醫的醫學理論及臨床實踐獲得長足的發展，並臻於成熟。而在中國，以古代的《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等爲經典，在黃老道家及陰陽五行理論上建立的中醫學，基本與現代科學無緣。中醫藥在治療急性病和傳染病方面往往毫無辦法，比如當時流行的霍亂、鼠疫、猩紅熱、腦膜炎、肺結核、痲瘋病等，中醫藥基本上束手無策。而且由於百姓生活拮据，看病吃藥往往成爲沉重的負擔。傳教士醫生把西方當時最先進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手段帶到中國來，贈醫施藥，無償服務，有如福星之高照。多少國人的生命得到挽救，多少可怕的疾患得以治癒。同時，傳教士也努力把建立在生理學和生物學基礎上的西方衛生觀念傳授給中國人，使國人能形成合乎衛生的生活方式。

「第一個赴華的醫生傳教士伯駕於 1835 年在廣州創辦了一所醫院（即中國的第一所西醫醫院：廣州博濟醫院——引者註），在他的主持下，二十年間醫治了五萬多名病人（最有名的是林則徐，1839 年給他配了一

條疝氣帶）」「美國長老會（北方）的嘉約翰博士接任伯駕在廣州建立的醫院，其後的幾乎五十年間它主治了一百多萬病人」[271]。

「1863 年，一個叫 Douw D. M. 的美國傳教士來到北京，看見一個產婦難產，一個老式接生婆在孩子剛露出來的腳上穿上一隻鞋，認爲這樣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來，結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目睹了這種『巫術般』的老式接產方法，以及它給婦女、嬰兒帶來的嚴重災難，Douw D. M.（中文名爲道濟——引者註）回到家裡大哭一場！她立刻返回美國，向教會募集財物，準備了整整 8 年的時間，募捐籌備資金到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女子醫院，這就是後來的道濟醫院。醫院建立後，她積極推廣新法接生、預防接種，同時培養中國醫務護理人員。



美國傳教士道濟（中座者）和她在北京創辦的道濟醫院

……因爲 Douw D. M. 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婦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減少，成活率大大提高，這都受益於這位女傳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她還引進其他西醫各科，和教會的同仁又在全國發展了 500 多家教會醫院。」[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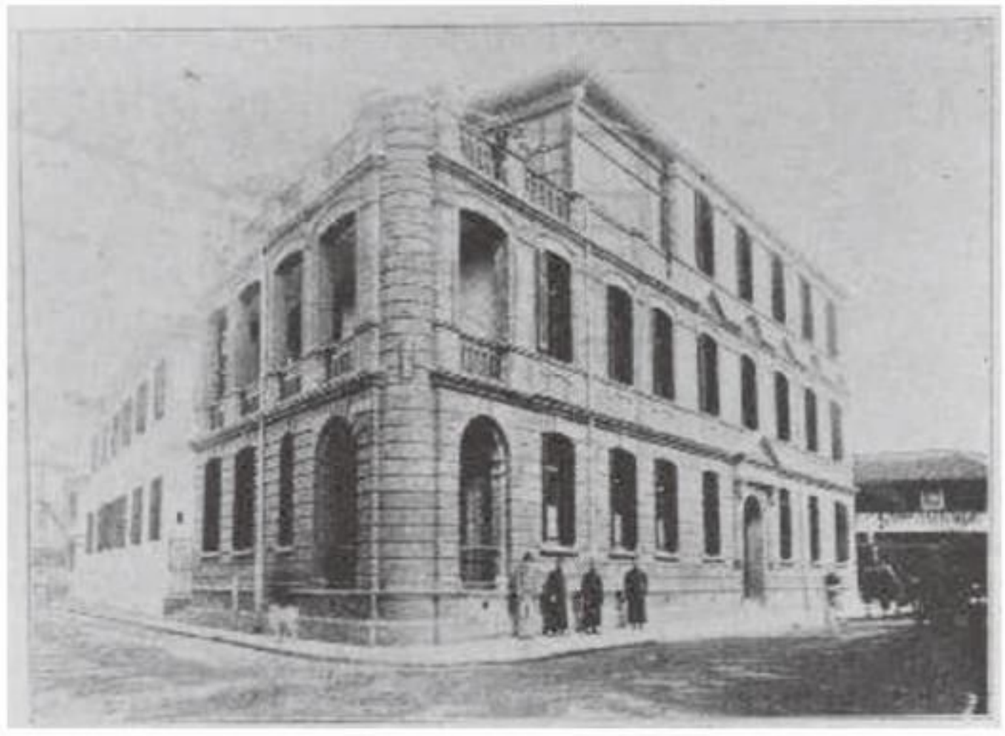
除建立醫院外，精通醫護的女性傳教士應用西方的醫療制度和先進的醫學科學知識，還設立專門的醫學類學校，推行護士、婦幼以及助產類的教育。「廣州更出現中國第一所女子醫學校——廣東女子醫學校（即後來的夏葛醫學院)……早期主要診治婦孺，且設有婦產科專門病床，並致

力於社區助產保生事業，故廣州之近代助產事業發展甚早，其助產士人數亦可能因此較他處爲多。」「1911 年，長沙雅禮醫院的美國籍護士妮娜・蓋奇創立了湘雅護醫學校，設有護士和助產士兩個專業，也是較早培養職業助產士的學校之一。」[273]

「中國幾乎所有知名醫院，其前身均爲教會所辦醫院，現列舉一部分如下：

1835 年廣州眼科醫局，後改為廣州博濟醫院

1844 年上海仁濟醫院



1866 年上海同仁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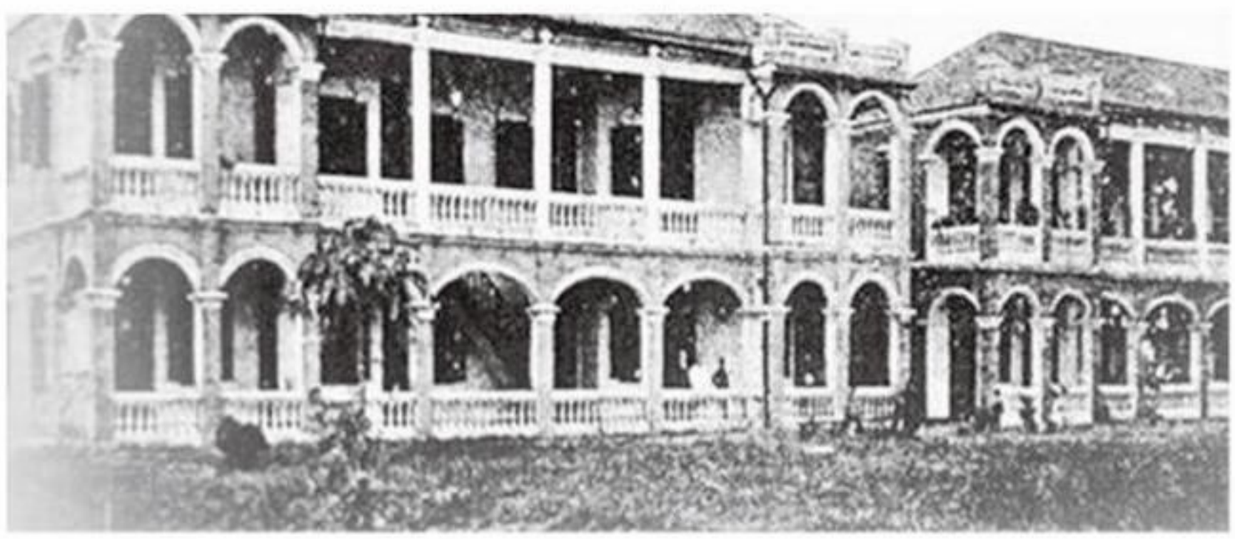
1877 年蘇州公濟醫院

1883 年蘇州博習醫院

1883 年濟南共和醫學校

1885 年北京道濟醫院

1890 年濟南華美醫院與醫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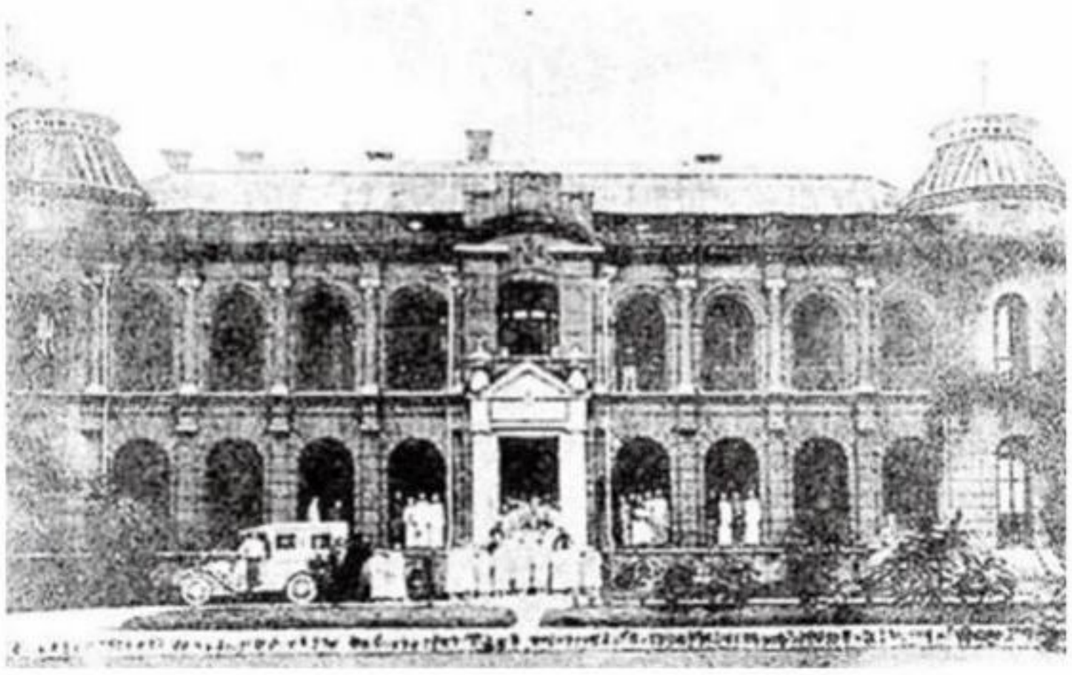


1898 年廣州花地精神病醫院

1903 年 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

1905 年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

1906 年北京協和醫學堂



1907 年西方傳教士組織的中國紅十字會救助中心

1907 年上海聖馬利亞醫院

1900 年普仁醫院

1913 年瀘州福音醫院

1914 年湘雅醫學校

1919 年山西川至醫學校

1926 年上海宏恩醫院

1928 年漢口協和醫學堂

在晚清、民國那個時代，中國是極度貧窮與落後的。當年來華的那些醫學傳教士們，並不欠咱們什麼。但他們放棄了舒適安逸的生活，背井離鄉來到偏遠、落後、貧窮的中國，默默無聞地把自己的青春、熱血、才華……無怨無悔地獻給了中國。很多宣教士離開他們的祖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過自己的祖國，長眠異國他鄉（由於惡劣的生活條件和疾病，早

期基督教新教宣教士，「從馬禮遜到戴德生，200 多位來華宣傳士中，有 40 位宣教士和 51 位妻子病死。進入內地的宣傳士，平均存活只有 7 年」[274] ——引者註）。其實，那個時期國外的宣教機構他們本身也沒那麼富裕，但是他們一鎊一鎊、一美元一美元的從他們拮据的生活費裡省出錢，來給我們建醫院、治病……[275]」「這項工作在中國的發展是驚人的……1876 年有 41,281 名病人在大約四十所教會醫院和診療所接受過治療，30 年後，據報道每年至少有 200 萬病人在 250 所教會醫院和診療所接受治療。」[276]

隨著教會醫院在中國城鄉的普及，基督教的象徵「十字架」成爲一個重要的救死扶傷的標誌，生病了去找「掛十字架的地方」成爲中國百姓的一種生活常識（歐美國家的醫院從無十字標誌）。由於基督教會在中國大力普及、推廣現代醫療衛生事業和教育事業，教會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士；於是「十九世紀末，開始有一些專門從事這些特殊服務的差會團體出現，服務遂更趨完備化」[277]。

傳教士給中國痲瘋病人帶來福音

教會醫院醫護人員為孩子清洗消毒

基督教會和傳教士醫生對中國痲瘋病人的關愛和治療，是他們懸壺濟世、救死扶傷的一個光輝範例。「清末時期，痲瘋病在西方國家已經滅絕，而中國的痲瘋病患者還有百萬人之多。所以，這一情況得到西方醫學界的關注，一些醫生和懂得醫術的傳教士來到發病率最高的華南地區開設

痲瘋病院，收治痲瘋病患者」[278]。「英國痲瘋救濟會（由傳教士韋爾斯利・貝利成立——引者註）首次在中國開展活動是 1887 年，它資助英國聖公會在杭州設立了廣濟痲瘋病院，此後又資助倫敦會在湖北孝感、廣東北海設立了痲瘋院。在痲瘋救濟會的倡導資助下，一些在華差會（包括天主教的）在廣東福建一帶紛紛設立痲瘋病院。比較著名的有天主教康神父 1907 年創辦的廣州石龍痲瘋病院、德國禮賢會 1905 年創辦的東莞痲瘋院、美國美以美會 1901 年創辦的福建興華痲瘋院、美國南浸會 1919 年創辦的廣東大衾島痲瘋院等。」[279]「有的傳教士醫生在十分偏僻的隔離區建立痲瘋病院，長期和痲瘋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設法爲他們治病，給他們愛，向他們傳福音。那時，就是痲瘋病人的親人都不敢接近他們。正是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國人慢慢地打破了對痲瘋病的盲目恐懼，建立了痲瘋病也可以治癒的正確觀念。」[280] 在基督教會和傳教士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痲瘋病的治療逐漸得到推廣；中國成千上萬的痲瘋病患者，從可怕的疾患、無良的虐待、被肉體消滅的恐懼中逐漸解脫出來。「根據 1940 年發表的一個統計，全國共有各類痲瘋病院和痲瘋診療所 51 處，大部分是由來華差會創辦，多數都直接或間接接受英美痲瘋救濟會的資助，完全由地方政府舉辦的僅有 5 處……由此可見，來華傳教士和差會在近代中國痲瘋病的救治事業中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281]

外國傳教士（神父、修女）醫治、照料痲瘋病人

「傳教士也專心致志於培養中國第一批現代醫生。少數人如黃寬、何啟年輕時讀完教會學校以後去西方留學學醫。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有大批人（包括未來的革命家孫中山）到附屬於中國或香港教會醫院的醫科學校得到培養。到 1897 年爲止，約三百名中國人從這樣一些學校畢業，另外肄業者尚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282]

基督教會和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播西方醫學知識的另一個媒介是醫學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合信博士（Benjamin Hobson，英國傳教士——引者註），他編輯的東西多年來都是標準本……後來，嘉約翰博士、德貞博士、傅蘭雅等人（均爲西方傳教士——引者註）都翻譯了大量醫學著作，包括診斷法、繃帶包紮法、皮膚病、梅毒、眼病、炎症、醫學原理和實踐、藥物學、熱病、衛生學、外科學、解剖學和生理學」[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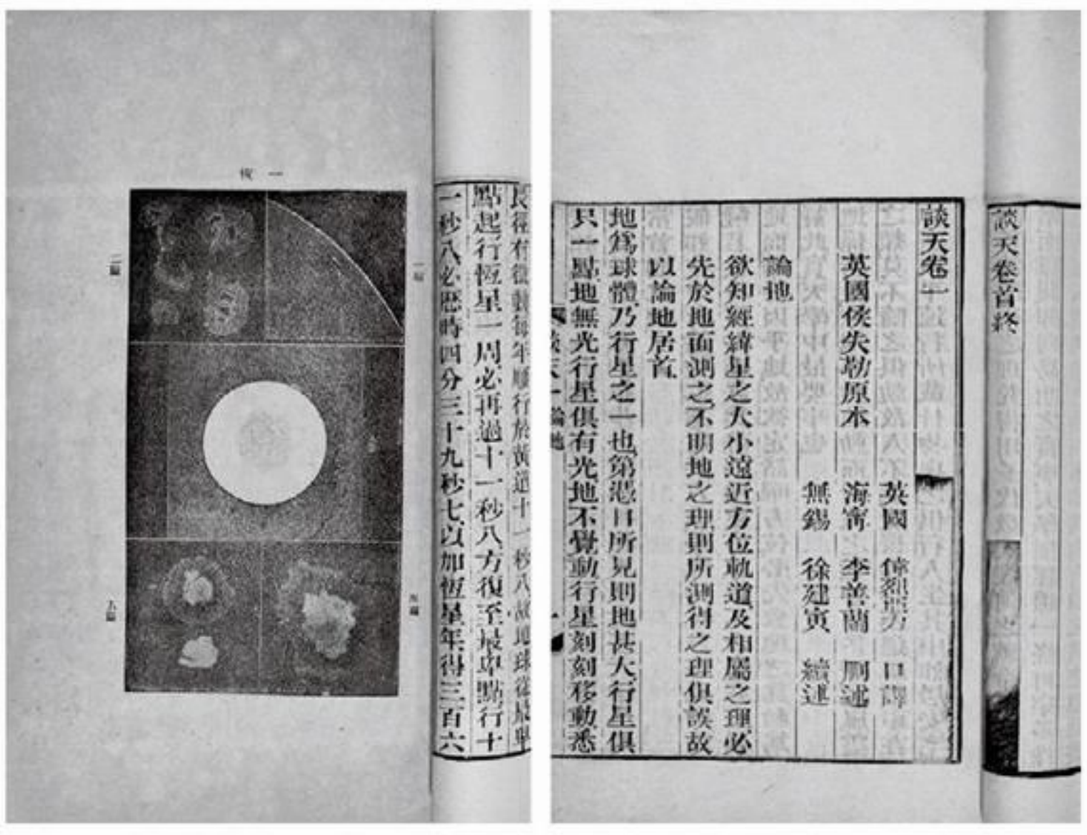
基督教會不僅是中國現代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的開創、興辦、普及者，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不僅是「神愛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義，他們也是現代文明、法治和民主自由精神在中國大地上的播種者。把中國從中世紀喚醒的「西學東漸」，傳教士實爲開路先鋒；中國初識「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傳教士是介紹人；中西文化交流，傳教士是開拓者。開拓者中的一個先驅是法國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明朝萬曆年間他來華傳教，從歐洲爲中國帶來了 7000 多部圖書，價值 1 萬金幣（這些錢抵得上世界第一家跨國公司荷屬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兩個股東的股本）。金尼閣也是第一個把中國的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的人；他還是西方第一個系統地編寫中國編年史的人。

「爲了向中國受過教育的成年人傳播西學，傳教士採取出版中文書籍和雜誌的辦法……早期的例子爲《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文月刊，廣州，1833 年及以後諸年）……在 1810–1867 年期間，根據一個材料的

估計，新教徒關於非宗教問題的著作總數達 108 種……到十九世紀末比較活躍的教會出版機構超過十二家。新教學者除編輯幾種著名期刊外，還撰述和翻譯了幾百種範圍廣泛的非宗教問題的書籍。」[284]

在科學著作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譯者是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翻譯了歐幾里德的《續幾何原本》（九卷）、赫希爾的《談天》（十九卷）、摩爾根的《代數學》（十三卷）和盧米斯的《代微積拾級》等書。」另一位近代西學東漸的巨擘是傅蘭雅。這位創建了中國第一所科技學校（格致書院）、出版了中國第一本科技雜誌（《格致彙編》）的英國傳教士，翻譯出版了一百多種諸多門類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

傅蘭雅編輯的《格致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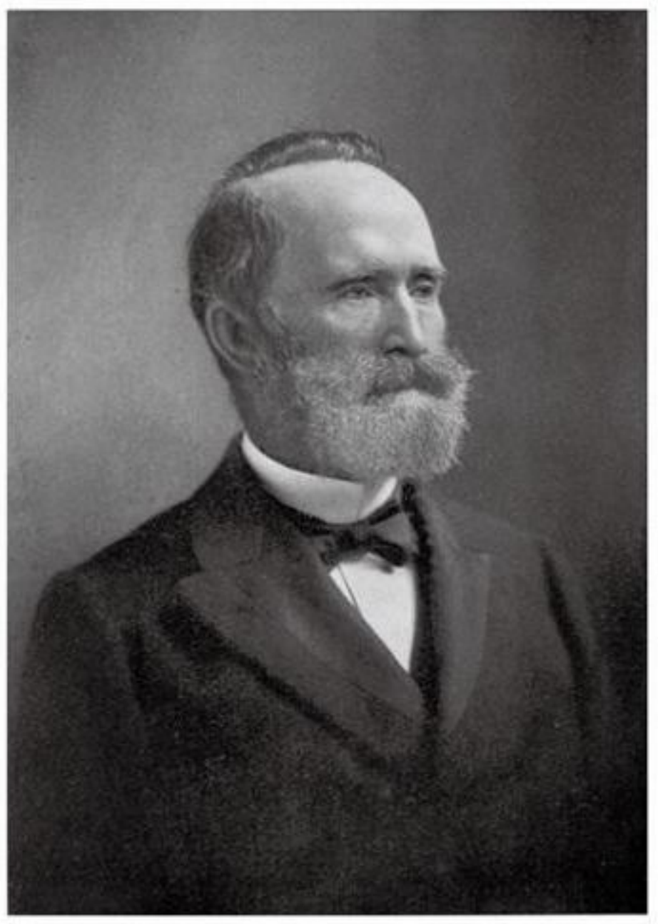


偉烈亞力譯作《談天》

在其他領域，特別是歷史、地理和國際法領域，也出現了傳教士的許多有重大影響的出版物。例如，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著述的《聯邦志略》，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的《大英國志》，美國傳教士謝衛樓（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的《萬國通鑒》等。在國際法領域，「主要是由於美國傳教士兼教育家丁韙良的努力。丁韙良國際法譯著中最重要的是《萬國公法》（北京，1864 年）」[285]。

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

由於長期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中國舉國上下的無知、蒙昧可謂登峰造極。「惡西學如仇」的大學士徐桐曾感歎：「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被譽爲「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深信「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禁止大黃出口，即可致外夷死命[286]。翰林院學士——當時中國最高的知識精英群體，無一人具備現代科學知識。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嘔心瀝血的著述、翻譯，他們精心策劃出版的書籍、報刊、雜誌，如荒漠甘泉，「使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能得到向來很難得到的關於西學方面和關於西方世界總的方面的豐富資料。而且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年爲止，它們是這些知識的基本來源。」[287] 換句話說，這些寶貴的、成爲現代文明國家不可或缺的知識不是中國人自己獲取的，而是西方傳教士克服重重艱難險阻送上門來的。傳教士爲此承擔了多大的風險與犧牲，是當代人難以想像的。長期以來，中國緊鎖國門，「夷夏之防」甚嚴：「洋人學中文是犯法的，中國人教洋人中文則以漢奸罪論處」。（編撰世界上第一部中英大字典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爲了學習中文，「出高價聘請一位不要命的中文老師，這位老師隨身帶著毒藥，一旦被發現就服毒自殺，以免遭酷刑。爲了

保護他，馬禮遜每天晚上上課」。馬禮遜住在一間倉庫裡，節衣縮食，導致嚴重的營養不良。由於異常艱難的生活環境，馬禮遜懷孕的妻子瑪麗感染霍亂去世，年僅 29 歲[288]。

同樣，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個方面，即把中國介紹給西方，長時期以來也不是中國人自己做的，而是西方傳教士長期不懈的努力。比如，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從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將《四書》、《五經》等中國古代經典翻譯成英文，包括《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詩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書經》、《孝經》等。他的《理雅各英譯七經》「至今仍被世界各國漢學家認爲是標準譯本」。他的《法顯行傳》、《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和《中國編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漢學界占有重要地位。理雅各還創辦了牛津大學中文系[289]。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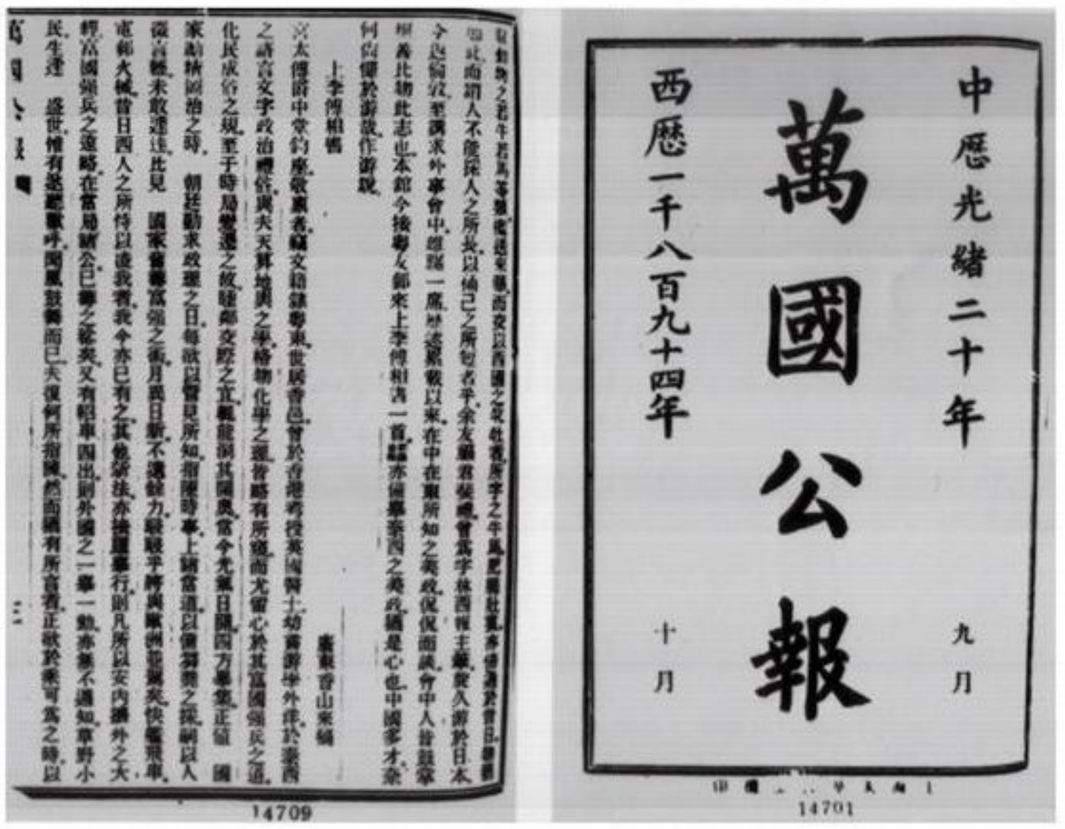
英國傳教士理雅各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

西方傳教士披荊斬棘，前赴後繼，打開了中國兩千年黑暗的皇權專制社會塵封的大門，輸入了現代文明的科學知識、民主理念、人權思想、法治精神。是西方傳教士啟動了使中國擺脫蒙昧的「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啟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中國歷史書介紹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乃至清末新政，從來只提中國的改革家與啟蒙家們，一筆抹殺了

鬼子的貢獻。以致許多人都以爲改良運動乃是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卻不知道眞正的改革先鋒還是洋鬼子，康梁不過是他們教育出來的門外弟子罷了。這其實是必然的：所謂『現代化』不過是『西化』的同義語，而所謂『改革』，無非就是『按西方模式改造國家與社會』。當時舉國無一人知道西方模式是什麼樣子，當然作帶頭羊的使命就歷史地落到了」西方傳教士肩上[290]。「基督教傳教士在最初喚醒中國人，使之感到需要變法這一方面，曾起過重要作用（據說康有爲在 1898 年對一個記者說過，他轉而主張變法，主要歸功於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著作（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美國傳教士——引者註））；此外，他們還幫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乃至世界觀」[291]。「正是從 1895 至 1898 年這個時期（即戊戌變法前——引者註），傳教士對中國改革嘗試的影響達到頂點……李佳白（Gilbert Reid，美國傳教士——引者註）的尙賢堂以促使北京官員對改革感興趣作爲主要目標。他在 1896 年聲稱，他個人認識兩百五十多名官員，另外還和兩百人有交往。威爾士傳教士李提摩太是另一個把培植與中國高級人士的私人關係作爲促進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李提摩太拜訪過李鴻章和張之洞等顯貴人物……李提摩太訪問北京時，結交了康有爲、梁啟超（梁曾短時間擔任過李提摩太的祕書）和短命的強學會的其他成員，也經常在強學會的集會上發表演說。」[292]

傳教士中的「劍橋七傑」



傳教士主辦、廣學會出版的中文報紙《萬國公報》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響的是新教傳教士的改革主義的著作，它們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起迅速傳播開來。1891 年李提摩太擔任了出版這類著作的主要贊助機構廣學會的總幹事」[293]（廣學會全名爲：中國基督教和實用知識傳播協會，SDK）「廣學會的書籍對清末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產生很大影響；自光緒十六年（1890 年）到宣統三年（1911 年）出書共約 400 種，初版、重印合計共達 100 多萬冊。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爲瞭解西學和參考西法，找來閱讀的 129 種新書中，其中 89 種爲廣學會出版。」[294]

另外，在破除中國的陳規陋習、移風易俗方面，在解除千百年來加在中國婦女身上的沉重枷鎖方面，西方傳教士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傑出的貢獻，諸如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對早婚，提倡女權，嚴禁溺嬰，戒煙禁賭，勸娼從良。對傳教士的貢獻，胡適先生曾感慨說：「宣教士……教我們把女人也當人看待」。

西方傳教士還給中國送來了體育精神。「1867 年，基督教青年會進入中國，引進和推廣近代體育項目；包括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網球，棒球，田徑，游泳，跳水，體操等等」[295]；對增強國人體質、豐富民眾生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音樂領域，五線譜和簡譜的記譜方法，七聲音階、和聲、對位、旋律、節奏、曲式、大小調等音樂理論，交響曲、奏鳴曲、協奏曲、重奏曲、小夜曲、進行曲、歌劇等音樂體裁，形形色色的西洋樂器都是西方傳教士帶到中國來的。

1900 年的庚子之亂，受恩深重的中華民族，對天使般降臨在中國大地上的西方傳教士舉起了屠刀。「時窮節乃現」；正是在滅洋、滅教的腥風血雨之中，基督教傳教士崇高的人格、博愛的胸懷、堅貞的信仰發射出璀璨奪目的光芒。

逝者已矣，生者爲繼。基督教崇高的救世、寬恕精神，在庚子之亂後繼續發揚光大；在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身上，這種精神表現得尤爲突出。

庚子戰後，這些傳教士一直在西方各國之間進行斡旋，盡力幫助那個要把他們斬盡殺絕的國家和它的人民。新教傳教士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要求列強只懲罰庚子之亂中的罪大惡極者；第二，呼籲對中國人進行教育，而不是懲罰；第三，鼓動各國盡可能減少中國各省的賠款負擔[296]。「新教教會基本都放棄了賠款要求。相反，他們還在各國國內組織了很多捐款，以救濟品的名義送到中國遭受兵災的各個地方。所以，義和團之後，新教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中間得分很高，國人對它的印象很好。後來美國第一個退還庚款，這個其實也是新教傳教士推動的。」[297]傳教士的以德報怨生動地詮釋了聖經中耶酥的教導：「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山西省在庚子之亂中是滅洋、滅教的重災區，159 名新教傳教士連同 46 名他們的子女和 12 名天主教傳教士慘遭殺害，本國教民被屠戮的則不計其數。「晉省教案」是如何善後的呢？作爲教會方面的代表，英國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擬定了一個「耶穌教受害華人章程」，共 7 條，茲摘錄如下：

> 一、各府州縣殺害教民之人甚多，本當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輩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牽累。惟各府起亂首匪當懲辦一人以示警。若晉撫果能剴切曉諭，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將首匪從寬免究……三、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的款五萬兩，以十年爲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爲開導晉省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士庶子弟學習，不再受迷惑。請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李提摩太用這筆庚款創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山西大學的前身，培養了大批人才——引者註）……六、要永息教案，中國官待教民，當如待教外人，一視同

仁。如果犯法，自應按律嚴辦；若有功勞，亦應保舉：作官與教外人同。凡照此辦法，無論中外古今，從未見有不相安者。[298]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用庚款創立的山西大學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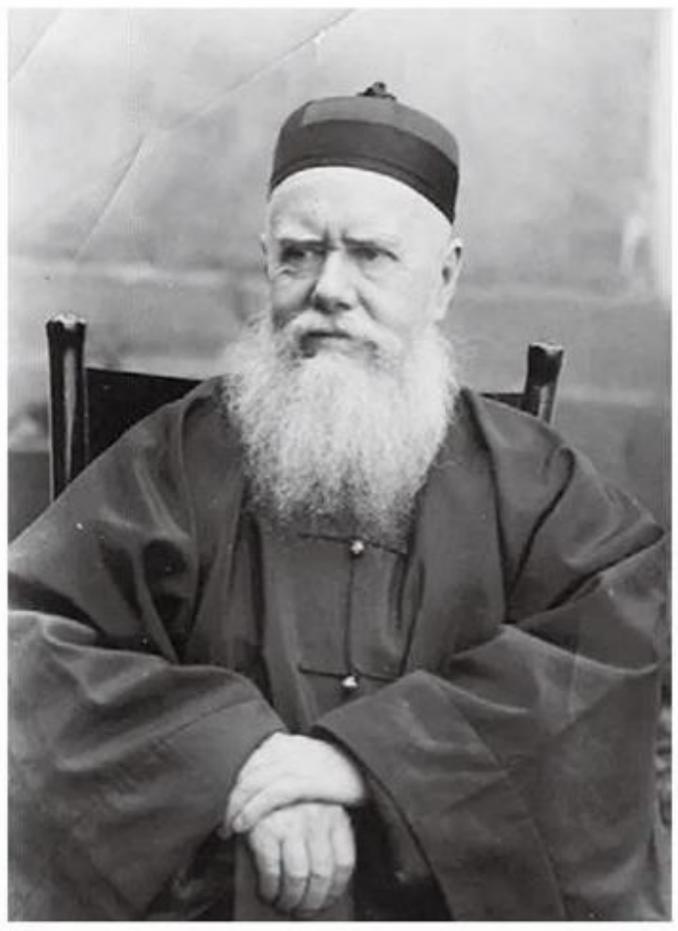
李提摩太夫人在上海發起天足會

根據章程第一條，對殺人如麻的拳匪，教會提議僅僅懲辦各府的「起亂首匪」一人。如所周知，『府』管轄州、縣，是很大的行政區域；清代山西省下轄九府。在（山西）一府之內，庚子之亂中被殺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萬，西方傳教士則全部罹難。而戰後教會提議僅僅懲辦匪首一人；該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從寬免究」（免於追究任何刑事責任）。這是基督教寬恕罪人的光輝典範！該章程呈交李鴻章核準時，李「深爲嘉納」。此章程只涉及受害華人；至於「殺外國人之罪，有各國欽使與中國全權大臣商辦」，地方上不過問[299]。各國欽使與中國全權大臣商辦的結果，就是《辛丑條約》第二款：「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其中並不涉及對拳匪的任何懲處。

英國著名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華傳教 51 年。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中華大地上傳播福音，遍及 19 個省，包括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地區，並在各地開辦了中學 66 所，小學 122 所，建立醫院 10 間，診所 37 間，藥房 68 間，戒毒所 50 間[300]。由於異常艱辛的生活條件，他的妻子戴瑪利亞和四個孩子在中國

喪生。庚子之亂中，「中國內地會」58 名西方傳教士殉難，另有 21 名傳教士的子女慘遭殺害。戰後，戴德生主動放棄一切賠償要求。他的名言是：「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301]。

山西浸信會傳教士和他們的孩子（拳亂中全部罹難）



英國傳教士戴德生

教會醫院的外國修女護士和住院病人

教會學校的中國女孩子在上課

庚子戰爭 100 年之後（西元 2000 年），33 位在中國殉道的外國傳教士和 87 位殉難的中國基督徒被教皇保羅二世莊嚴「封聖」（冊封爲聖徒）[302]，就是對他們崇高的歷史評價。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中國第一所痲瘋病院

基督教會對中國的偉大貢獻彪炳千秋；中國對基督教會的恩將仇報誠爲難以洗刷的國恥。

傳教士為中國婦女解除纏足痛苦

加拿大傳教士啓希賢與成都天足會成員

奇觀八：八國聯軍扶危救難，解民倒懸

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中國民眾被義和團和官軍荼毒、禍害；滅洋、滅教的大屠殺、大破壞使國家經歷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擊潰清軍、肅清拳匪之後，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於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不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嗎？

八國聯軍占領天津之後發布的第 1 號「告諭」就是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頓治安，恢復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爲了收拾庚子之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還有兩項當務之急。一是採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戰亂之後死屍狼藉、遍地哀鴻之中可能爆發的瘟疫。二是「採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施」，就是說，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臨時政府撥款賑撫，救濟貧民[303]（詳情見本書之「奇觀九」）。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初，京中留守官員與外國使節及聯軍的代表——英國人赫德會談。作爲首要之務，清廷官員提出，請聯軍悉心保護宗廟、社稷、東西陵寢、大內宮殿等處。「赫德直接答稱：『外洋向以百姓爲第一，宗社尚在其次』」[304]。赫德不假思索，直截了當地用西方價值觀給清廷官員上了一堂民權課。

聯軍「以京師地面遼闊，遂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爲暫安閭閻之計」[305]。「暫安閭閻」就是要百姓安居樂業。八國聯軍「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對外國人（特別是聯軍官兵）的嚴格管制。「第一條：凡外國人不論兵民，如有在境內犯規者，即應命獲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頭繕函送交本國兵官，並將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證一併交案。第二條：每總巡捕卡，應設號簿開具被告洋人案件，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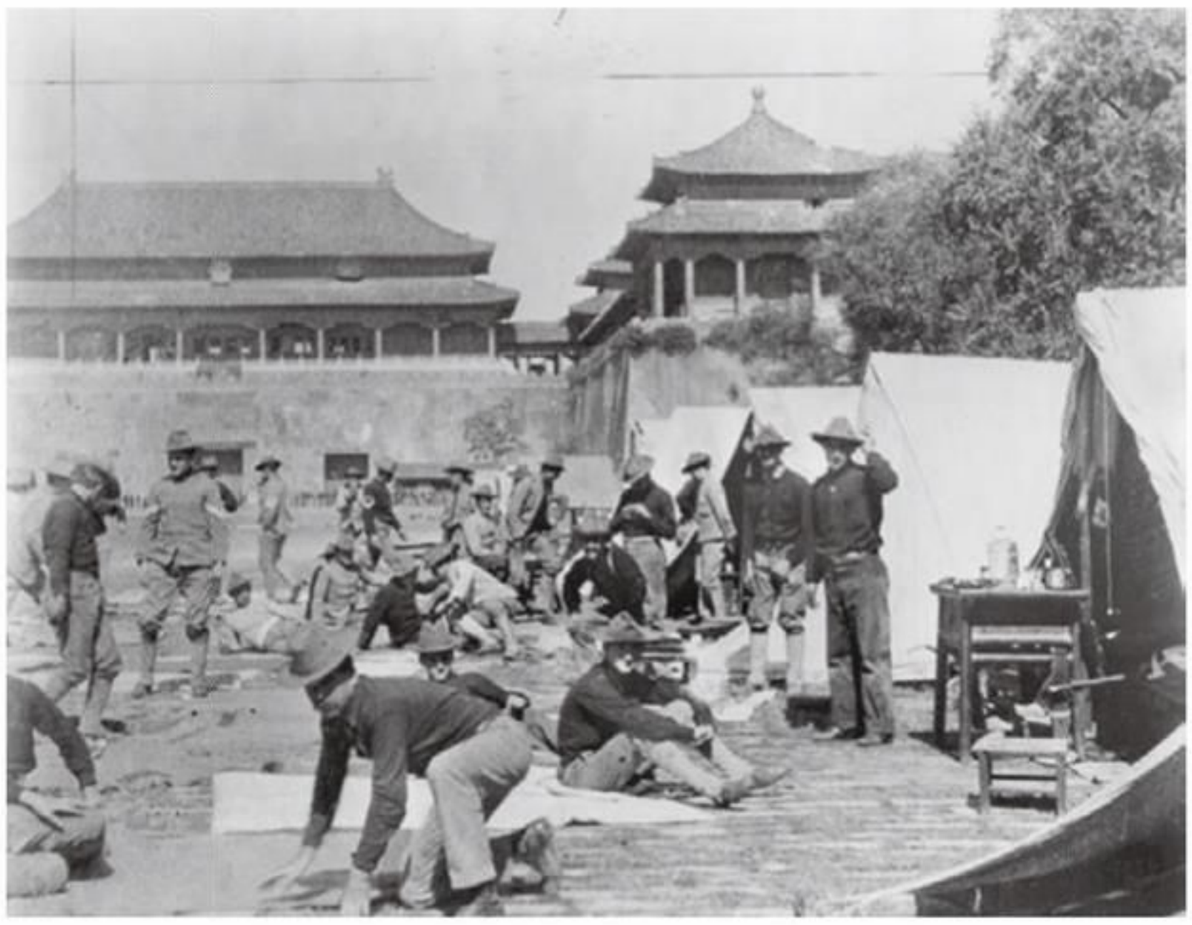
證人名色，以備查考。第三條：凡兵士及營役，除有護照外，不得擅離各所管轄之境……」[306] 即是說，各國官兵只能在自己轄區內走動，若去別處，需有護照，即特別的通行證。外國人「如有在境內犯規者」，主要是擾害平民者，立刻管押、立案，收集罪證，進行懲處。這個章程是聯軍強化治安、嚴明軍紀的一個例證。

聯軍統帥瓦德西在北京創造性地實行了「軍民共治，中外共治」。他「稔知中華習俗，人亦和平喜交際，乃建議招致京中紳士，參與安民善後各事宜，每日開會議事。一時士民頗頌之……遍設警察巡邏各地，維持治安，由瓦分派紳士主持。除軍、政系聯軍自主外，其餘民事，均與紳士等商榷而後行。列名顧問者多至數十百人」[307]。

中國民衆（包括年輕婦女、兒童）和八國聯軍軍人親密無間的合影

北京居民回憶說：「當此時整個京城，雖然都被外國兵占據，但他們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機關，地面漸就平復」[308]。「五城練丁，現已一律身穿號衣，頭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邏，市面安堵（安堵：意爲安定，安居——引者註），皆美兵官梯兒曾一人之力，居民無不感悅」[309]。北京的士紳給「西狩」的朝廷上書，報告京都的情況：「雖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擾害」[310]。在京的官員 83 人，由吏部尚書徐郙領銜，於（庚子

年）8 月 30 日給「西狩」的兩宮上摺奏曰：「洋兵入城至今十餘日，廟社安固，禁門以內亦尚完整，城內外居民當洋兵初入時，不免驚惶，現已漸就安謐。」[311] 信譽卓著的中國民間報紙《申報》9 月 8 日對京都由亂入治的情況報導說：「民人之不及奔逃者，各授白旗一面令高懸門外，以示與兵事無干。市中已貿易如常。鄉人每挑運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蠅頭之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有北京市民對聯軍指揮官這樣表達內心的感受：「你們外國兵，來到北京，眞可以算是來救北京人，否則北京人還不知多死若干。照這情形說，我們實在應該歡迎你們。」[312]



美國軍人在午門外紮營守衛紫禁城

京城的治安恢復後，近畿各州縣還有義和團勾結土匪、潰卒爲非作歹。聯軍對這種情況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實負責，維護治安；順天府所屬州縣遂一律設防自衛[313]。聯軍也在必要時出動。「華人常赴北京請求保護，因各處拳民漸已化爲盜賊隊伍也，因此曾派小隊前往圍攻各該處地方」[314]。「聯軍赴各處剿匪，到處土人，無不歡迎」[315]。

戰亂之中，南糧北運受阻，糧食短缺。爲了讓民眾有飽飯吃，八國聯軍開倉平糶。「京通各倉米石，經洋人開倉平糶，買者絡繹不絕」；「聯軍已將北京倉米，售與貧人，索價甚廉」[316]。此外，聯軍在北京「特設湯

廚二十處」，免費供應貧民膳食，並爲無家可歸者「設置暖房若干」，向他們提供溫暖的住所，以免露宿街頭、挨凍捱餓之苦[317]。

八國聯軍在恢復秩序、整頓治安的過程中，沒有濫用刑罰。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經過司法審判，公開處決過數十名罪大惡極的拳匪，僅此而已[318]。聯軍對義和拳民不是以懲罰，更不是以殺戮爲主。聯軍在直隸（河北省）的各個鄉村搜捕拳匪時，拳匪「匍匐叩頭乞命，求再三，令立和（合）同方饒」[319]。即是說，拳匪被聯軍捕獲，乞求之下，只要立下合同，保證改惡從善，就可得到聯軍的饒恕、寬免。「北京、天津的絕大多數團民爲了保命，於失守後在門口掛上白旗，當了『順民』」[320]。這些拳民在聯軍進城後，只要在家門口掛上白旗，願當「順民」，即可平安無事，既往不咎，連「立合同」都免了。

聯軍對義和拳民的寬免，對死刑判決的愼重，如果和對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討還血債的教民比較，就顯得格外突出了：「聯軍入京後，京津一帶，拳匪爲教民所殺者，不下數千人」[321]。聯軍執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員的不滿。聯軍統帥瓦德西曾向德皇報告：「每每一種罪案，在吾國只加以三四個月監禁之處罰者，而在中國則竟以死刑處之。直到現在，此間刑部大臣，猶常常向著「北京行政委員會」（八國聯軍治理北京的機構——引者註）訴說城中不靖之狀，與日俱增，尤其是美國區域之內，彼以爲系因處罰過於輕微所致。因此，該大臣請將所獲強盜竊賊，引渡於彼，彼當時常處以死刑。」[322]

八國聯軍官兵光顧小攤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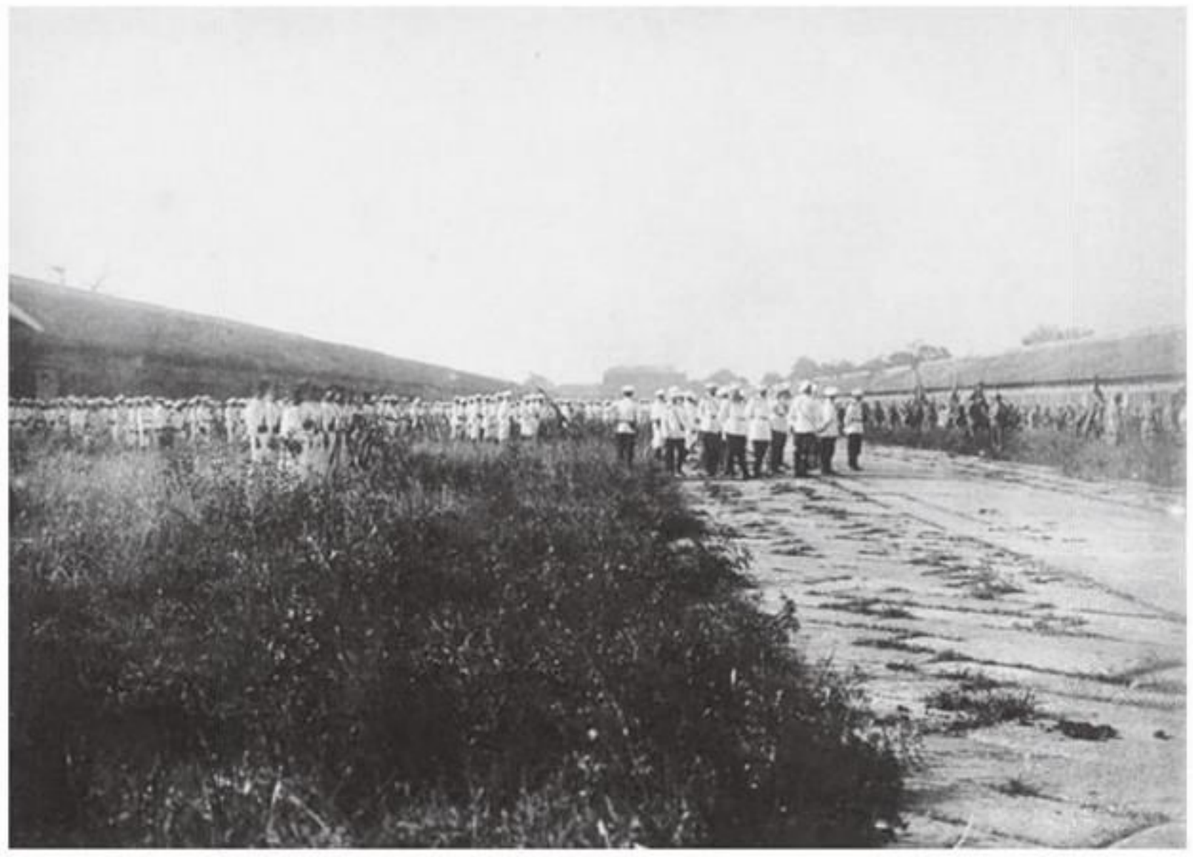
長期以來，國人把義和團、清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栽到八國聯軍的頭上，京城的滿目瘡痍竟說是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結果。這種栽贓是徒勞的。要說搶劫，天字第一號的搶劫目標應該是皇宮御苑；要說姦淫，皇宮御苑也是婦女集中的所在（聯軍破京時，西太后只帶極少數宮眷倉皇出走）。但是聯軍對紫禁城、西苑、頤和園等皇宮御苑是特別加以保護的。「聯軍入城後，以救護欽使（即外國公使——引者註），保衛宮禁，搜捕拳匪爲宗旨，均竭力舉行」[323]。出於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尊重，聯軍進京時沒有攻占皇宮——紫禁城；「各國公使及駐京聯軍最老將領協議之結果，將該禁城劃在占領區域以外」[324]。紫禁城的守衛由聯軍中紀律最爲嚴明的美、日兩軍負責。美軍守紫禁城的正門（午門），日軍則守東、西、北三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而「大內」的供應則由深悉中華傳統的日軍負責。爲確保皇宮的安全，聯軍指揮官會議上規定：紫禁城的各個城門決不可自外部打開，城門只能由宮中之人從內部打開[325]。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嚴。宮中由才具過人的瑜貴妃（同治皇帝的妃子）主持，內務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宮中的妃嬪在養尊處優之餘，還縫製棉衣，派人送給西狩的兩宮，所謂「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紉就寄西京」[326]。爲感謝聯軍的護衛、保全，瑜貴妃「遣使致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327]。

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記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特別指出聯軍的行止與清兵拳匪有天淵之別：「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占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這北城先經日兵占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爲一歎。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

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左起第三人）及其部屬在西苑儀鸞殿前

「聯軍舉德大將瓦德西爲統帥，入居儀鸞殿（儀鸞殿位於西苑，不在紫禁城——引者註），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迴鑾時，尚無恙也（到西太后、光緒回到北京時，宮中安然無恙——引者註）……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餘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328] 瓦德西信守了他對德國皇帝的承諾：「余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爲保存。」[329]

紫禁城由日、美兩軍負責嚴加保護。在京的外國人自然希望一睹中國皇宮的景色，爲此美、日兩軍指揮部制定了「遊覽紫禁城章程」（只參觀紫禁城內的三大殿，到乾清門止，不包括內廷），共 8 條，其中規定：「一、凡文武官員，及各國士商，應持有聯軍各軍管帶官之信函，准於每禮拜二，禮拜五等日，自午前十點鐘，至午後二點鐘止入內，二點鐘以後，應請各位退出。二、按前條所開之管帶官之信函，應請於前兩日預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聲明系某官居長，及應偕行人數……」[330] 保安措施可謂嚴密。下面的照片攝於 8 月 28 日，聯軍入城之後兩星期。聯軍官兵列隊，等待進入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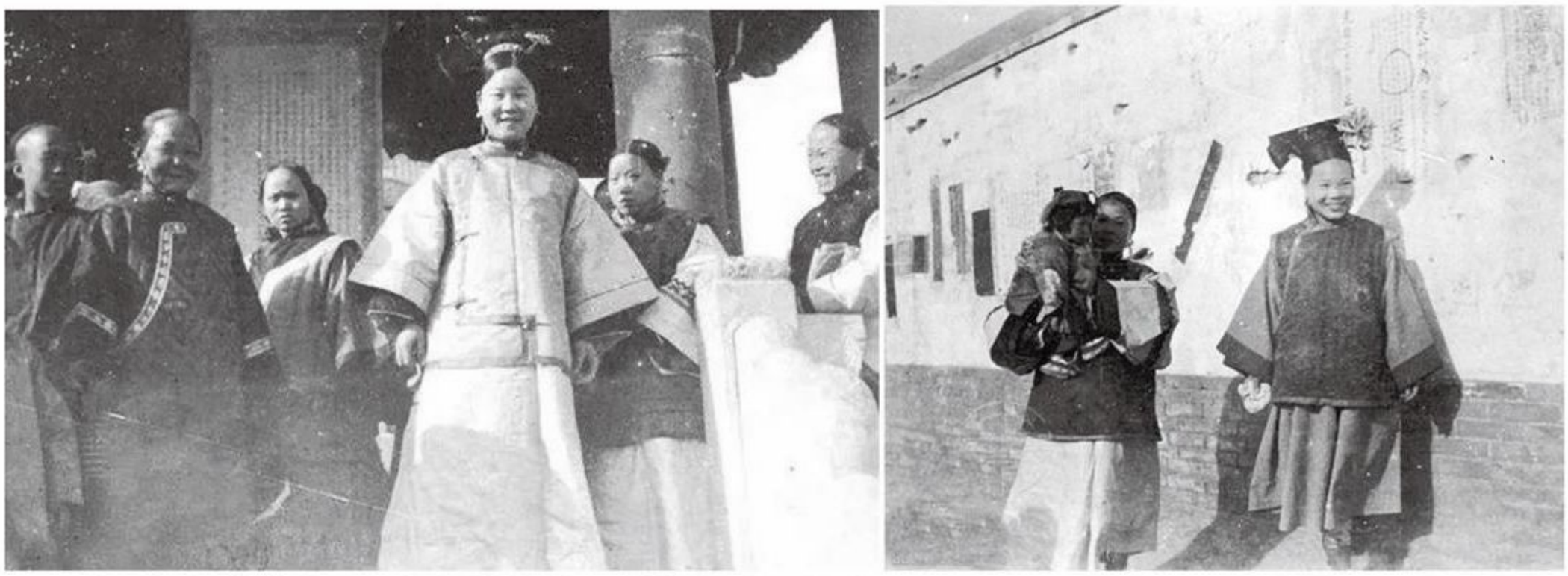


八國聯軍官兵在紫禁城外列隊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京都的情況牽動人心。全國各地的報紙，每天在頭版的重要位置都有關於聯軍在中國的各類消息和京津地區情況的報導。從庚子年 8 月中旬聯軍進京，到次年 7 月聯軍撤離北京，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裡，在《申報》的千百篇報導中，沒有一篇提到過八國聯軍對皇宮御苑有搶劫行爲。「《申報》中不僅沒有關於八國聯軍搶劫行爲的報道，而且有與之相反的、更加明確的、關於聯軍無擾紫禁城及頤和園的報道。例如，1900 年 9 月 8 日，聯軍進京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申報》以『京師近況』爲標題，明確指出：『各國聯軍入京之後，並不擾及頤和園及禁城各處』」[331]。這是中國信譽卓著、「爲閭閻申疾苦，爲大局切維圖」的民間報紙，對占領首都的外國敵軍的報道，其眞實性不言而喻。1902 年 1 月初，兩宮迴鑾後，慈禧立刻命榮祿致書各國公使，感謝他們對皇宮的悉心保護。之後，光緒帝接見各國公使，慈禧接見各國公使夫人，親自對各國表達謝意[332]。

當代中國，關於八國聯軍在北京的皇宮御苑搶掠姦淫的種種謊言俯拾即是，甚至拍出了電視劇和電影。但畢竟有知情人不願顚倒黑白，強姦歷史，敢冒「漢奸」的罪名，說出歷史的眞相。當代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明確指出：「故宮 600 年未受戰爭搶劫的禍害，而這中間北京三次被外

國占領，一次英法聯軍，一次八國聯軍，一次日本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直截了當地聲明：「當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時候，故宮也沒有被搶被燒。」[333]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期間，攝影師在街頭拍攝的中國婦女

庚子戰爭中，北京唯一遭殃的皇家園林是圓明園。

1860 年，在第二次中英戰爭（即國人誣稱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圓明園遭到破壞，但是遠未完全被毀；不少殿宇樓臺、園林勝景尚在，諸如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魚躍鳶飛、耕雲堂、愼修思永、知過堂、課農軒、順木天、春雨軒、杏花春館、文昌閣、魁星閣、蓬島瑤臺、萬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塢，長春園的林淵錦鏡、海岳開襟，綺春園大宮門、莊嚴法界、正覺寺等等[334]。之後，清廷對圓明園「擇要重修」，這座規模宏大的離宮依然景致不凡，氣象萬千。西太后和光緒帝多次到園中游幸。圓明園除了巍峨的宮殿樓閣、綺麗的湖光水色，還保留有大量的名貴花木、山水疊石、建築基址；橋樑、道路、園牆和園門大多完好無損。

庚子戰爭中圓明園遭到澈底毀滅，片瓦無存，成爲一片廢墟。在中國傳媒的宣傳中，這是八國聯軍的一大罪狀。在互聯網上輸入關鍵字「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進行搜索，會大有收穫，網上充斥著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內容，其中不乏中國一些權威媒體的刊載、報道。事實眞相如何

呢？實際上，八國聯軍沒有動過圓明園的一草一木。中國的《百度百科》爲了顧及它的百科全書的聲譽，對歷史事件尚不敢任意指鹿爲馬，胡編濫造。在它的「火燒圓明園（中國近代歷史事件）」條目中，作了這樣的陳述：「圓明園被毀後（指 1860 年那次——引者註），仍爲皇家禁園。同治年間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曾試圖擇要重修。當時擬修範圍爲 20 餘處共 3,000 多間殿宇，主要集中在圓明園前朝區、後湖區和西部、北部一帶，以及萬春園宮門區、敷春堂口清夏堂等處。但開工不到 10 個月因財力枯竭被迫停修。此後，慈禧太后雖然修了頤和園，但並未完全放棄修復圓明園，直至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還曾修葺過圓明園雙鶴齋、課農軒等景群。1900（光緒二十六年）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逃奔西安，京畿秩序大亂，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把園內殘存及陸續基本修復的共約近百座建築物，皆拆搶一空，使圓明園的建築和古樹名木遭到澈底毀滅。」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對圓明園洗劫得如此澈底，就連磚瓦木料都被拉出去賣了。八國聯軍的「過失」僅在於進京之後沒有立刻派兵保護圓明園。

八國聯軍爲嚴明軍紀頒布了禁酒令。美軍在北京的指揮官發布命令：「禁止兵勇飲酒，並不許酒店燒鍋賣與，致生事端」[335]。八國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也發布告諭，允許民眾釀酒、賣酒，但「只准賣與華人，仍不准賣給各國洋人」[336]。禁止軍人飲酒，是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嚴格軍紀。酒店賣酒只賣給華人，而不賣給洋人；如此公然歧視洋人而能夠貫徹實施，是不是說明聯軍官兵是遵紀守法的？當兵的手裡有槍，但是看來他們不會憑借武力，在酒店強取豪奪。

八國聯軍的軍紀也表現在他們參觀北京國子監（中國最高學府）時講求禮儀：「西兵入（國子監）瞻仰者，皆於先師前免冠致敬」[337]。聯軍官兵尊重中國習俗和傳統文化，在國子監參觀，紛紛對中國的「孔聖人」

表達尊崇之意。

八國聯軍嚴明軍紀，還包括嚴格管束爲他們服務的華人。有些「在太君身邊的人」（比如華人隨軍翻譯）狐假虎威，招搖撞騙，利用他們職務的便利對百姓敲詐勒索。他們的劣行一旦被發現，聯軍即予以嚴懲。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布告諭，宣布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發，以便嚴懲[338]。據時人回憶，八國聯軍對那些「倚仗外國人的勢力欺害中國人的」查辦得如此之嚴，以至於當時衙門裡關押的竟以此類人爲主[339]。臨時政府在天津制定的《巡捕章程》也規定：「華人有勸外國兵加害於其本國人者，或因復仇起見及其餘一切緣故在捕房誣告本國人者，一律嚴罰」[340]。凡此種種，不都是八國聯軍對中國民眾的保護？

中國民眾笑對外國聯軍（日本隨軍記者拍攝）

實際上，八國聯軍自大沽海口登陸之日起，其軍紀、操守就與清兵拳匪判然有別。「傳聞大沽砲臺爲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爲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擾，雞犬無驚，較城中（指天津——引者註）安靜。城中惡團（指義和團——引者註）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341]

洋人入城，平息暴亂，整頓治安，天津和北京，先後由亂入治。聯

軍總司令瓦德西元帥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說：「現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況於最近數星期以來，又復日趨繁盛……大多數商店，業已重新開門……我們更復盡力設法，以使華人漸爲瞭解清潔之義。所有街上穢物，均須搬出城外，街燈之設，亦已實行……所有煙館賭場，一律禁止。對於貧民，則特設湯廚二十處。並爲彼等設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廳」辦法。現在此間乞丐數目，比較前此太平時候減少。其原因系由於彼等所得勞金，甚爲豐厚，蓋多數苦力，常從軍隊方面，獲得工作機會故也。」[342] 八國聯軍推行西方先進的城市管理，城市面貌得以迅速改觀，街道清潔，路燈高照，禁煙禁賭，國人的陋習得以制止，民工的生活得到改善，乞丐數目大爲減少。尤其令人感歎的是，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供給貧民免費食物，比中國傳統上救濟饑民的「粥廠」更能填飽轆轤之飢腸。而且一個城市中免費就餐竟有二十處之多，可謂廣施救濟。使人更爲驚異的是，聯軍爲無家可歸者「設置暖房若干」，這在中國恐怕是開天闢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詩歌中幻想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華人對八國聯軍保境安民的信心，遠高於對本國政府。「北京城裡，因與中國官廳協力維持秩序之故，甚爲安靜。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與日俱增。在明達華人方面，甚至於屢屢表示，深以聯軍離去爲憂。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時期之內，勢將爲本地盜匪所利用，大加搶劫，陷於混亂。」[343]

聯軍軍人在街頭觀看馴獸表演

八國聯軍軍人和中國民衆、官員在一起

聯軍統帥瓦德西「稔知中華習俗，人亦和平喜交際，乃建議招致京中紳士，參與安民善後各事宜，每日開會議事。一時士民頗頌之，爭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參雜其間者。遍設警察巡邏各地，維持治安，由瓦分派紳士主持。除軍、政系聯軍自主外，其餘民事，均與紳士等商榷而後行。列名顧問者多至數十百人，儼然外國政府之上賓。」[344] 瓦德西到任後向德皇保證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余將用全力，務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國戰地）破壞荒蕪情形，得一止境」[345]。爲嚴明八國聯軍軍紀，瓦德西頒布軍令：聯軍在征戰之中，「倘若該地秩序不久恢復，華人各歸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嘗出走，則吾人對於此項和平居民之私人財產，均須特別尊重；一切非法行動，均須嚴厲制止。」[346] 爲了營造太平，收攬民心，「不可令學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國的科舉考試，從「四書」裡出題，在京師最大之金臺書院舉行考試。「報名應試者，湧如怒潮」，達三千人。瓦德西「親臨金臺書院，考試諸生」；名列前茅者獲得了獎賞（第一名是浙江人）[347]。古往今來在戰爭之中，外國軍隊在臨時占領的敵國首都舉行弘揚該國文化的考試，瓦德西可能是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瓦德西得到中國官紳、平民的稱頌，人們「爭先往睹」，包括貴顯無比的王公大臣。這僅僅反映了瓦德西個人的聲望，還是代表了八國聯軍的聲譽？

在中國有一個流傳甚廣的關於瓦德西的傳聞，就是這位聯軍統帥與京師名妓賽金花的情事、豔史。這是小報「花邊新聞」和中國文人「名妓情節」的雜交產物，子虛烏有，荒誕不經。

賽金花（本名趙靈飛），蘇州船妓出身，被狀元洪鈞買去作妾，隨出任清廷駐外公使的洪鈞去過歐洲。所謂她周旋於歐洲上流社會，被譽爲「東方第一美人」，是國人對賽金花不著邊際的吹捧。中國婦女傳統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據著名劇作家、歷史學者齊如山介紹，「在光

緒庚子以前，駐外國公使的夫人，絕對沒有交際……何況賽乃一妾，而非正式夫人，因稱呼關係就不會與人交際了。」賽金花又是纏足的小腳女人，在西方人眼中是個半殘廢的怪物，「不但交際不方便，且自己都認爲見不得人，故絕對不會出頭露面」[348]。

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元帥

賽金花

洪鈞任滿回國後不久即去世，賽金花重操賣笑生涯。八國聯軍入京時，這個半老徐娘是個拉皮條的鴇子，也和聯軍作點普通生意。賽金花與瓦德西素不相識，更無任何來往。「賽金花與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採信，但是它的各種版本流傳之廣，是值得我們追考其原因的。據清末和民國年間頗有爭議的人物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筆記》記載，聯軍司令瓦德西在南海紫光閣辦公，賽金花在丁士源帶領下女扮男裝，欲以拜謁瓦德西爲名遊覽南海勝景。因瓦德西不在，不克入內。第二天，丁將此事告訴鍾廣生和沈蓋，鍾沈二人『遂各戲草一稿，一寄上海《遊戲報》李伯元主筆，一寄上海《新聞報》張主筆，謂賽金花被召入紫光閣，與瓦德西元帥如何如何，說成活現逼眞』。這就是賽金花與瓦德西所謂『情事』的緣起。當時正是國家存亡之秋，而士人關心的居然還是宮闈祕史，還要聽《後庭花》，沒有現成的，就新鮮現製。」[349] 賽金花能以瓦帥情婦的虛名而被國人捧爲「九天護國娘娘」，子虛烏有的她的枕邊私語竟被吹噓成拯救了

千萬民眾。她與瓦帥的「風流韻事」，被書之於演義小說，唱之於戲曲舞臺；輿情之下作、愚昧，可見一斑。

歷史學者齊如山和賽金花熟識，庚子年間和賽不時見面。齊先生會講德語，與駐京德軍有商業往來。賽金花與德國人打交道，有時要請齊幫忙。齊先生「見過與賽金花在一起的軍官都是中少尉階級，連上尉都沒有」；因爲上尉已是一連之長，「舉止上便需稍微愼重」。「至於（賽金花）委身於瓦帥，那是絕對不會有的」[350]。瓦德西有聯軍總司令之尊，絕不可能嫖娼狎妓。有兩次，齊如山看到賽金花和下層軍官在一起。當遠遠看到瓦德西走過來，「與賽金花在一起之軍官，很露出愴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351]，生怕主帥看到他們和妓女在一起。這不僅證明了瓦德西的正派、威嚴，也表明了聯軍的軍風紀和長官須作下屬表率的傳統（這與中國官越大，越可以胡作非爲，恰成對照）。

中國孩童模仿聯軍行軍禮，與聯軍軍人合影

八國聯軍在華的軍事行動是克制的。庚子之亂中，滅洋、滅教在中國大地上有燎原之勢，但聯軍的軍事行動只局限在直隸（河北）省內，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西至山西省界。聯軍沒有在更大的區域內作戰，非不能也，是不爲也。這與單獨出兵東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

國的行徑迥然不同（對中國有侵略野心的俄國在戰爭爆發後，分南北兩路出兵東北，擊潰清軍，剿滅拳匪，於 10 月上旬占領了東三省全境。本文所謂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不包括單獨出兵東北的俄軍）。實際上，聯軍占領首都、京津地區平定下來以後，拳匪在外地的燒殺搶掠、殺害教士教民的暴行並未終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員的煽動之下發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國傳教士曾向法國使館求援，「稱河北岑道，滑縣呂令，安陽石令（『道』即道臺，『令』是縣令——引者註），煽惑居民，地方大亂，拳匪各區遊行，凡教士教民所餘財產復行焚燬，洋人性命深爲可慮。」[352] 對這些騷亂、暴行，聯軍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決。對河南省的暴亂，法國公使通知「北京全權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談的李鴻章、慶親王），要求清政府平息暴亂，保護傳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財產[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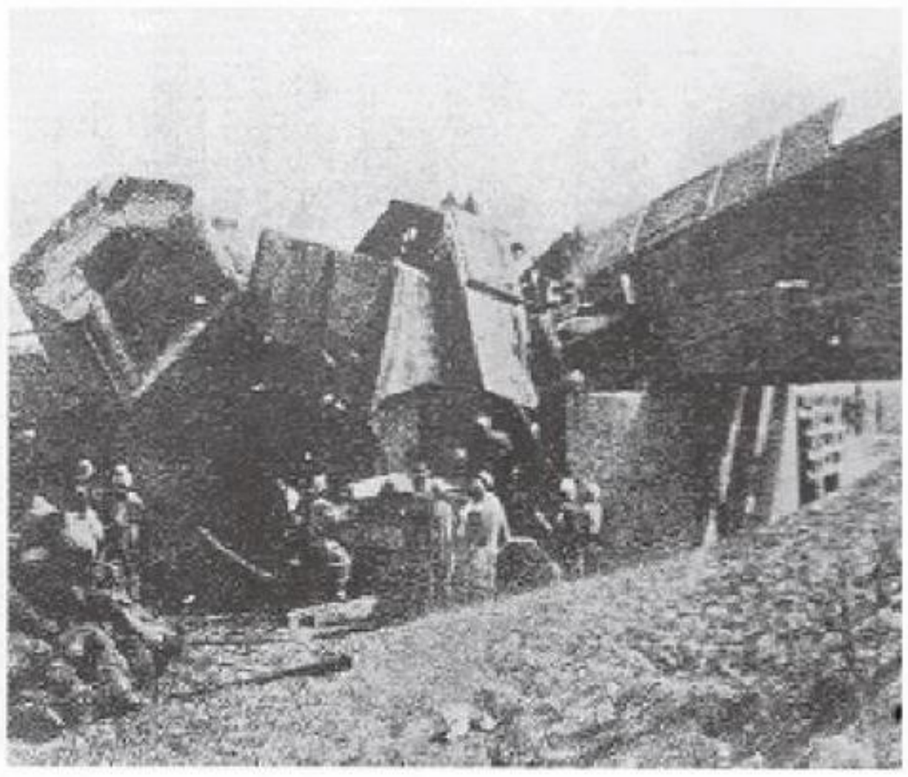
李鴻章在日本和俄國軍人護衛下前往談判現場

李鴻章在《辛丑條約》上的簽字

八國聯軍的另一個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亂後，大力修復華北地區被拳匪嚴重破壞的鐵路、車站、橋樑、通訊等設施，爲解除民生困苦、促進商貿活動、恢復中國經濟做出了貢獻。聯軍中除人數極少的奧軍外，其他 7 國軍隊都有技術兵種，如鐵道兵、工程兵、電技師、橋樑工兵等；

他們在戰後的恢復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54]。或許有人質疑，洋人修復「洋設施」，是不是因爲這些設施的產權屬於他們？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現代化設施的產權均屬於中國，非官辦，即商辦。聯軍修復鐵路、橋樑、通訊等，是不是爲他們在中國作戰方便呢？否。聯軍攻克北京後，接到各地的「匪患報告」，獲悉外地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仍在義和團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時）派兵出擊，征剿拳匪。這種解危紓難的軍事行動，哪裡容得先修鐵路？聯軍出兵追剿拳匪、救助危難是在（庚子年）8、9、10三個月，其時各條鐵路線的修復工程尚未開始（津沽線除外）。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肅清的 11 月份開始的[355]。

聯軍修復鐵路遭遇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大量鐵軌的遺失。義和團破壞鐵路時，只將一小部分鐵軌彎折毀掉，大部分鐵軌其實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聯軍沒有通過軍事行動或勒令歸還（否則懲辦）的方式找回這些鐵軌，而是用金錢獎勵，鼓勵村民交出這些鐵軌[356]。一支外國軍隊向當地老百姓「贖回」被搶走的該國資產，用此資產爲那個國家修復重要的交通設施，這可否稱爲仁義之舉？



被義和團炸翻的火車

八國聯軍修復被義和團破壞的鐵路

八國聯軍官兵與中國民眾的關係可以和諧、親近到什麼程度，恐怕是當代不少國人難以想像的。歷史學者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自

外國兵進城後，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個辦公的機構，連個私塾唸書的地方都沒有，彼時我們的本家親友的子弟都來京，因此自己花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房，除學中文外，算學、地理、洋文等等都學，請了幾個外國兵：有美國二人，法國二人，德國三人，各教本國文字，這些教員，都不要錢，只送些煙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國話，作爲互換條件的。這個書房存在了兩三年，因爲北京大學及譯學館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幾個大學，此書房才慢慢停辦了，這個書房我得益處確不少。我除接續學點洋文外，我是偏重問他們國內社會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國管財政的官員，他是專門研究社會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國社會情形很多，於我自然是有極大的益處。」[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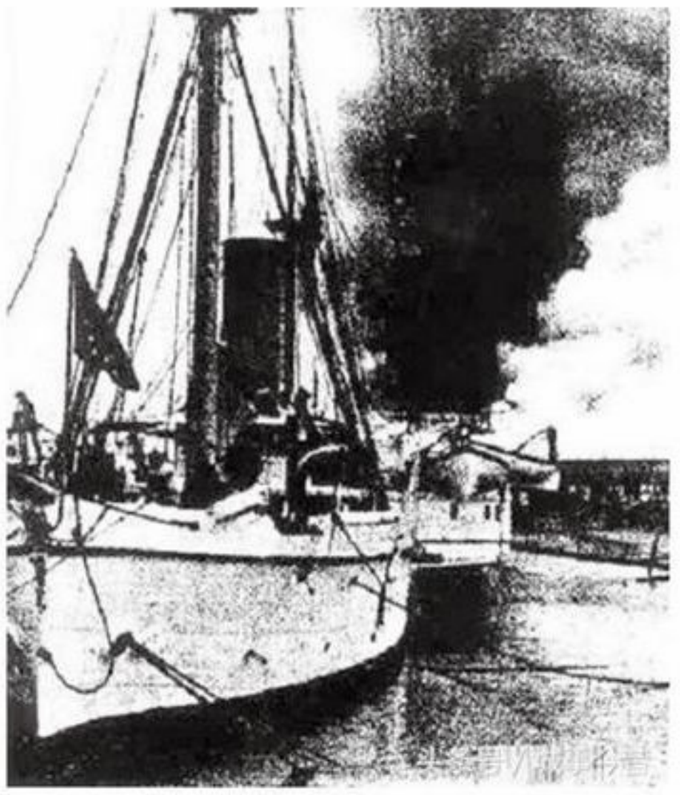
八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於復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貪慾。八國聯軍中有僱傭兵，素質較差，對聯軍的軍紀也不無影響，比如英軍以印度人爲主，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無論如何，八國聯軍的擾民行爲和拳匪清兵大規模的燒殺姦淫擄掠不可同日而語。聯軍士兵搶掠盜竊財物有之，而浮濫殺戮強姦則無。「外國兵道德一定怎樣高，固然不敢說，搶掠也是平常事，若說姦淫，恐怕還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裡頭，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國軍隊的相形比較，哪一國都是要面子的。」[358] 這是親歷者的見證；它難道不是著名史家蔡東藩對八國聯軍評價（「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的最好佐證？蔡東藩的《清史演義》共有兩處提到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均以讚揚爲主。一處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另一處講：「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爲狠鷙，苛待居民」。清史專家高陽的名著《慈禧全傳》用幾百頁的篇幅全程描繪了庚子國難。對義和團的禍國殃民、法術欺詐和清軍的胡作非爲，高陽作了大量的揭露；但是對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他沒有一個字的貶斥。

中外開始議和時，李鴻章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會談。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禮貌）地指出了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不得民心：「此間華軍無紀律者頗多，北方人民頗不願有之」[359]。在另一次會談中，瓦德西就不客氣了：「現在危害中國良民之眞正暴徒，不僅是尚未肅清之拳民；據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爲小隊駐在省內各地者，亦復如此。現刻已經屢次證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見中國軍隊將到，便全體逃走。反之許多村莊居民，對於聯軍之來，卻極爲熱誠歡迎。」[360] 這是八國聯軍統帥的自吹自擂嗎？事實是，類似的記載在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文獻中也屢見不鮮，如筆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眾「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

八國聯軍治下的街頭女性

和任何群體一樣，害群之馬總是有的。傷害人命、凌辱婦女的行爲，八國聯軍中並非沒有，但是僅爲個別事例；而且一經發現，會受到嚴厲制裁。8 月 17 日，在聯軍剛剛攻克北京的混亂、無序之中，一個美國水兵德懷爾（Stephen Dwyer）闖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歐打一個孩子，將其拖出門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趕出屋外，強姦了屋中的兩名婦女。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General Chaffee）對破壞軍規軍記的行爲執法如山，對犯罪者嚴厲制裁。德懷爾很快受到軍法審判，被判終身監禁，關押到舊金山著名的惡魔島監獄。[361]

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



在大沽口戰火中收容中國婦孺的
美國軍艦莫諾卡西號

庚子戰爭——中國與所有的西方列強開戰，是當時重大的國際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聯軍的身邊有如影隨行的記者。西方媒體向有「第四權」之稱，以監督、批評政府爲己任、爲能事；即是說，聯軍是在各國媒體、國際輿論的監督之下。這種監督的嚴格，可以從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聯軍毀壞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反映出來。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不久，9 月 16 日，美軍和英軍聯合行動，清剿盤踞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的大股拳匪。這次軍事行動由美國將軍威爾遜（Wilson）指揮。在戰鬥勝利結束後，英軍指揮官拜樓（Barrow）將軍以英國公使的名義，請求威爾遜批准，將一座聳立在山頂的千年（白瓷）古塔毀掉。威爾遜聞言大驚，表示他不能容忍這種野蠻的破壞行徑。拜樓解釋了英方的動機。他說中國人毀滅了我們無數的教堂，如果我們不以摧毀這座著名的白塔寺廟作爲懲罰，中國人會認爲，他們供奉的神比我們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廣大，不可戰勝。威爾遜認爲拜樓的理由匪夷所思，堅持不批准英軍的請求。最後威爾遜表示，明天清晨他將率領美軍回北京，他的聯合行動總指揮的職責也到此結束。之後，英國公使和英軍指揮官所做之事，他無權干涉（處理中國事務，英國駐華公使當然比聯軍的一個指揮官更有權威）。第二天美軍回城後，英軍炸掉了白塔[362]。

聯軍摧毀北京郊區美麗的白塔立刻作爲醜聞被世界媒體報道。在英國《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駐中國記者的電訊報道中，炸毀白塔的罪責推到了美國威爾遜將軍的頭上，說是他下令破壞的。威爾遜聞訊後，向英國記者興師問罪，要求他立刻糾正這個難以原諒的錯誤。這個事件影響惡劣。英國人帶有迷信色彩的破壞行爲，使英國軍人和由他們代表的英國文明在西方盟國面前蒙羞。[363]

聚集在街頭的八國聯軍軍人和中國民衆

中國民衆在街頭圍觀一個聯軍士兵

聯軍由多國軍隊組成，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之間無論在軍功、戰績方面，還是軍規、軍紀方面，都在相互比較和監督。當時北京有一個天文觀象臺，位於德軍管轄區內。觀象臺上的一些天文儀器被德軍和法軍掠走，作爲戰利品運回本國（其實這些儀器大部分都是外國傳教士設計、製造的，比如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製造了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瓦德西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說：「這些儀器無疑是中國人的財產，但是根據國際通行的慣例，它們可以當作德國的戰利品；而且這也是對我們一個小小的戰爭賠償。至於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邏輯沒有爲他的同盟國接受。美軍司令查菲將軍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對德軍的掠奪行爲表示抗議。查菲在信中甚至譏諷說：在聯軍解救人道危機的征途上，並沒有

德國軍隊的身影[364]（德軍主力是在聯軍占領北京後，才遠道從歐洲而來）。兩年之後，法國歸還了它掠走的儀器。後來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也將這些儀器歸還中國。

八國聯軍中有由華人組成的團隊；英軍的華人團隊俗稱「華勇營」。就是這支被中國歷史學者稱爲「僱傭軍」的隊伍，都對聯軍的軍紀進行了有效的維護和監督。聯軍攻占北京後，華勇營的一部駐紮在天津河西務鎮。他們在當地恢復了一個大的農貿集市，乃戰後最先恢復的市場。曾有德國士兵在集市的水果攤上佔便宜，想白白拿走梨和葡萄；華勇營士兵立刻進行干預，德國兵只好乖乖付錢。又曾有日本兵違反軍紀，酒醉之後鬧事，被「華勇」懲戒過兩次；日軍方面兩次都登門道歉[365]。

八國聯軍的監管者還包括它們國內的反對黨和司法體系。西方國家的反對黨對政府（包括政府指揮的軍隊）的行爲是用放大鏡、顯微鏡（甚至哈哈鏡）觀察的。政府軍敢在外國胡作非爲，國內往往會掀起軒然大波，責任者沒有好下場。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對庚子戰爭中的德軍進行過尖銳的抨擊。另外，國有國法，軍有軍規，軍人不明來歷的財物政府是有權沒收的。其時法軍「福爾利提督特裝寄四十箱回歐，該箱至法國馬賽時，該處海關奉諭將此等物件悉數扣留，蓋法國政府以爲此非用兵時所應得之物，故有此舉。」[366] 將軍想吞下不義之財，談何容易。

華人樂隊前導，聯軍列隊穿過市區

聯軍軍官與中國民衆合影

今日中國，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蔑俯拾皆是，這裡略舉數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義激憤的，是外國人淫辱中國婦女。不管中國婦女如何被本國的權貴、兵痞或匪徒糟蹋，國人可以漠視；但一旦失身給「鬼子」，則是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國內一個廣泛流傳的八國聯軍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綺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幾十名聯軍官兵公開姦汙後，被迫自盡」。這是以訛傳訛。八國聯軍入京時，崇綺遠走保定。他的妻子派爾佳氏性情極其剛烈，決定全家自殺殉國。她命人在後院挖了兩個深坑，然後集合全家人，分開男女，「入坑生瘞」（即活埋）。崇綺的一個兒子（葆初）、四個孫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於一躍，甘死不辭。全家 13 口，除留下一個曾孫外，闔門「殉國」（《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五）。崇綺在保定聞到家人死訊後，這位對義和團「信仰尤篤」、力主廢光緒的「大阿哥黨」也上吊了。至於外國聯軍，這些「殉國者」連影子都沒見到。

「八國聯軍入侵時，不少婦女因爲擔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盡」；這種流言激起過無數國人的憤慨。中國婦女在兵連禍結之時擔心受辱並不奇怪，本國的兵匪對婦女的肆意凌辱給了她們足夠的教訓。她們對外國聯軍不瞭解，想像之中，「鬼子兵」的惡行自然比本國軍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當時確有婦女爲怕受辱而投水或懸樑自盡的，但究屬個別事例。《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中記述過這樣一件事：八國聯軍「行至穆家莊及天齊廟地方……該處婦女多有驚怕投河者，洋人輒救起，曰『勿驚怕，不傷汝等。』蓋洋人探知穆家莊、天齊廟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並無人入拳匪黨者，故不肯擾害。」[367] 這裡，聯軍不是婦女的淫辱者，相反成爲婦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聯軍善待穆家莊民眾，反而給穆家莊帶來了災難。義和團以穆家莊「與洋人通氣……意欲剿洗淨盡」，「拳匪千餘

人，將穆家莊圍住。遠則用洋槍轟擊，近則用刀劍殘殺，該處居民無敢抵禦，被焚者數十家」[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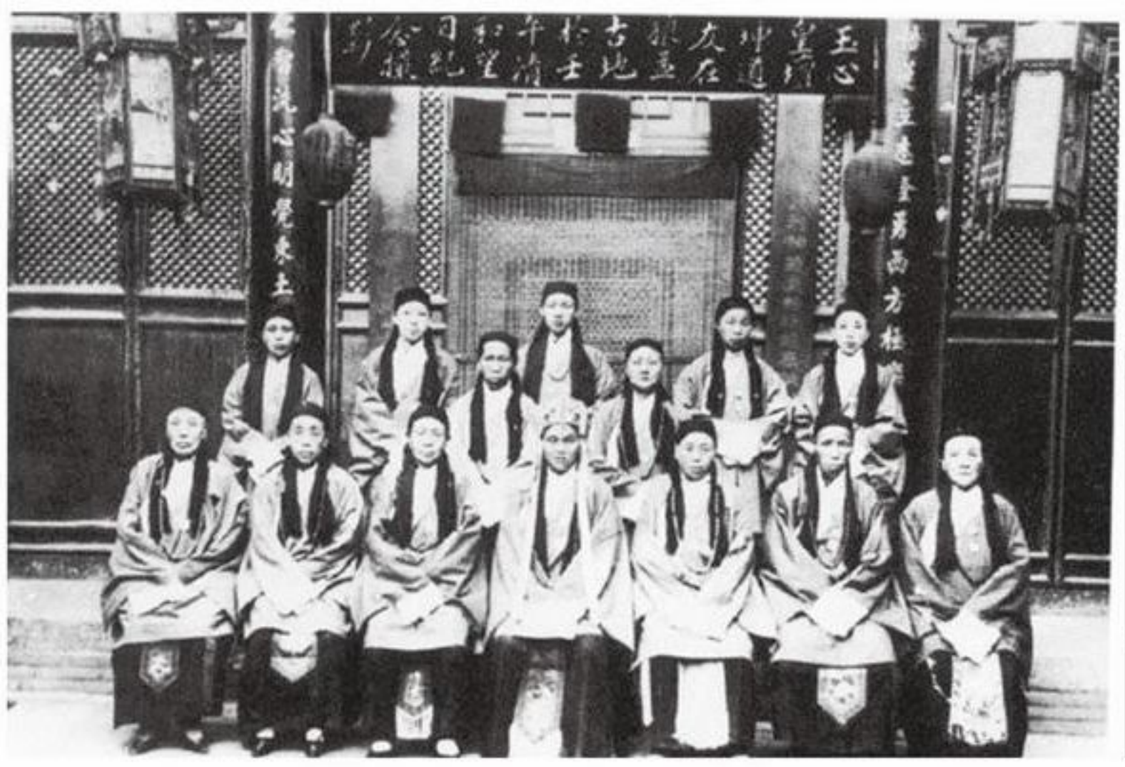
再看看清宮中一些年輕宮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國聯軍進京之日，一些宮女覺得留在宮中危險，爲安全計，她們逃出皇宮（作爲後人我們知道，其實皇宮當時是最安全的地方）。這些宮女「走出安定門，遇潰兵被劫，多散失」[369]。宮女爲了逃避她們想像中的危險，卻掉進了眞正的火坑。

八國聯軍進京後，有一家滿族人，「一家七口，以爲國破家亡，無法生活，遂全家自縊。適有外國人進院，用刺刀把繩割斷，屍體放下，有兩人剛上吊，所以又活過來」；其中一人是這家的女主人。聯軍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國人。自己的同胞會伸出援手嗎？中國人的反應是：「大家不但不敢進此院，且所有鄰居，到夜間都不敢在大門外經過」[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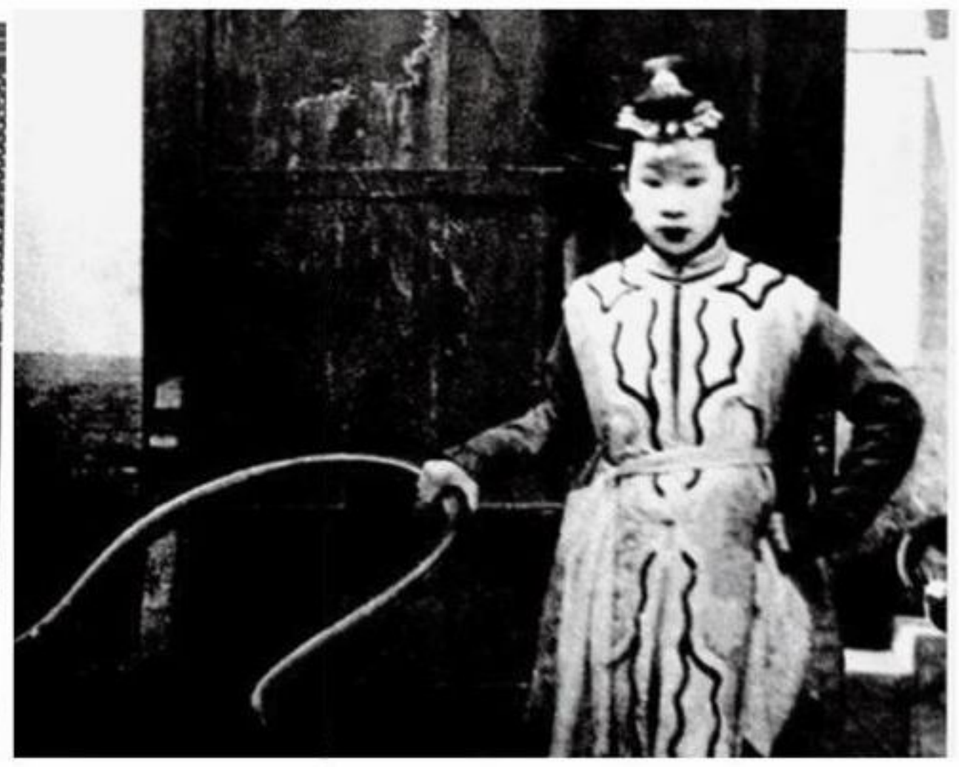
庚子戰爭中有人在戰亂中自戕（多爲統治種族滿族人），這種現象後來被中國媒體無限誇大。比如《鳳凰大視野》「義和團事件始末」的系列電視節目中說：北京「每一戶都有懸樑和服毒自盡者」，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八國聯軍對婦女的態度，折射了西方文化中對女性的尊重。聯軍對俘獲的女性拳匪，處置方法和對男拳匪不同。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俗稱「都統衙門」）在經過審判後，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但均爲男性。聯軍曾經俘獲過兩名義和團女首領，她們被捕之後被關押在都統衙門。臨時政府委員會（臨時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經過專門討論，決定將她們送往上海，交給那裡的天主教會收容、看管。1901 年 4 月此二人被交給上海聖約翰教會，安置在徐家匯孤兒院。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天津臨時政府一直向上海教會提供她們的生活費。如此折騰，顯然是爲了避免在滅洋滅教的重災區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對拳匪首領可能

施加的報復。在聯軍撤走、政權移交之際，臨時政府不能不將她們交還給中國政府，遂請上海教會將此二人交給上海地方當局[371]。這種種安排，難道不是聯軍對兩名義和團女首領的照顧、保護？名噪一時的「黃蓮聖母」林黑兒以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頭，砍去洋人頭，七天不裹腳，天下洋人殺盡了」的「紅燈照」首領。她們被八國聯軍俘虜後，一度也關押在都統衙門；後來此二人竟不知所終。關於她們的下落有種種傳說，如隱居在鄉下、去了國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沒有殺她們。《拳亂紀聞》中有下述記載：「紅燈會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購線拿獲，傳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過二十餘歲，按西例婦女向不加戮，大約此二女雖必監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憂。」如果落到清政府手裡，她們的下場恐怕和拳匪首領曹福田的沒有兩樣——凌遲處死。



紅燈照首領黃蓮聖母和諸仙姑仙女



紅燈照成員

還有一個流傳頗廣的謠言：八國聯軍進京之後，聯軍司令部下令軍隊搶劫三日。《鳳凰大視野》「義和團事件始末」的系列電視節目中說：聯軍官兵「奉命在城中爲所欲爲三天」。此謊言之離奇，世所罕見：搶劫竟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竟被命令去「爲所欲爲」。試問，聯軍官兵若不服從命令去搶劫、去爲所欲爲，是否要受軍法處置呀？有論者稱，在《瓦德西拳亂筆記》中，這位聯軍總司令承認了此事。此爲謬傳。在瓦氏的拳亂

筆記中，有「聯軍占領北京之後，會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的字樣；不過這不是瓦氏的陳述，而是該書在中國的印行者在書中加的「旁批」[372]。此陳述不可能出自瓦德西，因爲「會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是「將來時態」，表明將會發生的事情。瓦德西抵達北京就任八國聯軍總司令，是在（庚子年）10 月中旬，其時聯軍占領北京已達兩個月。如果說聯軍破京之初特許軍隊公開搶劫，對瓦德西而言是過去時，他不可能用「將來時」表述。再者，史料明確記載，聯軍破京之時「日帥下令，無論何人，不許在北京擄掠」[373]。莫非日軍統帥會發布與聯軍司令部對抗的軍令？（歷史記載表明，幾乎占八國聯軍一半兵力的日軍指揮官柴五郎「於八國聯軍行動中，約束下屬不得參與劫掠行爲，讓北京居民因此感戴不已，視其爲守護神，返國時受到當地居民的夾道歡送」[374]。）

八國聯軍從天津出發赴北京馳援，大批天津市民圍觀看熱鬧

聯軍的隨軍牧師、英國傳教士寶復禮（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掠奪財物在軍營都是禁止的行爲，可是這種行爲很快變得越來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國聯軍當中下達一項禁令，禁止所有士兵，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不得進入當地居民家中搶奪財物。作爲憲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一個團裡已經有 15 名士兵因爲違背這條禁令

而被逮捕。軍官們正在想辦法，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來減少搶掠行爲的發生，並且希望把這些罪行的傷害降到最低。」[375]「美界（美軍管轄區——引者註）還出布告，不許其他國家的士兵在下午六點後進入美界。若美國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將其捆送巡捕房，賞銀元一百。若士兵持槍，百姓不敢捆綁，可以悄悄尾隨，另外派人去舉報。舉報者不會說外語也無妨，只需豎起兩個指頭，當局就會派人來抓。」[376] 聯軍在整頓治安中，因進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議。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於是下令，放棄這種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動[377]。聯軍指揮官還教中國民眾一招，用來懲治洋兵搶劫：「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灑其衣服，即可識認嚴懲」[378]。

事實上，八國聯軍破京之初，兵荒馬亂之中，大肆搶劫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這樣的歷史記載數不勝數，如「福祥（甘軍統領董福祥——引者註）走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傳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西曆 8 月 16 日，即聯軍破京的次日——引者註），晉軍甫飽颺（飽颺：飽掠而去——引者註），武衛軍又至，土匪爲之鄉導，挨戶傾筐倒篋，殷實之家，無一倖免」（《緣督廬日記鈔》）；「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鋪戶，均被潰兵以隨駕爲名，其時駕尚未出，紛紛西行，搶劫至室室皆空」（《拳亂紀聞》）。「陳廉訪所統各軍，擄掠尤甚，據云聯軍未入城時，京城業已擄掠一空。陳統各軍將所擄大小煙土，堆積如鹽包，每斤僅售數百文，貂套一襲僅售銀二兩」（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事雜記》）。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時而動：「京都失陷，城內外居民，紛紛逃避，土棍貧民，群起搶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鋪面廟宇，多被焚搶」[379]。趁亂哄搶、渾水摸魚的還有大量的普通市民。八國聯軍士兵也參與了搶劫。「聯軍抵京所獲者甚微，蓋金銀重寶已爲董福祥之兵所劫奪，刻下能取之物，不過皮貨及古玩而已，金磚金條，則從未見過。」[380]

中國民衆手執古代兵器和八國聯軍官兵合影

《庚子使館被圍記》中記述了作者親眼目睹的一場對當鋪的搶劫，頗具典型性。這場搶劫的始作俑者是聯軍士兵：「法國兵數人及印度安南兵數人」；由於遭到當鋪的武裝反抗，兩個路過的俄國哥薩克兵也加入其中。緊隨聯軍士兵入屋行劫的一群中國人，「有執屠刀者，有執鐵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們比聯軍士兵危險得多。那些聯軍士兵主要對黃金有興趣，而在當鋪中他們沒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背負一包」，走掉了。眞正大規模、澈底的搶劫（或許用「洗劫」更恰當）來自中國人；首飾、古玩玉器、名人字畫、皮衣、繡貨、綢緞等固然志在必得，日用百貨、平常物品也不放過。除緊隨聯軍士兵入內搶劫的本地流氓外，在當鋪「前面站滿數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進來之機會。其中並有年老之婦人」。這幾百人等在當鋪門外，是因爲有一個哥薩克兵持槍守門。當外國兵走掉，「外面鵠候之眾，遂一擁而進，如一群獵狗，並有婦女小孩，皆聞當鋪被搶之消息，來此發財者。一見哥薩克人走開，即爭前搶入，唯恐落後，相擠相打，似稍遲即被人搶完者。既入內，嘈雜愈甚，皆拚命搶奪，一切不顧矣。有呼叱之聲，有呻吟之聲，亡命之兇徒，與懦弱之百姓相雜，手執屠刀鐵尺，見有人阻其路，即肆意擊之。有搶物未得而受重傷者，有被擠倒地者，紛亂之狀，不堪入目。」

以上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英國人，在八國聯軍入京時對一家當鋪被洗劫的描述；再看看中國人自己的記載。「提起搶掠的情形來，眞是夢想不到，所有的買賣，都已被搶，無一倖存，最特別的是當鋪及米糧店。各當鋪門口扔著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當鋪中房屋深而黑暗，搶的人多，誰也不能挑揀，背出一捆來，一看不是綢緞或皮衣，就都扔在門口回去另搶。各米糧店門口，灑掉的糧食，都成了堤坡，因裝入布袋者很少，多數都是用筐籃裝走，所以有此現象。最特別的是搶酒店，因各種店鋪都搶完，只餘酒店也就搶了，有用盆壺灌的，有用桶擔的，灑的滿街酒香，遠聞十里……過了幾天，滿街都是賣衣服的。我花了一塊錢，買了兩件兩截大衫。兩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細白布，下身是羅或紗。」[381]

北京街頭的臨時攤販；民衆兜售趁亂哄搶或掠奪來的衣物

正是中國人這種鋪天蓋地、席捲一切的搶掠，給了聯軍士兵搶劫的借口和某種良心的安慰：如果我們不把一些財物據爲己有，留下來也會被中國人自己一搶而光[382]。

華人甚至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搶到了八國聯軍的頭上。瓦德西曾向德國皇帝報告：「無數華人對於本國同胞，尤其是無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搶劫，並出售其贓物。當其我們步兵大隊出征保定，離去營舍之時，因該隊營舍之面積甚大，防守較疏之故，竟被華人所搶掠。」[383]

可能出於這個經驗教訓，瓦德西在與中方談判代表慶親王、李鴻章會見時，建議華人爲了保全財產，最好不要離家出走：「瓦帥云：『居民在京者，其產業或可保全。此間華民，偷竊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財產者，不宜他往。如北省一帶，能從此安靜，吾心更喜。』」[384]

爲了「北省一帶，能從此安靜」，八國聯軍大力整頓治安。他們在北京分區而治，「皆試辦軍巡及警察，以禁止擄掠」[385]。有時人寫的「西江月」爲證：

貧者倏然而富，富者家產一空。
數日搶掠不消停，日本出示纔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舊搶擄肆行。
日本捉拿問分明，立刻明正典刑。[386]

中國孩子與八國聯軍軍人在一起

聯軍入京之初，民眾的搶劫普遍、猖獗到什麼程度呢？有清一代，旗人（滿族人）是統治種族，終生享有朝廷提供的免費錢糧。八國聯軍入京後，旗人的特殊供應中斷了。何以爲生呢？「北城住戶，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著每月的錢糧，他們從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引者註），就沒有得到錢糧，旗人如此，漢人也是很難生活，洋兵進城時，

雖然大家搶了不少，但已經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來了」[387]。北京貧窮的旗人和漢人，靠著京城失陷時搶劫來的財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餘！

放棄發家致富的可能、來中國「普度眾生」的外國傳教士，也被國人誣蔑在八國聯軍進京時搶劫。國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Bishop Favier）曾經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 8 月 18 日（西什庫）教堂解圍後 8 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價值不滿白銀 50 兩的，無需償還；超過 50 兩的，要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樊國梁主教針對此謠傳特地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所謂容許教徒搶奪生活必需品，根本無其事。因爲當時店鋪無人料理，無法購買物品，他准許教民在經過認眞的登記後，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後根據紀錄都付了款[388]。

國人抹黑八國聯軍，竟然把聯軍在戰爭中收繳清軍的武器也稱之爲劫掠。下面是在《鳳凰大視野》「義和團事件始末」的系列電視節目中，談到八國聯軍在天津搶劫時，一字不易的解說詞：「俄軍從火藥庫、東局子營盤等處，掠獲三百多門火炮和大量彈藥。日軍從水師營及海關道衙門等處，搶掠各種槍支八百多枝，火炮八門和大批彈藥。」

國人還有一個栽贓誣陷八國聯軍的手法。庚子之亂中，被義和團、清軍嚴重破壞、焚燬的北京街區留有一些照片，成爲歷史的見證。本文在前面展示了其中的部分照片。而在今日國人的宣傳之中，這些照片上的斷垣殘壁、瓦礫焦土，竟被說成是八國聯軍的破壞造成的，聯軍被誣爲在北京到處殺人放火。前文引述過，「史料明確記載的京城大火就有 71 起，幾乎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義和團湧入並占領北京的六月份發生的。」八國聯軍八月十五日才進入北京，但是他們要爲六月份發生的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負責。

八國聯軍濫殺平民百姓，也是國人對聯軍的誣指。在當代中國的歷

史著作中，這種誣蔑司空見慣，下面即爲其中一例。一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美人權之爭》中說，八國聯軍「殘殺中國人民，據記載，5 萬多人的塘沽鎮被變成空無一人的廢墟」。歷史的眞相如何？中國史書明確記載，「傳聞大沽砲臺爲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爲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擾，雞犬無驚，較城中（指天津——引者註）安靜。城中惡團（指義和團——引者註）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389] 在塘沽「市廛無擾，雞犬無驚」的八國聯軍，被鄰近的天津市民殷切期盼的洋人，今日竟被誣爲將塘沽「變成空無一人的廢墟」的屠城者。

實際上，庚子戰爭中聯軍避免傷害無辜。比如，8 月 14 日聯軍開始攻打北京城，「以巨木爲架，升大炮於其上，向京城中陸續開放……計連開十三炮，某國提督恐多傷民命，殊垂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勸阻，始已。」[390] 攻打一個國家重兵防守的首都，某國司令官因爲「垂上天好生之德」，只開了十三砲就竭力勸阻停止砲擊，不能不說是一種慈悲心懷。這位將軍不會不知道，他的這種仁慈可能會增加自己軍隊的傷亡。美軍沒有參加攻打大沽炮臺的軍事行動，但是美國軍艦「莫諾卡西號」收容了 37 名中國婦女和兒童，以躲避戰火。戰鬥結束後，當將這些婦孺送回岸上時，美軍發現了一個被彈片擊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國百姓。艦長命令將此人和兩個聯軍傷兵一起抬到軍艦上，進行手術治療[391]。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美軍和英軍清剿大股拳匪的戰鬥中，一名中國婦女被流彈射中了肘部。聯軍立即對她進行手術治療，並將她妥善保護起來。該名婦女既震動，又感激[392]（史料中未說明這個婦女的身分；但是從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擄掠來的「慰安婦」）。八國聯軍在華行軍作戰，因爲酷暑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醫療資源極其緊張[393]。在這種情況下，聯軍對中國人施醫救治，尤其難能可貴。

八國聯軍中的女護士

聯軍俘虜、醫治的清軍傷兵

庚子戰爭爆發前，經清廷允許，400 多名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到北京保護各國使館；這些洋兵被國人稱爲八國聯軍的先頭部隊。6 月 13 日義和團圍攻奧國使館，「先頭部隊」被迫開槍自衛，用機關鎗驅散氣勢洶洶的拳眾。爲避免火力殺傷，他們把機槍的準星調高，開槍只爲嚇退拳民。拳民敗退後，竟然大肆吹噓他們有「刀槍不入」的神功[394]。先頭部隊的不忍殺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搖撞騙的本錢。戰爭正式爆發後，也發生過聯軍士兵向攻擊他們的拳民放空槍，以避免殺戮之事。比如 8 月 4 日傍晚，天津「有義和團約百五十人，自外來攻租界……租界內各國練兵放無子槍數排，意欲使之驚退」[395]。

兩天之後，清軍重兵攻擊（爲聯軍占領的）天津。8 月 6 日「將曉，砲聲如聯珠，槍聲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從來無此惡戰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勢似難制勝。乃由洋官傳知各處，齊將門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國官軍入城。移時，忽聞中國官兵敗走，又皆將白旗插上。」[396]這是怎麼回事呢？八國聯軍入城後，天津居民在家門口插白旗，表示順從，是一種保平安的舉措。而當清軍反撲，聯軍擔心城市有得而復失的危險，於是洋官緊急通知各處，讓居民將門口的白旗拔去。這樣一旦聯軍撤退，官軍入城之後，不會對投降過外國聯軍的市民興師問罪，施加迫害。

在戰火紛飛、軍情危機之時，外國占領軍對中國民眾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慮，是難能可貴的。（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絕不會幹八國聯軍這樣的傻事。讓清軍殘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劇中國軍民的對立嗎？）

聯軍的仗義勇爲和對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現在（清廷正式宣戰前）爲拯救被義和團屠戮的中國基督徒及其家人，聯軍的「先頭部隊」（及使館其他人員）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北京市區救人，而不顧公使們的反對。美國公使館衛隊長邁耶斯說：「……拯救教民的行動會更加煽起仇洋情緒。但當我們看到渾身受燒傷和砍傷的教民不斷地逃到使館區時，我們這些血肉之軀不能不向他們提供幫助，並將其他的教民從惡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來。」[397]

「八國聯軍焚燬了翰林院」，不僅是國人枉加罪名，而且是倒打一耙，因爲作此傷天害理之事的正是中國人自己。英國公使館北靠翰林院。躲避在英使館內的各國外交官和眷屬以及使館收容的中外難民，視宏闊的翰林院爲天然屏障。「他們覺得，中國人對學養、傳統和建築美的崇尚，會阻止他們以任何手段毀滅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豐富的圖書館。」[398]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浪漫想像很快被事實粉碎。6 月 23 日，使館之戰剛剛開始，甘軍爲火攻使館，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焚燬了翰林院[399]。

翰林院被清軍焚燬後唯一倖存的建築

對這樣一樁罪責分明的戰爭罪行，國人竟然還要賴到八國聯軍頭上。這種指責的荒唐之處在於，8 月 15 日聯軍進京時，這個被中國士子視爲神聖的殿堂成爲一片廢墟已經近兩個月了。如果說，翰林院是公使館的外國人（在聯軍入京之前）放火燒的，則更是匪夷所思；無異於說，使館人員想自焚。實際上，清軍縱火之後，使館人員曾冒死衝入翰林院，設法撲滅大火。

翰林院被毀，大量的古籍文獻、稀世珍本化爲灰燼。八國聯軍不僅要爲此承擔罪責，還被國人誣爲將翰林院書籍「搶劫一空」。實際上，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 MacDonald）在翰林院大火熄滅的次日，就通過專線給清廷的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發出急電，通知他們，英方曾試圖搶救圖書館，並要求他們出面收拾翰林院殘存的書稿；可是中國政府根本不予理睬[400]。英國外交官和使館內的中國漢學專家懂得這些書籍的價值，它們不僅屬於中國，而且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財富。在被中國軍隊圍困、攻打的生死關頭，使館人員依然設法搶救翰林院的典籍。「……英國水手志願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線者亦皆聞信趕來，破牆而至院中……此時火勢愈熾，數百年之樑柱爆裂做巨響，似欲傾於相連之使館中。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爲人所拋棄。無論如何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人數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401] 英國公使把搶救出來的書籍和手稿設法送到了總理各國事物衙門。

英國公使竇納樂
(Claude MacDonald)

美國公使康格
(Edwin H. Conger)

國人在庚子戰後又是如何對待自己國家珍貴的典籍呢？「翰林院所儲《永樂大典》，百世之珍，亦毀棄流散。亂後，崇文門琉璃廠一帶骨董肆、舊貨攤，收買此類書物，不知凡幾。萃文書坊買《永樂大典》八巨冊，祇京錢一吊而已」[402]。英國使館交回搶救出來的《永樂大典》330冊，不久竟然被監守者瓜分。

國人抹黑八國聯軍、詆毀聯軍聲譽還有一個常用的手法，就是利用西方人自己對聯軍一些不實的指責，甚至是惡意的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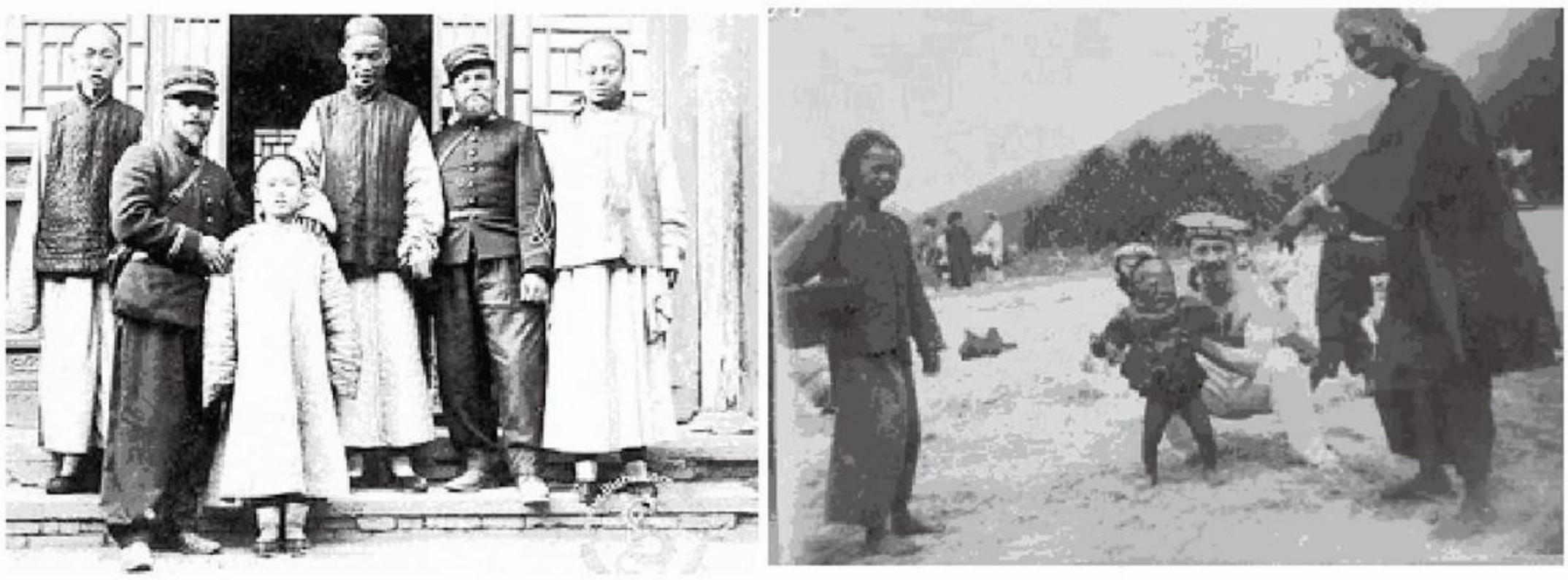
西方的媒體和社會輿論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從不給當權者歌功頌德，從不讚美、諂媚政府。相反，監督、批評政府是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天職。政府千般好處無人講，一旦有錯絕不饒；「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筆者爲寫此文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史料。對八國聯軍在中國的諸多仁政、善舉，對聯軍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把天津改造成爲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本文之「奇觀九」將詳細論述），筆者主要是從中國人的文章、典籍以及《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中發現的。西方人的著作中很少有對八國聯軍的讚譽之辭，更沒有對八國聯軍的評功擺好。八國聯軍是人道救援之師，這在西方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西方人眼裡，八國聯軍在中國平息暴亂、維持治安、救濟貧困、管理市政等等，是聯軍當局的職責；做這些事情是當政者的本分，而不是功績，因此根本不值一提。西方媒體和公眾輿論關注和討論的，是政府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或不夠好）。對八國聯軍入京之初的搶劫行爲，西方媒體和公眾輿論大力揭露、深刻自責，鳴鼓而擊之。軍人的不法行爲透過媒體和反對黨的放大鏡、哈哈鏡，難免失眞。而對中國人而言，這些報道和評論越是失眞、越是離譜，就越符合抹黑八國聯軍的需要。

馬克 · 吐溫

在北京市民圍觀下，德軍列隊走過東城區

西方媒體和公眾輿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多元性：左、中、右齊備，理性與偏見並存。以一個現代的例子爲證。對「9.11」恐怖襲擊，西方輿論中固然不乏譴責，但認爲美國「咎由自取」的聲音也並不弱。更有人竭力宣揚陰謀論，說「9.11」恐怖襲擊是美國政府自己策劃的。西方國家中這種極端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思潮，在一百多年前的庚子戰爭時期不僅存在，而且在知識界的影響不容小覷（其時馬克思主義正方興未艾）。這種思潮的一個著名代表是美國作家馬克 · 吐溫。馬克 · 吐溫對中國義和團的大力頌揚，對西方傳教士和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蔑，是國人抹黑八國聯軍的無價至寶和重要依據。凡是國人譴責八國聯軍或西方教會的（較爲正式的）文章，馬克 · 吐溫的話是一定要引用的。馬克 · 吐溫何許人也？他是彰明昭著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狂熱分子，「美國反帝大同盟」（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副主席（他擔任此職一直到去世）[403]。庚子年間，馬克 · 吐溫對義和團滅洋、滅教的恐怖殺戮和肆意破壞，對清政府殺害外交官、圍攻各國使館的戰爭罪行，竟然表示無保留的支持。他在庚子年 8 月 12 日寫給朋友的信中說：「現在全中國都站起來了……我希望他們能把外國人都轟走，永遠不讓他們再回去」（這不是與西太后不謀而合嗎？）。同年 11 月 23 日，馬克 ·

吐溫在「美國公眾教育協會」年會上發表題爲「我是一名義和團」的演說，宣稱（庚子之亂）「事情都是外國人鬧出來的，只要他們能滾出去，那是多麼大的好事」。在演說中他高調宣稱：「我就是義和團！」[404] 這和一個當代的美國人在大庭廣眾之中狂妄叫囂：「我就是賓・拉登！」有多大區別？義和團令人髮指的燒殺搶掠暴行，駭人聽聞的反文明破壞行徑，西方媒體作了廣泛的報道，馬克・吐溫並非無所聞。但是憑著他「反帝」的狂熱，憑著他極左的「一根筋」，他可以統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可以就中國事務任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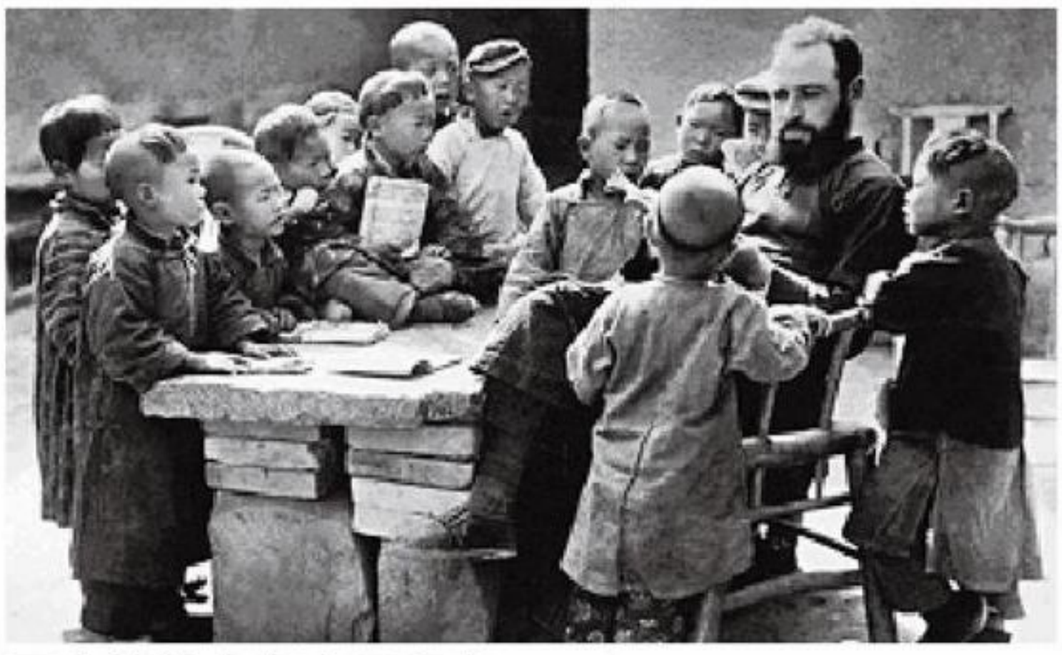


中國民眾和八國聯軍軍人合影

中國人攻擊基督教會和八國聯軍時最愛引用的馬克・吐溫的一篇文章，是他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 年 2 月號上發表的「給坐在黑暗中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中被國人如獲至寶引用的一段文字爲：「美國公理會差會部的梅子明牧師先生已從外地旅行回來，他是去爲義和團所造成的損失索取賠償的。他不論走到哪裡，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已爲每一個被害教徒索取三百兩銀子，並強迫對所有被損毀的教徒財產給予全部賠償。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這筆錢將用來傳播福音。梅子明先生聲稱：他索取到的賠償，比天主教所獲得的數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

抵人頭。他們爲每一個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銀五百兩。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爲此，這裡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要求賠償七十五萬串現款（合三十四萬兩銀子）和六百八十個人頭。」不要說中國人，就是有正義感的西方人聽到對傳教士這樣的控訴都會義憤塡膺。可是，這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和欺騙。謊言的原始製造者是紐約《太陽報》的無良記者，謊言的大力傳播者則是馬克・吐溫。

《辛丑條約》對西方各國索賠的原則、手續和中國賠款的總金額作了嚴格的規定。無論何國何人，只能按《各國索賠章程》進行索賠。所有的索賠必須提供確鑿無疑的損失證據，必須經過各國公使的審核和批准（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各國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馬克・吐溫文章中的美國公理會牧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不論走到哪裡，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天主教傳教士的索賠更是駭人聽聞，而且「要用人頭抵人頭」。謊言的無恥程度證明了謊言散布者人格的低下和智力的貧乏。梅子明難道是神通廣大的下凡的神仙，身後跟著十萬天兵天將？他憑什麼可以任意踐踏國際公約，踐踏《各國索賠章程》？他憑什麼「不論走到哪裡，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而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如此索賠，豈不天下大亂！根據歷史文獻《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八國聯軍的天津臨時政府視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私下向民眾索賠爲非法行爲，是要抓捕、審判的（本文之「奇觀九」論述天津臨時政府的施政時將有詳細說明）。不容歪曲的歷史事實是：「新教教會基本都放棄了賠款要求。相反，他們還在各國國內組織了很多捐款，以救濟品的名義送到中國遭受兵災的各個地方。」



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兒童

基督教福利院收養的孤兒

馬克・吐溫文章中最荒誕不經的謊言是「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抵人頭」。此謊言到了中國人手裡被進一步發揮，變成了「美國基督教傳教士梅子明以『用人頭抵人頭』爲口號就殺害了中國無辜農民六百八十人」（《晚清歷史現場》第二卷「內憂外患」）。基督教新教牧師梅子明指摘的天主教教士的「人頭要求」，變成了他本人大割人頭、大肆屠戮。這是國人相當典型的「控訴」基督教會和八國聯軍的方式。

馬克・吐溫在對基督教會進行放肆的攻擊和誣蔑後，把矛頭指向了美國政府。他公開呼籲：「不論是在華活動的傳教士們，或者在美國的基督教差會總部，他們的政策和行動都是由他們國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這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實，必須押上審判臺接受人民公審並打倒的應當是帝國主義！」[405] 這位「美國反帝大同盟」副主席的叫囂改變不了「一個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實」：美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度；民主選舉產生的美國政府不會干預、更不會「控制和支配」教會事務。被押上歷史的道義審判臺，「接受人民公審並打倒的應當是」馬克・吐溫自己。

針對馬克・吐溫的誹謗、中傷，美國基督教會要求他「向公眾發表公開道歉」。1923 年，馬克・吐溫的出版人在出版吐溫的著作《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k Twain， Europe and Elsewhere》時，不得不刪改「給坐在黑暗中的人」，刪去吐溫文章中有關梅子明牧師和傳教士在中國索賠的荒謬章節。[406]

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婦孺在一起

聯軍在華作戰，八國軍隊的軍紀參差不齊，軍人操守有別。軍紀最好的恰恰是馬克・吐溫攻擊的美國政府的軍隊。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中，八國聯軍之戰被準確地稱爲「中國解救遠征」。美軍在這次遠征中被譽爲「一支非凡之旅」。它的非凡之處首先在於美軍在中國的行爲準則、規範，與它在（國內的）南北戰爭中在南方占領區是一致的，即嚴格執行 1863 年發布的「軍令 100：戰地美軍指令」（General Orders No. 100：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包括嚴禁劫掠、保護平民。即是說，美軍像對待美國人那樣對待中國人。[407]

美軍進京後駐紮在先農壇；美國將軍威爾遜稱其爲「一個典雅的古老廟宇」。其時正值炎夏，驕陽似火，但美軍沒有進駐那座規模宏大、濃蔭

覆蓋的廟宇，而是在外面安營紮寨。廟宇中巨大的殿堂留給了剛從使館營救出來的、飽經苦難的中美兩國的病弱者和傷員。[408]

美軍士兵席地而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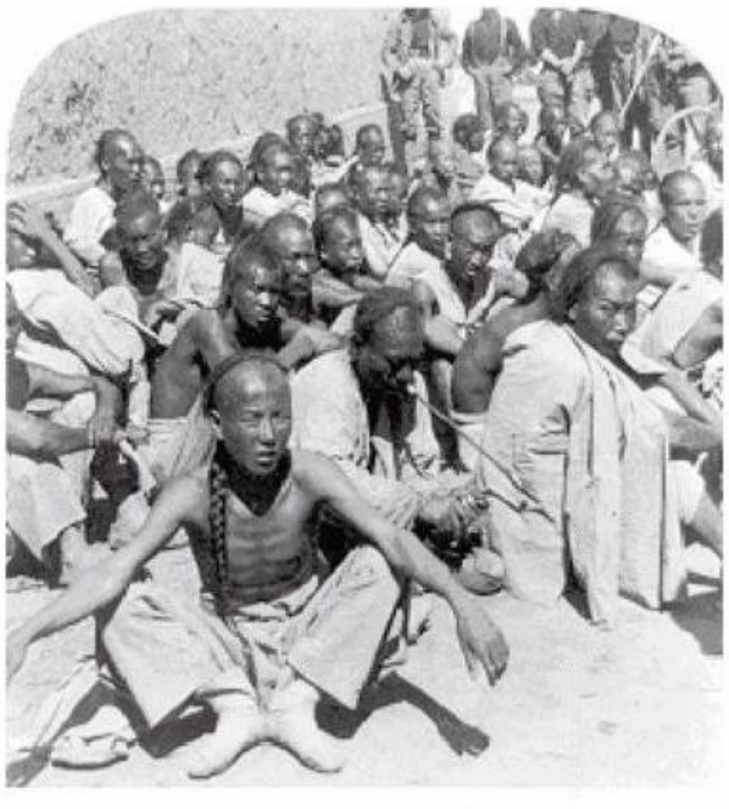
八國聯軍在北京城門外安營紮寨

八國聯軍在北京分區而治。美軍管轄區原是京城繁華的商業區，包括被義和團焚燒搶劫破壞最嚴重的前門一帶。美軍入城後的當務之急是「清理街道，擴清空間」；於是那一帶的居民不無驚訝地看到，美國大兵努力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處的物品[409]。與此同時美軍著手建立秩序，恢復治安。威爾遜將軍尋覓到當時最好的翻譯，把他所有相關的命令、指令「譯成中文並張貼在所有公共場所，以便開業的店主商販和清廷官員能夠不需翻譯而自由閱讀」[410]。美軍司令部不僅要求美軍嚴守紀律，秋毫無犯，而且在管轄區內嚴格維護治安，嚴禁任何人的搶掠行徑；對搶劫者開槍鎮壓，包括自己的士兵[411]。「自從命令張貼之後，沒有發生任何一次違反紀律的行爲。其結果出奇得好」；「中國人開始明白並最終確信，在美國占領區他們不僅有人身安全，而且所有的財產也是安全的。幾天以後，街道秩序恢復，市場重新開張，所有階層的人們返回他們的住宅，彷彿外國軍人不存在。」[412]當時北京居民的日記載：「城中美界安堵如故（像原來一樣平安無事——引者註），市肆全開，人心靜謐」[413]。

前文提及，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向貧民提供免費食物。美軍在其管轄區內再額外設立 3 個「粥廠」，救濟窮人。「南城珠市

口、太清觀、南横街等三處，蒙暫轄美界知府特爾森君送給小米若干石，商請紳董煮放。美兵官在京，善政不可枚舉，此舉尤足令人生感也。」[414]特爾森（John Tilson）是美軍上尉，任美軍與華人之間的聯絡官。特爾森能夠代表美國以「善政不可枚舉」的讚譽進入中國近代史文獻不是偶然的。除開辦粥廠、救濟窮人之外，他在美軍管界還清理出被遺棄的房子，開設診所，爲妓女進行健康檢查。美軍的隨軍醫生還在市民中開展了大規模接種疫苗的活動，防止疾病的傳播。當北京嚴寒的冬季來臨時，美軍管轄區爲貧苦無依的人建立庇護所，收容他們，並增設粥廠，廣施救濟。此外，美軍當局採取措施，設法醫治中國社會的兩個痼疾：賭博被禁止，所有的鴉片煙館被封閉。由於「不可枚舉」的善政和人道關懷，成千上萬的北京居民蜂湧而入美軍管區，以至於造成住房的嚴重短缺。[415]

美軍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間都軍紀嚴明。1900 年 9 月 12 日，查菲將軍發布命令：所有在北京以外執行任務的分遣隊，必須在軍官或士官的統領、指揮之下。所有的軍官、士官均需嚴格命令部屬，禁止開槍，除非自身安全受到威脅。如果士兵違反這條軍令，軍官有責任將其逮捕。搶劫財物更是嚴令禁止的[416]。聯軍指揮部曾收到來自通州的一份報告，指控聯軍在那裡有不法行爲。美軍總指揮對此高度重視，立即決定全面調查。調查結果證明：美軍在那裡的紀律良好，行爲規範[417]。對待俘虜美軍不會虐待，更不會處死，包括對並不享受戰俘待遇的拳匪。美軍或許會將他們充作勞工，在戰後則全部移交給中方（中國政府反而往往將他們處死）[418]。



被美軍第六騎兵隊俘虜的拳匪

被清政府逮捕的拳匪

1900 年 10 月，聯軍的「管理北京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of Peking）成立。委員會下設小組委員會，負責不同領域的工作。美國人參加了兩個小組委員會。一個是與德國人一起，負責健康保障、疫病防治、街道的清潔照明、公廁的設立、房屋的分配、醫院及中外醫生的管理等。在另一個小組委員會中則是與英國人合作，負責財政管理、海關營運以及市政開支[419]。這種全面、先進的城市管理是清政府望塵莫及的。

美軍嚴明的軍紀也表現在軍需採購方面：「美國有組織地徵收牲畜，支付合理價錢。並且頒布了命令，禁止以其他各種手段獲得牛羊肉」[420]。軍需採購價錢合理，僱傭勞工亦待遇優厚。聯軍在天津作戰期間，美軍給予中國勞工的待遇是，除管飯之外，每天的工資 20 美分（當時租界內的二等巡捕日薪只有 10 美分）。爲保護中國勞工的人身安全，美軍還爲他們提供守衛。在從天津向北京進軍的途中，用車子爲美軍運送軍需給養的中國勞工，除管飯外，報酬是價值 1 美元的黃金[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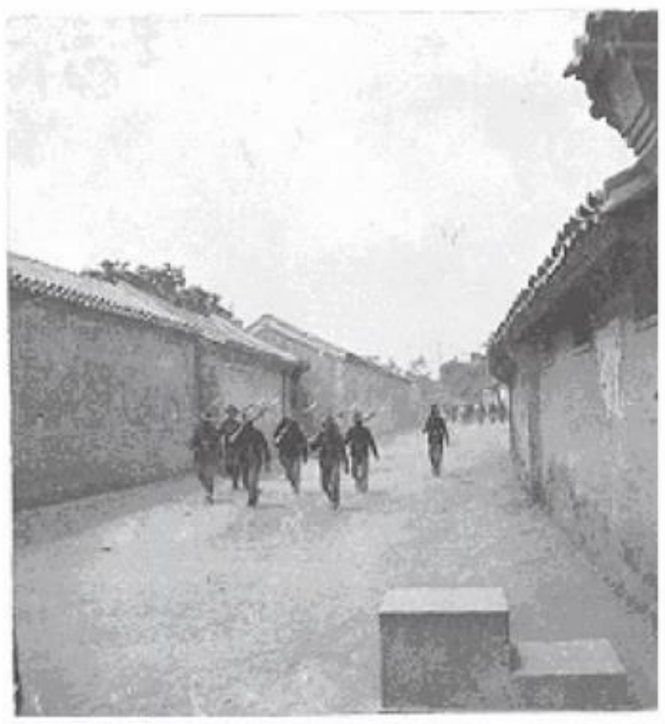
美軍在天津僱用的獨輪車隊（民工日薪 20 美分）

戰爭中士兵的劫掠行爲是難以禁絕的，尤其是出兵作戰帶有對敵國報復的情緒。美軍高層採取了各種手段制止搶劫。如果發生劫掠，除在現

場鎮壓之外，美軍會將劫掠的物品全部沒收，設法歸還原主。若物主無法找到，則將物品交給軍需部門，通過拍賣讓士兵掏錢購買，然後發給士兵憑據以證明占有物品的合法性。美軍對士兵擁有的私人物品嚴格檢查，若無憑據，一律沒收[422]。拍賣沒收物品所得的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庫中。美軍曾發現大量銀錠（價值 376,300 美元）；這些銀錠和繳獲的其他貨幣被運到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賣給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收益也存放在金庫中。在外交和解達成後，美方將所有這些收益都交還給中國政府[423]。清政府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戰爭結束時會來這麼一筆橫財。

美國公使康格在聯軍入京一個月之後（9 月 17 日）給國務卿的電報中說：「這個城市正在建立良好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國人和日本人管轄的區域內，中國人正在返回他們的家園，店鋪正在開業，等等。」公使館解圍，外交官、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獲救，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重建，美國認爲「中國解救遠征」的任務基本完成了。「美國不支持延長在中國任何地區和任何地點的外國軍隊的占領，也不支持在京修築國際據點，而要繼續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424]。聯軍入京後，美軍只參加了聯軍的兩次軍事行動，均在 9 月中旬，即在北京西山八大處和天津靜海獨流鎮清剿大股拳匪[425]。據《申報》1900 年 10 月 2 日報道，美國在 10 月初即聲明退出德國瓦德西元帥所統領的剿伐拳匪的軍事行動，「不再與聞戰事」。美國大規模從中國撤軍也於 10 月初開始。

「中國解救遠征」中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美軍在北京街頭巡邏，維持治安

美軍在華行動直接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關注。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Rockhill）在拳匪暴亂平息後，專程赴天津市區及京津一線視察。（1900年）10月1日他給國務卿約翰・海發了一份電報匯報情況：「我很高興能夠告訴您，我們軍隊在這裡和別處任何地方的行爲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他們的紀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讚許。」所有方面的讚許中，最難能可貴的是中國民眾的讚許。據時人記述：「美界紳民以歸美國暫管以來，地方安謐，刁斗不聞，於是製造萬名旗傘匾額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銘。」[426] 鼓樂前導，敬送「萬名傘」（或稱「萬民傘」）及匾額，傳統上代表中國民眾對地方官治理業績和爲官操守的高度評價。1901年3月，由於美軍的大規模撤離，北京一萬三千市民聯署請願書，呈交給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請求美軍留守[427]。這是北京市民挽留美軍的一片赤誠，是中國人民給予美軍的高度評價。

歷史雄辯地證明了：是八國聯軍平息了拳匪清兵的大屠殺、大破壞；是八國聯軍解救了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千千萬萬的中國基督徒，同時解救了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北方民眾。八國聯軍不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破壞者；剛好相反，他們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恢復重建者。戰亂之後，聯軍對貧民、災民的救濟扶助和人道關懷，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八國聯軍平息庚子之亂，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場罕見的浩劫。

1872年首批前往美國上學的30名中國幼童

19世紀80年代初傳教士送中國婦女出國接受教育

奇觀九：八國聯軍改造天津的業績

八國聯軍對中國城市的占領是臨時的，但是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聯軍把天津改造成爲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聯軍的治理業績，前無古人。聯軍政府的清廉，在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絕後。

聯軍攻占天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The Tianj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國人稱之爲「天津都統衙門」。此衙門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衙門；手握大權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門主官，而是臨時政府委員會。從 1900 年 7 月 30 日成立，到 1902 年 8 月 15 日解散，臨時政府委員會一共召開了 329 次會議，4 次特別會議，平均每兩三天開一次會。會議討論通過的所有議案、制定的各項法規、法令均以法文（國際上最權威的法律文件用語）作詳細記錄。兩年下來，會議記錄彙編成幾大本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權時，會議紀要作爲法律文件移交給清政府[428]。

天津臨時政府發布的第 1 號「告諭」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恢復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爲了收拾庚子之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臨時政府還採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戰亂之後可能爆發的瘟疫。同時臨時政府不失時機地「採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施」，撥款賑撫，救濟貧民：「去年冬，以貧民無依，飢寒交迫，津郡及縣屬村莊，均蒙中外賑撫」。在天津「楊柳青……蒙本段洋分司員傅（『傅』是臨時政府的洋人官員——引者註）轉求都統，發給洋銀九百餘元，購紅糧三百餘石，經局紳幫同司員查寫極貧二千餘戶，分別散發。」[429]

劫後餘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後，臨時政府的「清理地

方，保全善良」進入下一個階段：「清理中國政府及私人放棄的動產和不動產，編造清單並且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爲確保民眾的財產安全，臨時政府對戰後混亂的私有財產進行清理，重新登記；向能夠出示房地產證書的人發放房地產證，並頒布了契約註冊辦法。西方國家對財產權的尊重（無論是私產還是公產）和契約精神，在臨時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體現。

簡樸的八國聯軍天津臨時政府

即使面對軍事需要，這個戰時軍政府也不會侵犯民眾的財產權，不會任意損害民眾的福祉。其時英國占領軍司令坎貝爾（Lorne Campbell）將軍要求都統衙門在市區東南軍械所附近設置一個靶場，將軍得到的答覆是：「如不付給房主賠償費，本委員會無法讓居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搬遷。」[430]

自古以來，中國並無城市建制；城市地區歸所在縣管轄，而縣衙門根本沒有什麼市政管理機構。19 世紀中國的城市人口大量增長，城市控制、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後成爲社會失控的主要原因。天津臨時政府按照西方城市行政體制設置，中國首次出現了城市行政區的建制和現代化的城市管理。臨時政府下設衛生局、公共工程局、司法部、巡捕局、庫務司以及總祕書處和漢文祕書處。各機構的首長，除了巡捕局局長是一名英國軍官

外，其餘都是專業人士，而且久居天津。比如擔任漢文祕書長的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是久居天津的美國人，創辦了北洋大學堂並任總教習，也曾任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副領事。衛生局長德博施是一名法國醫生，曾任法國公使館醫生，當時在天津行醫。公共工程局局長由丹麥工程師林德（Linde, A. de）擔任。他 19 世紀 80 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服務於公用事業，曾參與海河治理工程。

臨時政府的司法制度是按照西方法律體系建立的。臨時政府設立法庭並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依法審理判決。這也是中國亙古未有的。八國聯軍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從制度上保證了司法公正，結束了中國兩千年來縣官坐堂打屁股、「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的司法黑暗和野蠻。

中國第一支警察隊伍也是八國聯軍創建的。臨時政府成立後，爲了解決迫在眉睫的治安問題，首先成立巡捕局，著手建立城市警察系統。警察由外國巡捕和華人巡捕兩部分構成。外國巡捕主要從各國軍隊中抽調官兵組成，華人巡捕則由紳商保舉本區華人擔任。巡捕不僅負責司法、治安，而且負責交通、衛生等公共事務。中國的城市中首次出現在街頭站崗維持治安、指揮交通的警察。天津城廂地區還被劃分爲 8 個治安區，每區推舉 6 名華人紳商協助治安管理。袁世凱接管天津後（袁當時任直隸總督），警察制度被完整地繼承下來。

在天津街頭巡邏的外籍警察

八國聯軍野戰醫院的消毒車

天津臨時政府還創立了城市稅收制度。「臨時政府的財政最初是依靠參加政府的各國各墊款 5000 英鎊開始運行的。臨時政府成立後，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稅收制度。根據臨時政府制定的稅收章程，主要開徵入市稅（即釐金）、碼頭捐、所得稅（房捐）、鋪捐和執照稅等……臨時政府對各項捐稅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詳細和明確的記錄，實施嚴格的管理。從記錄中可以看出，稅收制度建立後，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許多公共工程得以實施。在向袁世凱辦理政權移交時，臨時政府將全部收入和支出的帳目清單，以及還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費用、政府財政結餘等一併交給了袁世凱。」[431] 這恐怕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清廉如水的政府財政交接。中國的地方政權交接（舊官去職，新官上任），前任留下財政虧空是常態。天津臨時政府竟然向袁世凱轉交了財政盈餘；八國聯軍對中國掠奪、搾取的謊言可以休矣。

在戰局穩定之後，臨時政府掀起了天津現代化改造的高潮，主導了天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制定。

臨時政府主持了天津城牆的拆除和大規模的道路修繕、開拓工作。19 世紀末，城牆的傳統防禦功能已經不足道；當城市迅速發展時，城牆成爲交通的最大障礙。天津城牆拆除後，沿城牆基址修築了四條馬路，成爲城區的交通幹線[432]。天津老城原來只有一點點石板路，其餘均爲土路，一下雨則泥濘不堪。臨時政府大力整修舊馬路，同時還修築了城北門至運河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區的道路系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臨時政府在城市交通方面的另一個建樹是創辦有軌電車交通系統。當時歐洲人和日本人分別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承攬修築電車工程的申請；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優先獲得專營權。經臨時政府的愼重審查，比利時銀行團投資的「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獲得了有軌電車的經營特許權。中國的第一個公共交通系統由此誕生。

天津第一輛有軌電車

天津的自來水供水系統也是臨時政府執政時創立的，開中國「自來水」之先聲。1901 年 3 月，德商瑞記洋行向臨時政府提出建立自來水供水系統的申請，獲得批准。臨時政府委員會對供水系統的設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給以及水價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433]。

八國聯軍的執政同時帶來了中國城市的光明。天津的路燈在 19 世紀 80 年代首現於英租界；華人得享路燈照明則是八國聯軍的貢獻。臨時政府委員會於 1900 年 11 月做出決議，要求城區馬路兩側每隔 100 步安裝一盞路燈（油燈），安裝及維修費用由沿路房主承擔。翌年 2 月，臨時政府決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負責，籌劃安裝電力路燈[434]。在與「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簽訂協議時，臨時政府提出將電車專營權授予該公司的條件之一，就是公司要爲電車經過的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電力路燈照明。路燈即設，天津夜晚「燈盞齊明，如同白晝，比除夕倍覺輝煌」[435]。

中國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也是八國聯軍首開先河。之前，一些政府衙門、官邸安裝了專線電話，租界也出現電話；但是電話的商業經營和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則是八國聯軍治理天津的產物。1901 年 2 月，丹麥人濮爾生在老城區註冊成立了一家經營電話、電報的公司：Electr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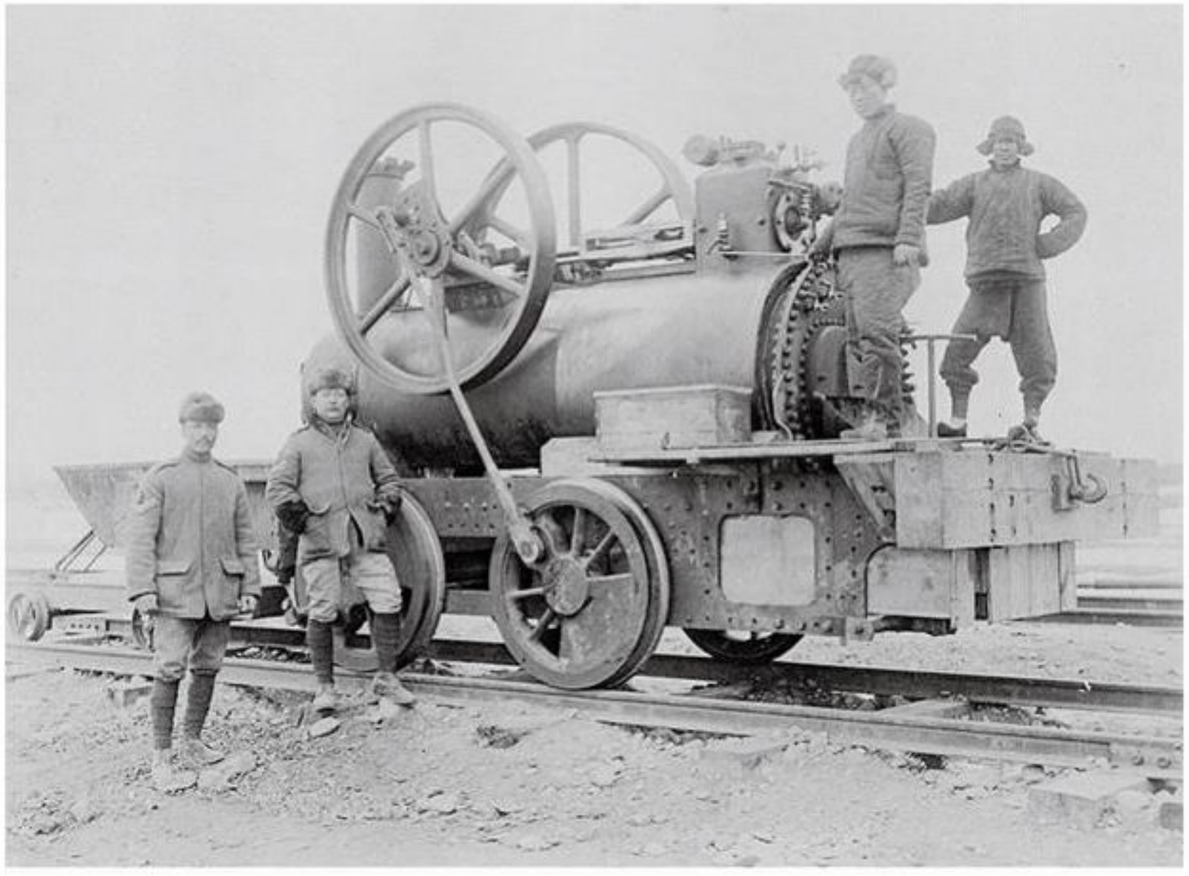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註冊名稱爲「電報局」。這家公司在老城區埋電線桿、架設電話線，電話開始在政府機構、公共設施（如醫院）和民間普及。除日常廣泛的公私用途之外，在夏季汛期，臨時政府還利用城市電話系統（當時最快捷的通訊、傳播手段）通報每日的海河汛情，組織防洪救災。

八國聯軍對中國另一個傑出的貢獻，是建立了亙古未有的公共衛生系統。中國自古以來既無公共廁所，亦無有組織的垃圾收集清理。城市居民在街上任意出恭，傾倒大小便桶和垃圾；滿街屎尿、遍地垃圾臭水溝就是當時城市的衛生面貌。傳統上皇帝出行時，官府要安排老百姓「淨水潑街，黃土墊道」。這不是皇家不必要的奢侈排場，實在是因爲要遮掩街道上的汙穢。實際上，皇宮內也沒有廁所，「宮裡沒有廁所……宮裡的旮旯處，就成了小便池，連莊嚴的太和殿兩側，也隨處散落太監們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沒事不會去那裡，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過一次，到時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436]19 世紀隨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衛生狀況日益惡化，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當時對城市環境影響最大的是生活汙水、垃圾以及人們隨處便溺的習慣。

「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做出決議，城區禁止隨地便溺。路上行人隨地大小便要罰洋 1-2 元。同時，臨時政府開始以招標的方式建造公共廁所。很快，老城區建造了多處公共廁所，並設有清潔夫按時清掃。臨時政府專門發布告諭，要求人們必須到廁所『出恭』，在廁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罰（對於不守規矩者，「八國聯軍士兵端著刺刀，押著他們去公共廁所，逼著他們養成衛生習慣」[437] ——引者註）。同時，臨時政府還要求所有糞廠遷至郊外。」解決居民隨地大小便問題的同時，臨時政府也著手解決城市拉圾問題。「1901 年 3 月，都統衙門制定了《潔淨地方章程》，規定居民每天必須將垃圾傾倒到劃定的垃圾場，然後由政府統一處理。住戶

每天要將自家門前地段清掃乾淨。並明文規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衛生立法。違反這些規定者會被外國巡捕抓捕，受到罰款、鞭責等嚴厲處罰。與此同時，由臨時政府衛生局組織專人清理河邊、城內堆放的垃圾，僱用清潔夫打掃街道。」[438]

臨時政府同時主導了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他們未採用政府投資的方式，而是利用民間集資或投資。臨時政府要求各街區的士紳出面組織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費用由士紳們承擔。對排水工程的設計和施工質量，臨時政府嚴格把關。工程設計要經過公共工程局的審批。驗收工程時，如果工程質量高，政府將承擔部分工程費用。在臨時政府的鼓勵下，私人公司也參與了排水系統的投資與建設。德國人漢納根的「大廣公司」提出修建城區南部排水系統的方案，臨時政府委員會經審查後批准。該公司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排汙池，老城區的汙水被排入池中，再經由專門水道排入海河下游。這一排水系統一直沿用至 20 世紀 50 年代[439]。



唐胥鐵路上的蒸汽火車

在八國聯軍臨時政府的治理下，天津乾淨了，衛生了。北京的面貌在聯軍治下也發生了類似的重大變化。時人記述：在北京「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

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各司其事」[440]；「又爐灰穢土，街前不准堆積……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連紫禁城內都修建了公廁。時人編成〈西江月〉，讚揚城市面貌的變化：

不准堆積糞土，勿許街市出恭；路途小解或出恭，罰爾兩天苦工。

各處砌壘廁所，街巷掃除乾淨；禁止鬥毆與強爭，煙館賭局詞訟。[441]

各處添設土筐，運載糞土出城；街巷潑水點夜燈，小兒臉要乾淨。

添立牌頭街長，稽查户口人名；設立巡捕與分廳，殲除賊源盜風。[442]

國人在八國聯軍治下（包括強迫之下）第一次享受到清潔、文明的生活方式。（可惜好景不長；八國聯軍撤軍後，城市的髒亂汙穢，故態復萌。據《大公報》報導：「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爲潔淨，刻下則糞溺狼藉，又復舊觀矣。」）

清政府官員慰問八國聯軍

終獲解救，英國公使館內中外人士歡欣雀躍

1902 年 6 月，就在八國聯軍最後撤出中國的兩個月之前，天津發生了一次流行性鼠疫。「鼠疫最初是從塘沽傳入的，並主要在城北區蔓延。臨時政府隨即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設置了港口檢疫隔離站，在市區建立了醫療站，還對感染者的隔離、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環境消毒等制定了強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時送醫院隔離、冰鎮並用石灰塗身；焚燬病家衣物；一周內封閉患者住房，用石灰水塗封門，胡同禁行，鄰居不得進入，與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領取許可證才能掩埋，並由政府專門僱用的苦力抬運和掩埋屍體。爲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擴散，臨時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死亡報告制度，如藏匿死屍不報，要處以帶枷遊街、罰苦工等嚴厲處罰。當時，臨時政府還專門發布告諭，制定衛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須飲用開水、蔬菜水果必須煮熟食用，保持身體清潔，染病必須及時報告，同時還免費提供石灰用於廁所等消毒。要求製造汽水的水鋪鋪主必須使用開水，對違反者嚴厲懲罰。」[443]

發生鼠疫是不幸；剛好在聯軍撤軍之前發生，則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沒有臨時政府迅速及時、嚴格高效的防疫措施，而由腐敗、低能的中國政府應對，這場鼠疫將可能在多大的區域內肆虐，多少國人將因此喪命，是不難想像的。清末的殷鑒不遠。1894 年鼠疫在雲南省爆發，由於沒有有效的防疫措施，鼠疫迅速蔓延；全國死了 300 萬人，鼠疫並流行到全世界[444]。

臨時政府——這個外國占領軍的軍政府也沒有忽視學校教育。臨時政府撥款，「努力操辦」學堂，「選聰慧子弟肄習洋文洋語」，「以克服中外語言，文字不通，諸多不便」；學堂裡同時「講讀經史古文，並字學、算學、輿地學」[445]。（八國聯軍不是因爲需要翻譯而辦學；在學堂裡上學的都是小孩子）

教會學校的老師和孩子們

1894 年嘉約翰與他創辦的博濟醫院同仁合影

臨時政府向天津居民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其中包括接種天花疫苗[446]；中國人開始從可怕的天花疾病中解脫出來（這個病要了兩個清朝皇帝的命——順治和同治）。

臨時政府執政時期，還建立消防隊、制定交通法規、建立公共墓地等。臨時政府還計劃進行人口普查；爲此不僅組織了專門機構，擬定了人口調查表，還開始爲城區街道正式命名，編製住宅門牌號碼等等，爲人口普查做周密的準備（由於政權不久後移交，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抽大煙、逛妓院是中國社會的痼疾。臨時政府猛藥去痾，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中規定：「凡煙館娼寮一律封禁。違禁者，或私赴此等地方者，俱予以嚴罰」[447]。

臨時政府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對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現代化的巨大貢獻，是古往今來中國任何一個賢臣能吏或政府當局都無法比擬的，可謂前無古人。蘇東坡在任杭州刺史時修了西湖的一道堤壩，受到千古稱頌；但與八國聯軍在天津的業績相比，不是螞蟻比大象嗎？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八國聯軍在完成人道救援使命、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後，絕大多數聯軍將領都急於率軍回國，因爲在中國駐軍開支浩繁，占用大量人力、物力資源[448]。在歸心似箭的情勢下，聯軍的臨時政府竟然成就了城市改造和現代化的豐功偉績。

按照國人的思維定勢，外國占領軍在天津的種種建樹、作爲簡直是

「吃飽了撐的」。他們是在交戰國的土地上，既無拚政績、圖陞官的驅動，亦無摟錢財、飽私囊的利誘，所爲何來呢？想收買中國的民心？可是當政者有八國之多，國人該感激哪一國？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是，八國聯軍組織的臨時政府是一個有責任心、關心民眾福祉的政府；爲人民服務，是政府的天職。這種普世價值如此「刻骨銘心」，就是在交戰國臨時占領的城市也自然會表現出來。

北京孩童學聯軍敬禮的樣子

中國孩童模仿聯軍的持槍禮儀

進行天津大規模的開發建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遷工作。在八國聯軍治下，拆遷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呢？這裡以修建一條沿河公路涉及的動遷爲例。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專門討論了那次拆遷的徵用費問題。委員會責成公共工程局局長、丹麥工程師林德就沿河房屋提出估價報告。該報告完成後，由司法部長、司庫和中文祕書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報告提交給市府委員會。市府提前一個月發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遷的居民。居民有意見、要求儘管提出來，由市府進行審議；市府絕無隱瞞、強橫之舉。每個拆遷戶均得到三方面的補償。一是房價補償，按委員會綜合專家分析確認後的房價執行。二是宅基地皮補償，均以每畝 75 兩支付徵用費（相當於五品官一年的俸祿）。三是在市內遷居地區免

費劃撥同等面積的宅基地，給予拆遷戶。房產的製圖造冊，統一由臨時政府召集房主、地保與相關人員到場，當面完成，一式兩份。拆遷戶的補償銀兩，由臨時政府的下屬部門在預定時間統一發放。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公共建設項目，其拆遷戶的補償和安置均依照上述程序進行。八國聯軍主導的房屋拆遷如此公平、廉潔、透明、利民，會不會令今人羨慕呢？

八國聯軍治下的天津市民

華人樂隊前導，聯軍列隊穿過天津市區

八國聯軍在治理京津地區時的廉潔作風，也與古往今來中國官場的貪汙腐敗形成鮮明對照。聯軍在占領的城市一旦（臨時）當政，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形形色色的腐蝕拉攏很快地包圍上來。天津臨時政府很快嗅到了中國社會的這種腐臭，斷然採取措施，「拒腐蝕，永不沾」。

1900 年 12 月 20 日臨時政府委員會召開第 84 次會議，除了討論發放救濟、處理民教衝突等事項外，還專門「研究了關於當前一些華人向政府部門成員贈送禮物的問題」，並形成決議：「本委員會認爲此舉應當嚴加制止。同時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員都不會接受華人除水果和鮮花以外的任何饋贈」。臨時政府成員不僅自己分文不取、兩袖清風，而且努力保持政府僱員的廉潔。天津「暫行管理城廂內外地方事務」的西人長官發布了管理地方告示，曉諭民眾「本衙門並四司員衙門西國官員，並文案翻譯，及各項差役，均不准收納民人禮物，如違查出懲辦。該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饋

贈」[449]。政府官員、衙門差役不許接受民眾的禮物，違者懲辦，對國人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而且實踐證明，洋人立的規矩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八國聯軍的清廉作風也表現在軍需採購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的軍需採辦是肥得流油的差使，非領兵官的親信莫屬。八國聯軍由於長期駐紮，需要在當地購買大量物品，從糧食蔬菜、肉類水果、草料豆麩、煤炭木柴、磚瓦木料到布匹綢緞，品種繁多。使華人供應商驚異不止的是，聯軍的軍需官不收（在中國人眼裡是天經地義的）回扣。齊如山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德軍「糧臺總辦」（總軍需官）梅星先生向他購買木柴，成交之後，齊按照慣例、行規，要給梅星回扣，被對方斷然拒絕。梅星對齊說：「你用不著謝我……你若以爲我有意要錢，那就大錯了。別的國知不清，德國的公務員沒有要錢的」。齊如山不勝感慨：「沒想到這個糧臺總辦，眞是一清如水，一文錢的弊病也沒有，待商人還是很厚道，我也絕對不特別多要錢。我沒有應酬過他，他例常開兩瓶啤酒，我們喝著談天。」[450]（讀者不要以爲聯軍軍需官的廉潔與否和中國無關；八國聯軍的軍費，部分出自庚子賠款。）

八國聯軍隊伍行進在天津街頭

1902 年 10 月 1 日英軍將京榆鐵路移交給清政府的儀式

對一些爲八國聯軍服務的華人狐假虎威、非法牟利的行爲，天津臨時政府及時進行了調查和懲處。1900 年 9 月 28 日，都統衙門獲悉，有華

人翻譯趁隨軍演習或出征之機，在勝芳鎮非法獲銀 1 萬兩，之後存入天津匯豐銀行。都統衙門下令匯豐銀行凍結此款，等待調查結果。緊接著，英軍總司令部參謀部翻譯、福音堂的教士斯利蒙（Slimon）向都統衙門寫信舉報，有華人謝某和梁某在一些村莊以向村民提供保護爲名，騙取金錢。10 月 13 日，都統衙門責成巡捕局長下令拘捕並審訊這兩名被告。同年 11 月 16 日，在都統衙門任職的俄軍上校沃羅諾沃報告說，發現一名孫姓華人翻譯在一個叫宜興埠的村莊向中國人勒索錢財，要求都統衙門逮捕此人。都統衙門遂將此案移交巡捕局辦理。

對查有實據、情節嚴重的假借聯軍名義的詐騙、搶掠罪行，都統衙門嚴厲懲處。下面是該衙門的一例判決：「寶倭青都統以張得立、吳貴廷、張恩榮三人，向在津郡爲匪，曾假冒洋兵，並本衙門委員，迭向民間勒索銀錢，並搶劫財物。故於緝獲審明後，即於九月二十三日十一點鐘，在東門附近地方行刑」（執行死刑）[451]。

都統衙門於 1900 年 12 月 28 日的會議上決定發布告諭：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發，以便嚴懲。這篇告諭在 1901 年 1 月 1 日元旦張貼到天津的大街小巷：

>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現聞有人假充本衙門之人或充練軍勒索錢財，准該民人等前來本衙門指名稟控，派兵查拿嚴辦。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特示。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北京，八國聯軍的「北京行政委員會」對假借聯軍名義的勒索、詐騙和仗勢欺人行爲也決不寬貸。被民眾「指名稟控」而遭「查拿嚴辦」的一個典型，是賽金花的僕人劉海三。他憑著兩句支離破碎的德語，招搖撞騙，爲非作歹。劉海三被捕之後，賽金花四處求情。齊如山受賽的請托

去找新任北京「知府」（即德軍管轄區長官）科德斯，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科德斯不無責備地說：「他毀害你們中國人啦」；言外之意是你怎麼爲這種傷害自己同胞的敗類求情。賽金花和她所托之人向德軍當局求情時，不敢使用中國傳統的手段——賄賂，因爲他們知道在洋人那兒，這一套行不通。最後，劉海三被德軍當局槍決[452]。

外國傳教士醫生治療眼疾

傳教士武成獻與他創建的共合醫道學堂畢業生合影

大規模、慘烈的對基督教的宗教迫害是庚子戰爭的導火線之一；戰後，自然會有民教衝突的餘波。臨時政府處理此類衝突，並不偏袒基督教會和外國傳教士，而是一秉大公。僅以王家溝事件爲例。

1900 年 11 月 20 日，王家溝的士紳向天津都統衙門投訴，「指控有兩名華人基督徒聲稱受臨時政府的委派在村裡爲教堂徵集賠償損失費」。臨時政府收到投訴後，「委員會責成漢文祕書通知這些士紳，把被控告的兩名華人基督徒帶到司法部」。兩天後，都統衙門又收到王家溝士紳的書面訴狀，指出那兩名基督徒是根據美以美會（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傳教士的指示到村裡索取賠款的。都統衙門繼續指令將這兩名基督徒帶到司法部接受審訊，以查明美國傳教士的違法行爲（傳教士或教民私自向中國人索賠違反《各國索賠章程》，是非法的）。

隨後，王家溝的鄉紳們通過漢文祕書又提交了一份訴狀，「要求賠償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損失」，並宣稱已經聘請日本人作爲本村的法律代

表。拳匪造成的破壞、損失，該村要求（八國聯軍的）臨時政府賠償，這在當時並非無理要求。實際上在京津兩地，聯軍針對拳匪造成的破壞對民眾都進行了賠償。

王家溝士紳對基督教會的指控，激怒了當地教會中的某些人士。有人帶著不明眞相的聯軍士兵抓捕了當地士紳，民教衝突迅速惡化。都統衙門巡捕局長嚴詞指控「美國傳教士煽動」，並要求對「傳教士的行爲進行約束」。這場衝突的後續情況在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中沒有記載；但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了各國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此事件應該和平、公正了結。

爲政清廉，以法治國，直至今日不還是「中國夢」嗎？

從聯軍手中接收天津的袁世凱

奇觀十：中國官民對聯軍感恩戴德

庚子戰爭中，戰敗方的政府留守官員給外國占領軍敬送錦旗，老百姓給占領軍恭送慶功匾、萬民傘，國家元首給占領軍頒獎授勳。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此種咄咄怪事？

在庚子戰爭的舊照片中，有幾張流傳頗廣，是留守北京的中國官員敲鑼打鼓，送兩面錦旗給八國聯軍的指揮官。一面錦旗上大書「萬國咸喜」，掛在了八國聯軍總部的門口。另一面錦旗上則是「祝效華封」；祝其壽，祝其福，祝其多子，誠爲國人最美好的祝願。有人認爲清廷官員此種舉動是向侵略者獻媚邀寵，是賣國求榮的漢奸行爲。這是憤青式的弱智思考。八國聯軍是侵略者還是人道救援之師，前文已經分析過了。誠然，「拍馬屁」是中國歷久不衰的官場文化；但是給八國聯軍拍馬屁，則是馬屁拍在馬腿上。聯軍是戰爭中的敵軍，占領中國是暫時的，在中國也絕無扶植傀儡政權的打算。清廷官員就是昏了頭，也不會指望給聯軍拍馬屁陞官發財。與敵軍建立親密關係，向占領軍求榮，只會使自己在聯軍撤軍之後禍患臨頭。

中國官員敲鑼打鼓，恭送錦旗給八國聯軍

清廷留守官員如此，平民百姓呢？據時人記述，居民盛服前導，給

八國聯軍送慶功匾、萬民傘的，決非個別地區的個別事例。在天津楊柳青，「洋分司員傅，心地明白，操守清廉，自五月抵楊柳青，彈壓地面，甚屬安謐，村人感之。於十七日公送匾額一方，其文曰：「除莠安良」。司員盛服相迎，款以煙酒茶食，且自謙云：『無好處，不敢當』」。在天津城南，「法司員賈，清廉嚴重，有威可畏，自春徂秋，管理城南段，未嘗稍懈。繙譯姚君智善（翻譯姚智善——引者註），廉明正大，一塵不染。十八日，司員交卸，村人十餘名前往餞行，並送匾額，其文曰：「明鏡高懸」。賈君喜極，指天畫地，作頌禱之狀，爲我村祝，爲我國祝，爲我大皇帝祝。所謂頌揚得體也。及村人轉相稱頌，伊則謙讓未遑。」「八月初三日，漢文司員丁君回國。丁君在中國多年，曾充學堂教習，去歲發給執照，保護我村，村人往餞，並送「惠心有孚」匾額（惠心有孚：以誠信惠益人心——引者註）以酬之。」[453] 送萬民傘、匾額，一般是在官員離任時，民眾借此表達感激之情；以上三例中有兩例皆是。若說這是諂媚，洋官已離任走人（甚至回國），諂媚的意義何在？在京都，「治內城、外城各地爲十一國分劃駐守後，不數月間，凡十一國之公使館、十一國之警察署、十一國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輝煌，皆吾民所貢獻之萬民匾聯衣傘，歌功頌德之詞，洋洋盈耳」[454]。

凡是以不帶偏見的心態讀過本文前兩節（奇觀八、九）的讀者，對中國官民向八國聯軍表達的種種心意，應該不會感到吃驚或誤解。聯軍平息暴亂、中止浩劫、解民倒懸、與民生息，中國官民向聯軍表示感謝，不是人之常情嗎？而且被民眾特別感激的洋官，自有他們的優秀過人之處。

對八國聯軍表示感謝的不僅有民眾官紳，還包括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庚子戰爭結束後，「出使日本大臣」（即駐日公使）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光緒皇帝對他的諭旨：「上年拳匪變亂，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洵屬睦誼可風，深宮甚爲感悅。著蔡鈞轉達

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並著查取兵官武弁職務，迅速電復，以便分劃等第，賞給寶星」（寶星勳章：清廷主要用來褒獎對中國友好、大有幫助的外國人）[455]。慶親王奕劻親自致函日本駐軍指揮官，索取「各將官職務資格，以便分別賞給」。幾經交涉和修改，日本政府最後愼重地確定了一份 199 人的名單，接受清政府的獎賞[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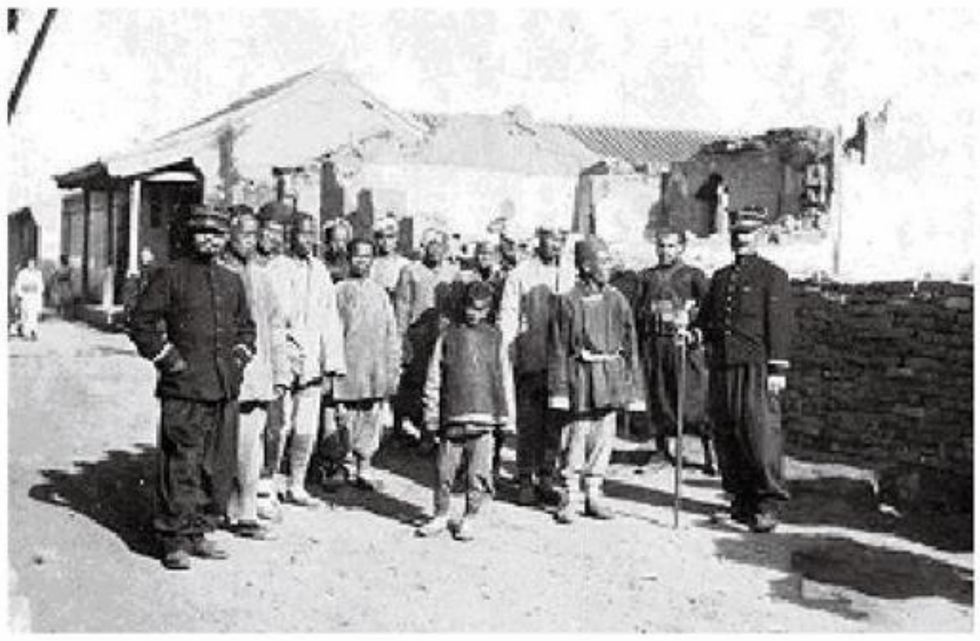
八國聯軍中的日軍

寶星勳章

國內對此事一般評論爲：這是以西太后爲首的清政府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卑躬屈膝，「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種黨八股式的批判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要說對西方列強的私人仇恨，無論是時人還是今人，很少有人能超過慈禧。滿清愛新覺羅皇室在對外戰爭失敗之後，雖然不能不退讓，甚至被迫割地賠款，但從未在強敵面前搖尾乞憐過。敢誅殺持異議的大臣，向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宣戰，說明慈禧不是孬種。而且其時清廷的「天朝上國」的心態尚在。「朝廷柔服遠人」（《宣戰詔書》中語）；因爲日本軍官有功於清廷，故對其頒賞。而且此類賞賜是在戰爭結束、《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清廷並不希冀日本有什麼即刻的回報。何況清廷給日本軍官頒發的僅僅是獎章；「量中華之物力」，從何談起？

無功不受祿，日軍的功勞何在呢？首先，正像光緒帝在上諭中言明的，日軍對皇宮和皇室成員「極力保護」。聯軍入京之後，日軍把守紫禁城的東華門、西華門和神武門，和美軍一起嚴密保護皇宮；「大內」則由

深悉中華傳統的日軍負責照料。聯軍進京時，宮中不少人逃逸，但留下來的仍逾千人。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應，完全由日軍承擔[457]。「聯軍入京後，大內所留咸同（咸豐、同治——引者註）兩朝妃嬪，由日本兵官按日進膳，派敬止齊尚書照料一切。至慶邸到京始止，調護極爲周密。」[458]清皇室對日軍周密的保全是眞心感激的；「深宮甚爲感悅」是大實話。



中國民衆和聯軍軍人合影

進入天津的德軍部隊在民衆圍觀下行進

再者，八國聯軍之中，紀律最嚴明的除美軍之外就是日軍。這是國人的切身感受，也是當時舉世公認的，有關的歷史記載不勝枚舉。「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459]。聯軍進京時，「日帥下令，無論何人，不許在北京擄掠」[460]。「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民傘」[461]。「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國分界，日本最安謐」[462]。「日本分界內，華人最多，而生意亦最旺」[463]。美國公使康格的夫人莎拉（Sarah Conger）在給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爲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裡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464]美國著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記載，聯軍入京之初，北京市民爲表示友好，出行時手上經常會持列強們的國旗，而這些旗子以日本旗爲主。著名史家蔡東藩記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提到：「這北城先經日兵占

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爲一歎」[465]。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評價說：「日本軍隊對於維持秩序、組織供應等等遠比其他各國領先」[466]。歷史學家唐德剛評述說：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軍，軍紀之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要自我表現，力爭上流……一時頗爲他們入侵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467]

日軍嚴明的軍紀當然不僅表現在京都地區。在天津，「自聯軍破津後，各國分段駐兵彈壓。其城東一帶，則歸日本派兵巡查，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居民感之。現聞該軍有遷防之信，故各鋪居民議欲公送匾額，以志不忘。」[468] 聯軍占領山海關，「人口約有三十萬之數，爲北方巨鎮，目下由日本福島將軍總管其地……所有聯軍均駐城外，如非將校，不許濫入郭內。」[469] 在日本將軍主管下，聯軍士兵連進城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聯軍中的日本軍人和中國孩子合影

被北京市民視為「守護神」的柴五郎

即使對中國的戰犯或囚犯，日軍也給予人道待遇。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啟秀是《辛丑條約》認定的「首惡諸臣」之一，被判死刑。在押期間，啟秀母親亡故，日本人「因其丁憂，放出十日穿孝」；滿十日後，再續十日[470]。北京「城內板橋胡同英巡捕局內，所禁犯人多至九十餘名，昨日保釋張某等四人。據云在內時，常有日本某醫生入而診視，並按名發放棉衣米菜等項。」[471] 日本醫生診視囚犯竟然診視到了英巡捕局內，還

常給犯人發放棉衣和食物，不知英軍是否會嫌日本人「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日本占領軍的另一個貢獻是在北京創立了警察系統。爲了維持京城的治安，日軍在北京招募華人，加以訓練，成立了京都有史以來的第一支警察隊伍。對日本人操辦此事的認眞負責和長遠考慮，歷史學者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日本人以爲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約我前去談一談。我到順天府（日本民事機構在此），一位日本軍官對我很客氣，他說想辦一班警察，應募的人很多，現在自然須日本人管理，將來各國撤兵後，自然就由中國人接辦，管理人須知識較高之人，但也須稍知警察法，言外是也得訓練。我聽罷又想，他居然想到撤兵以後的事情，其實他們走後，這些警察果能存在否尙是問題。」[472] 歷史證明，齊先生是多慮了；京都的警察系統由前清一直延續到民國。

日本公使館武官、京都警務衙門首長柴五郎在八國聯軍入京之初，因爲悉心守護紫禁城，確保了皇宮的安全，曾被主持宮中事務的瑜貴妃「遣使致謝」。其後，他主持創立了京都警察系統，有效地維護京城治安，更被北京市民視爲「守護神」。當柴五郎離職回國時，北京民眾夾道流淚送別[473]。這與北京一萬三千市民聯署請願書，請求美軍留守，不是相映生輝嗎？

清人洪壽山在《時事志略》中撰寫了「感德報恩」，調寄〈西江月〉：

日本英美三國，待民恩德深重，萬民衣傘匾花紅，小民報答恩情。

英美所管之處，亦與日本相同，其餘各國不相同，街市消條清淨。[474]

奇觀十一：爲聯軍竭誠效力的帶路黨

庚子戰爭中，各地由華人組成的「帶路黨」爲八國聯軍竭誠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戰爭史上蔚爲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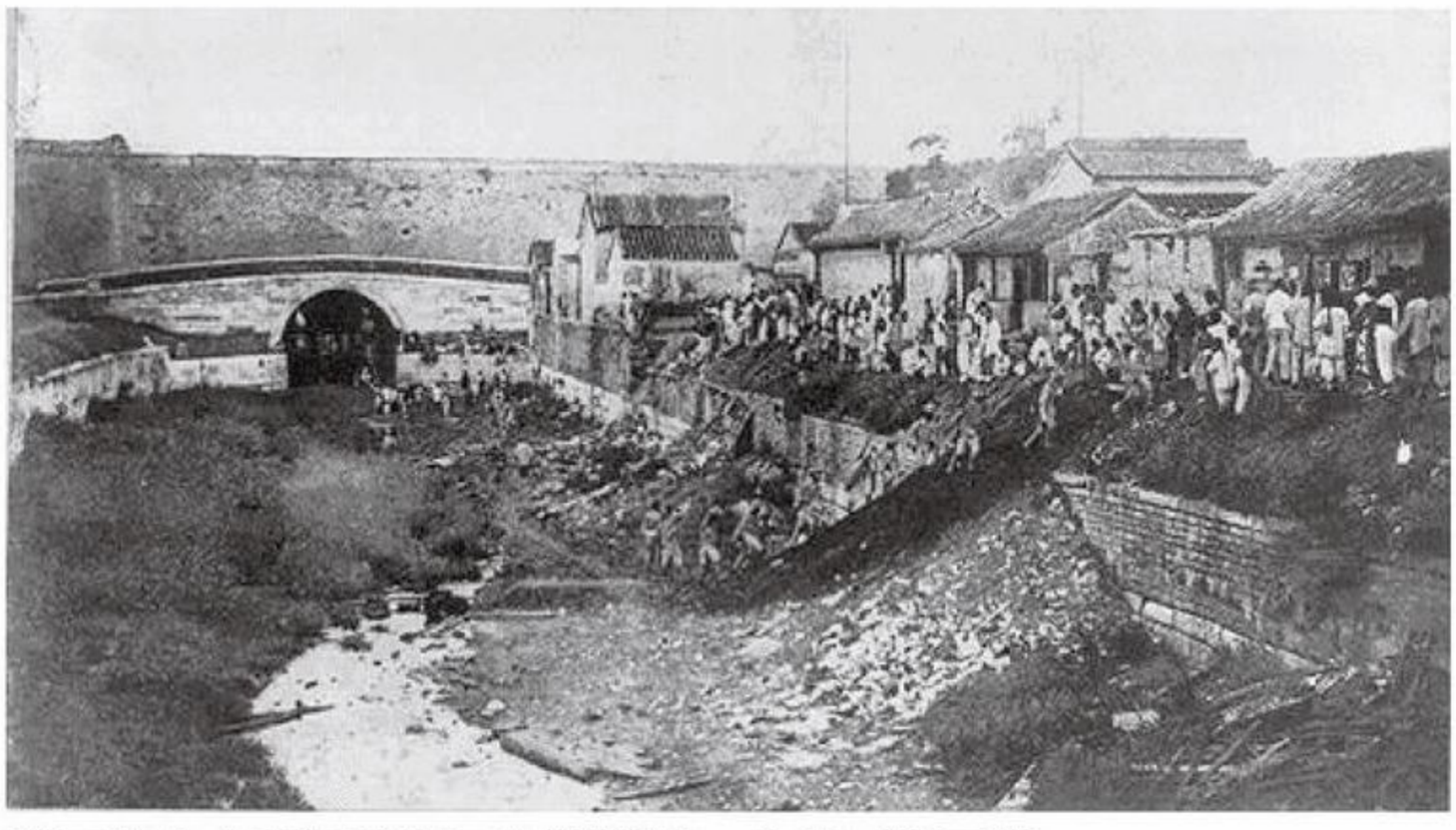
中國《百度百科》中的「帶路黨」條目，斥責帶路黨是「敵人打進來時的當奸細『帶路』的人」。但是它不得不承認：「該詞揆諸歷史，在八國聯軍與滿清政府開戰時，已有不少中國民眾充當前驅，充當八國聯軍的帶路黨」。這些「不少中國民眾」爲八國聯軍導向帶路，收集情報，傳遞書信，獻計獻策，助聯軍攻城，爲聯軍「公關」（聯絡和民眾的感情），輔軍需運輸，助聯軍給養，直至爲聯軍出生入死，捨命效力。

法軍架梯攀城牆，牆頭、牆下均有中國百姓在協助

「帶路黨」中，自然不乏飽受殘害殺戮、視聯軍爲救星的中國基督徒。聯軍攻打天津時，華人基督徒裡應外合，爲王前驅。「十七日（西曆 7 月 13 日——引者註）令教民溷入，四鼓登城，是時城上無兵，乃自上遞聲，有教民數十皆洋裝，聞聲緣牆而上，即於城上遍插洋旗，亂施槍砲，大呼洋兵來入。居民由夢中驚醒，倉惶出奔，城中大亂，眞洋人入城

者，惟八九人耳。日出時，教民進南門，洋人大隊始進入。」[475]

曾任聯軍的隨軍牧師和情報官的寶復禮在回憶錄中說：「一個時期，當租界（指天津租界——引者註）陷於危險絕望的關頭，由於射來的炮彈用的是無煙火藥，因此找不到炮位。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老的中國傳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兒子，自告奮勇去城裡偵察大炮的位置，然後回來報告。另外兩個人，通過義和團防線到大沽去把我們的急迫要求報告給海軍司令們。一個被捉著投入了海河，另一個也再沒有回來。五十個改信基督教的人們，爲英國十二磅海軍大炮運送炮彈，他們把大炮從一個炮位拖到另一個更有利的炮位，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炮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槍彈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像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諜報部負責爲每天的行軍準備一張以一英里等於一英吋爲比例的地圖。圖上畫著每個村莊和道路，還加上很多偵察員所能得到的情報，如大炮的位置，敵人的戰壕，實際上，這地圖對指揮官來說就如一張航海圖對一個船長一樣的重要了。除地圖之外，還要寫一份對明天行軍的說明，說明敵人的大約人數和位置，和道路的情況。每位指揮官都有了一份地圖和說明之後，部隊才準備出發。在我們出發之前，兩個教徒學生就已作爲偵察員活動了五天了。……這類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像那樣得到的情報則除了借助這些中國基督徒偵察員的幫助之外，是無法得到的。」[476]



聯軍從北京廣渠門的下水道進城，大批百姓圍觀

中國基督徒對八國聯軍人道救援的鼎力支持、對危難之中外國傳教士的捨命相助，成就了何等的功績，從一位美國牧師康格寫給中國教民熱情洋溢的感謝信中可見端倪：「對於那些被困的美國傳教士來說，你們如天使降臨，將他們從即將發生的大屠殺中解救出來。……我向你們表達我心中誠摯的謝意。這是我們外交使團所有人的共同心願。我們難以表達我們內心那誠摯的感激之情。對於你們提供的幫助，以及那些當地基督教信徒們所提供的幫助，這些幫助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我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倘若沒有你們精心而又周密的計劃，以及中國人那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我想我們是不可能這麼成功地被解救出來。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你們那周全的考慮，以及耐心的支持，讓我感動至深。對此，我向你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希望，當然我也相信在上帝那裡，你們的付出，以及你們所遭受的苦難都將結出豐碩的果實，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幸福成果。因爲像你們一樣獻身於如此崇高的事業和生活中，上帝是不會忘記你們的。」[477]

除華人基督徒外，帶路黨人亦有大量普通民眾。民眾被義和團、官軍荼毒、禍害，往往向外國聯軍伸冤求助。不僅如此，他們在聯軍的軍事行動中還主動協助聯軍。

中國民眾幫助八國聯軍裝卸重型武器

晚清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筆記（《汪穰卿筆記選》）中記載過兩個事例。守衛通州的清軍在當地姦淫擄掠，爲居民深恨。在外國聯軍兵臨城下之際，居民紛紛跑去向聯軍投訴；聯軍將清兵圍而殲之。另一事例是在八國聯軍進京後，一些拳匪餘孽藏匿在翠微山的兩座寺廟中。他們以土匪綁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個韓姓居民「勒出萬金」。韓某請求減少贖金，拳匪不允，將其殺害。韓妻知道向地方官控告無用，直接進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動，包圍寺廟，清除拳匪，爲民除害。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戰爭之初，義和團在大沽附近的村莊活動頻繁。聯軍想找人探聽他們的虛實，苦於一時找不到。一個少年人自告奮勇，願意領命前往。聯軍指揮官派了幾個士兵護送他去。接近目的地時，少年對護送他的士兵說，你們這樣送一個人去探聽敵情是不行的，並教他們應該怎麼做。聯軍士兵接受了建議，對該少年鼓噪追趕，拳打腳踢。少年氣喘吁吁，狂奔不已，最後「擺脫」了士兵的追逐，坐在一棵樹下，邊哭邊罵洋鬼子。拳民經過，聽到少年的哭訴，引爲同類。憑著苦肉計，少年混入拳匪隊伍，盡探拳匪巢穴虛實。偵察任務完成後，少年乘外出活動之機，假裝被洋人捕獲。根據少年提供的情報，聯軍將當地拳匪一舉肅清，爲民除害。聯軍對少年十分感激，贈他金子，少年不受而去。

華人民工用小車為八國聯軍運送武器彈藥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還記述了另一位天津少年的事跡。在北京的外國使館被圍攻期間，一日，在激烈的攻防戰中，突然有一個華人少年手中揮舞白巾，站立在洋兵之中。這是什麼人呢？原來他是八國聯軍從天津派來的信使，攜帶密信給北京的外國公使。之後，少年帶著公使們的覆信返回天津。半個月後，他再次冒著千難萬險，攜帶聯軍的密信潛入北京，送達使館。公使們這才知道，外國聯軍已在進京的途中；楊村之戰大捷，獲救指日可待。公使對該少年感激莫名，贈其千金，少年「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問其何爲爲此，則云，其母嘗言，欲救中國無亡，必救公使不死。」少年捨生忘死，原來既爲救公使，更爲救中國；只有公使不被屠戮，中國才能被列國原諒。

英人普特南・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記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一個攜帶北京公使的密信去天津，再帶回聯軍覆信的北京人的事跡。此人「往返八十英里之長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執，性命皆在呼吸之間。沿路均拳匪，各村中均懸紅布記號，並貼拳匪之告示。每次被執，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於夜間設計逃走，不得食物，則偷竊食之。」信使抵達天津後，將公使們的密碼信件交給聯軍，「得有覆書，又歷盡艱難，始得歸至此地」。使館人員不僅欽佩他的勇氣、智慧，更爲他的淡定氣概所折服：「此年輕之中國人，甚爲瘦弱，當其公事已畢，坐而搖扇，淡定若無事之狀，殊覺可異。」

實際上，在使館被圍困攻打期間，第一個擔當信使、冒死去天津給八國聯軍送信的是一個北京少年，「年方十六，並非教民，因素喜西人，爲其承雇者所棄」。6 月 13 日義和團在京城大肆屠殺教民，兩個外國傳教士外出尋訪教民，將他們帶到使館避難；路上碰到該少年，少年於是隨傳教士去了使館。之後，使館被清軍圍困攻打，長期與外界音訊斷絕。公使們徵召信使，去天津與聯軍聯繫；該少年「即應召而行，至七月二十六

號回京，帶有天津回信。此信乃被圍後首次至京者」[478]，價值何止萬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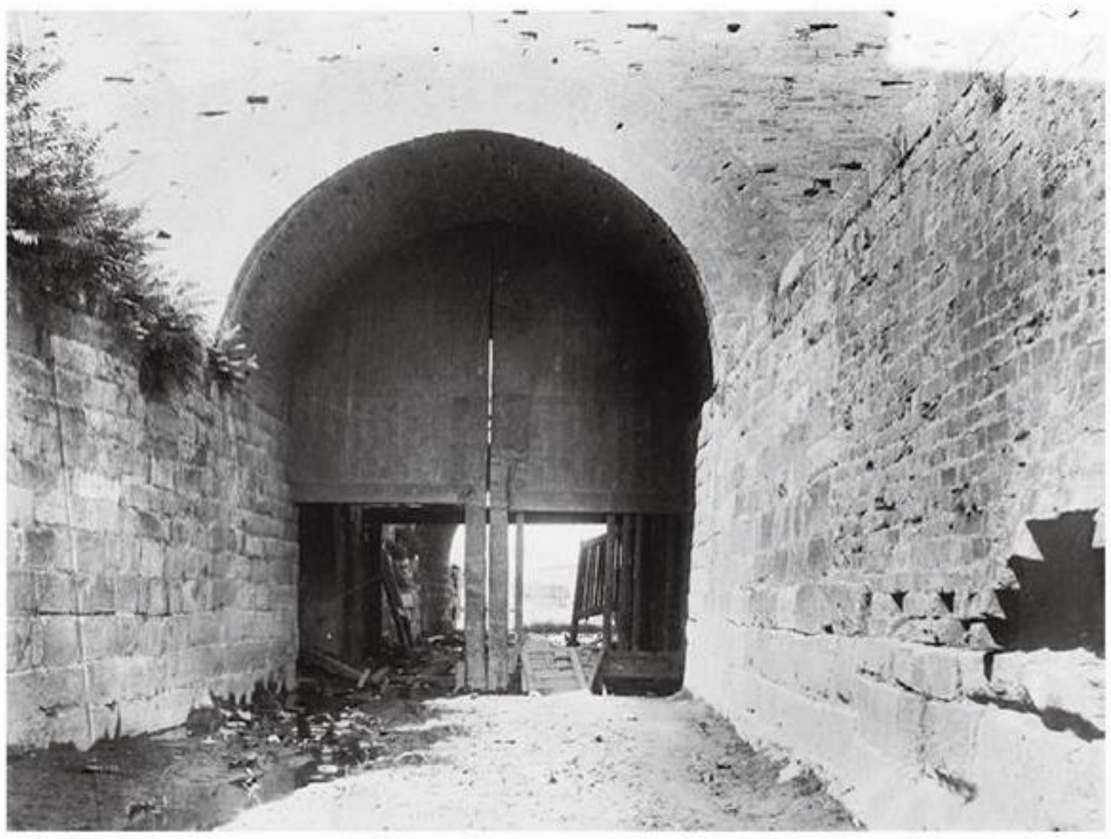
中國百姓在幫助八國聯軍過河

據史料記載，另有一個華人也成功地突破封鎖，完成了爲聯軍傳遞情報的任務。他從被重重圍困的北京公使館突圍出來，到達天津時，聯軍剛剛攻占該城。他向聯軍報告了北京使館的情況，同時交給英軍司令官蓋里斯一把進入北京內城的「金鑰匙」。在北京使館區旁邊、崇文門西邊城牆下面護城河的水面之下，有一個祕密的水門。通過這個水門，即可進入內城，到達聯軍最終的目的地——東交民巷使館區。這個華人基督徒交給蓋里斯的金鑰匙就是一張準確標示那個祕密水門的圖紙。8 月 14 日蓋里斯率領英軍在進入北京外城、占領天壇後，帶領官兵下水，按圖索驥，很快摸到了護城河中的祕密水門，砸開鐵柵欄，進入北京內城，一舉衝進了英國公使館。英軍第一個擁抱了掙扎在斷垣殘壁之中、望眼欲穿地等待救援的各國公使、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在八國聯軍人道救援的比賽中，英軍榮獲第一名（儘管英軍在北京攻城戰中出動最晚，傷亡也最輕）[479]。

對帶路黨，清廷早有察覺，多次爲此發出諭旨。如庚子年 6 月 16 日清廷曉諭直隸總督裕祿：「聞直隸秦王島北塘一帶漁船，多有接濟洋人情事，即著裕祿迅速派員，嚴密稽查籠絡各漁船，團爲一氣，爲我效用，斷其接濟。」但是「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即使在首善之地京都，

亦「多有接濟洋人情事」。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攻城之始，攀登城牆沒有梯子，北京市民從家中搬來梯子給聯軍使用，並熱情地爲其扶梯。更多市民則是作壁上觀，看熱鬧。

北京市民架梯子幫助八國聯軍翻越城牆



帶路黨告知聯軍進入北京內城的祕密水門

無論在城鎮還是鄉村，帶路黨無處不在。聯軍在征戰途中，沿途的農民不斷向聯軍提供中國官軍部署的情報。俄國戰地記者記述道：「（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裡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480] 這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情景嗎？諷刺的是，「王師」竟然是攻入國門的外國軍隊。

庚子戰爭中，爲八國聯軍充當前驅的中國人如此之多，對聯軍的幫助、貢獻如此之大，難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個標誌嗎？給西方各國政府上書獻策、呼籲八國聯軍推翻清政府的「國父」孫中山，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帶路黨人？

奇觀十二：英勇作戰、屢建功勳的華勇營

庚子戰爭中，英勇作戰、屢建功勳的華人軍人不在中國軍隊，而在外國聯軍之中。這不也令人嘖嘖稱奇，感慨萬千。

中國軍隊在庚子戰爭中軍無戰心，士無鬥志。與聯軍接戰，往往一觸即潰，甚至望風披靡。前文曾提及，裝備精良的武衛後軍（即甘軍）和武衛中軍重兵攻擊只有 400 餘名軍人防守的外國使館，歷時兩月，損耗巨大（僅僅甘軍就「死四統領，亡士卒過千；用砲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萬顆」），而以澈底失敗告終。這種失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如此可笑荒唐，爲遮羞避丑，中國史學界對失敗的原因至今仍爭論不休。數萬義和拳民和清軍圍攻只有 43 名外國軍人防守的北京西什庫教堂，歷時兩月，同樣遭到失敗。清軍及義和團無法攻破防禦遠較外國使館薄弱的西什庫教堂，反過來證明了，清軍進攻外國使館的失敗是必然的，並非因爲國人一個遮羞的說法：清軍手下留情。1 萬 8 千人的外國聯軍（1900 年）8 月 4 日離開天津向北京進發，一路勢如破竹。「聯軍由津犯京，所到之處，清軍皆潰散」[481]，10 天之後聯軍即攻占北京。歷經北倉、楊村、蔡村之戰和北京攻城戰，聯軍陣亡只有區區百餘人。

堅守英國公使館，等待救援

聯軍在大沽口登陸，馳援津、京

庚子戰爭中，中國的首都保衛戰更像是一場笑話。外國聯軍 8 月 13 日兵臨城下，14 日開始攻城，15 日即全面占領北京。「除了從天津方向撤退下來的部隊，防守北京的清軍還有神機營、虎神營、甘軍、步兵統領所屬部隊，總數大約有 10 萬人。」「8 月 13 日，慈禧太后也在緊急布置京城防禦措施。太后召幫辦北洋事務大臣、四川提督宋慶入京，中午前後召見。宋慶稱：『洋兵四路包抄而來，彼眾我寡，不遑迎接……』」[482] 宋慶是武衛左軍統帥，參加了天津戰役，是北倉的敗軍之將。他瞭解八國聯軍的兵力。10 萬清軍面對 1 萬 8 千外國聯軍，宋慶在皇太后面前竟然大呼「彼眾我寡」。如此的眾寡概念，恐怕只會出自中國將軍的頭腦。8 月 14 日「黎明城破……禁軍皆潰」[483]。至於「前所謂義和團者，早已鼠竄獸散矣。」[484]

清軍防守北京，其出類拔萃者恐怕要算向聯軍發射了 30 餘發炮彈的兵部尚書（國防部長）敬信。8 月 14 日「下午 6 時左右，清軍設在宣武門上的大炮忽然猛烈開火，向東南方向發射 30 餘發炮彈，轟擊天壇等處的聯軍。指揮開炮的是兵部尚書、正紅旗都統敬信。有人勸他趕緊撤離城樓，他回答說：『我職守攸關，未發一炮而走，不可以。』」[485] 作爲國防部長，一砲不發就放棄抵抗，棄守京城，實在說不過去；於是「向東南方向發射 30 餘發炮彈」，算是盡職盡責矣。敬尚書的守城行爲在清軍中想必是鳳毛麟角，竟然博得了聯軍的讚賞：「敬信此舉令聯軍將領欽佩不已，他後來也沒有遭遇惡意對待。」[486]「令聯軍將領欽佩不已」是當代華人作家對敬信的溢美之詞。敬信略盡軍人職守而未抱頭鼠竄，倒是被聯軍另眼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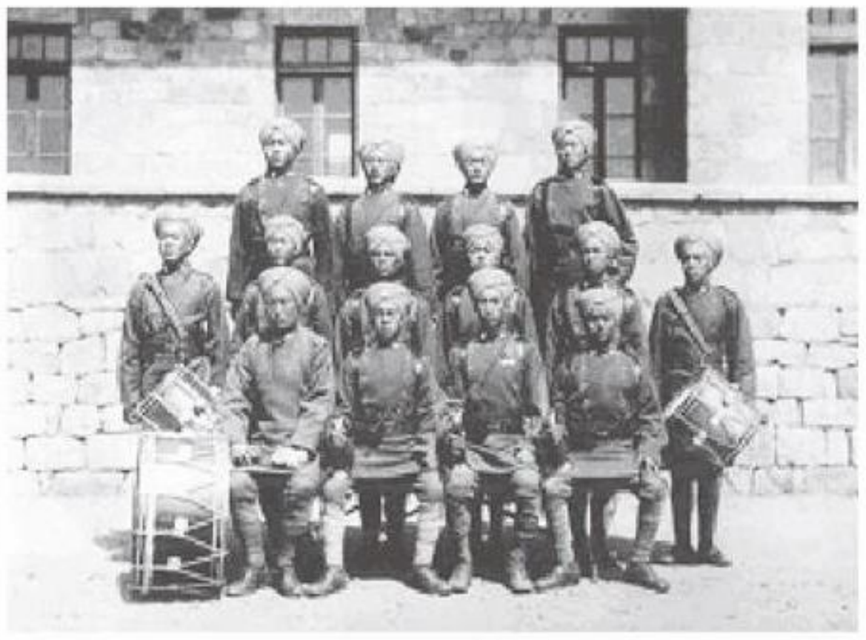
庚子戰爭中，眞正英勇無畏、戰功卓著的華人軍人是在八國聯軍之中。

八國聯軍中有由華人組成的團隊。英軍的華人團隊編制爲「第一中

國軍團」（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國人稱之爲「華勇營」。德軍中有「華勇連」（實際上，華人組成的團隊還有香港軍團和新加坡軍團）。因此有人調侃說：八國聯軍實爲九國聯軍。史料記載，這些華人團隊「表現優異」、「勇敢善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在庚子戰爭中戰功卓著，獲得英國國王授勳，在西方軍史界赫赫有名。

華勇營是 1899 年英國在山東省威海衛租借地組建的，編製爲 1000 人，任務是負責租借地的防務與治安。軍官由英國現役軍官擔任，士官由英人和華人共同組成。士兵則均爲華人，主要是從農村青年中招募的，以山東人爲主，也有少部分來自中國軍隊[487]。經過遴選而入伍的士兵，年齡在 19 到 24 歲之間，平均身高 1.76 米[488]。他們是「積極的、友好的、可以訓練好的年輕人，並且心地善良、英勇無畏」[489]。另外，軍中還有從香港、上海等地招募來的中英文翻譯人員，配備在各個連隊。華勇營建制齊全，裝備精良，有步兵連、騎兵連、長槍連、機槍連以及炮隊；另有中國軍隊不曾擁有的軍樂隊、醫療隊[490]。

華勇營士兵



華勇營的軍樂隊

華勇營的軍餉高，待遇好。士兵每月餉銀 8 銀元，小隊長 12 銀元（10 年後威海衛巡捕的收入也不過每月 10 元）。無違規記錄或表現優異者，另有獎勵。服役滿 3 年還有重賞。至於中國軍隊中普遍存在的長官剋扣士兵軍餉、「喝兵血」，在英軍中是不可思議之事。飲食方面，對於華

裔士兵而言等於天天過年：大米、麵粉、肉類等食物全天充足供應。士兵衣著體面，每個人都有多套軍裝。華裔官兵著裝時頭上裹著頭巾（好像印度的錫克人），因爲他們要把當時中國人頭上留的大辮子裹藏起來[491]。英國還爲華勇營修建了舒適的軍營，當時有評論說：「這些兵營太豪華了，比那些足夠好的倫敦和其他地方的大部隊營房還要豪華很多」[492]。

華勇營的英國軍官高度重視訓練，在軍事訓練中嚴格要求，克盡職守。他們「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並像在英國訓練軍士一樣對他們進行一對一的教導，不管在訓練場還是在軍營地，他們無時無刻不保持著與士兵的交流和溝通」[493]。「士兵們每天訓練達四、五個小時，軍事素質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碼射擊成績十分優秀。所以帶兵軍官對他們讚不絕口：『他們非常遵守紀律，而且十分自律；他們非常強壯，而且十分堅忍；而且，他們個個都是射擊高手，幾乎環環擊中』」[494]。

華勇營的士兵在進行軍事訓練

華勇營舒適的營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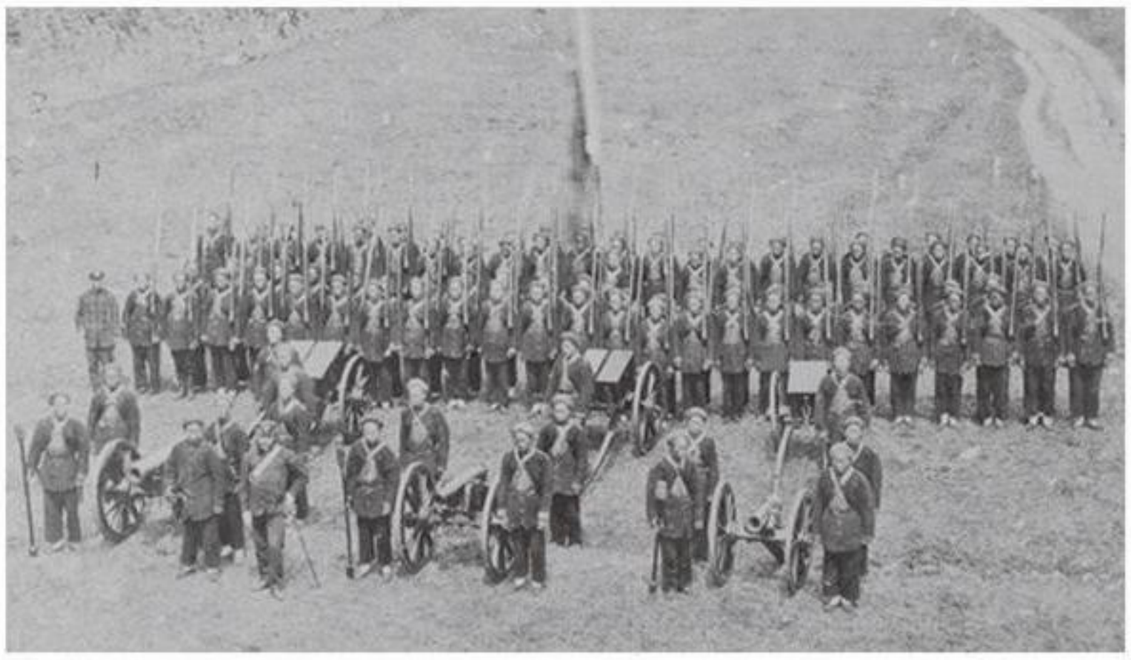
華勇營的英國軍官採取種種方法豐富士兵的休閒生活，娛悅士兵的身心。營地裡養了一些獵犬，在冬季每週有兩天時間士兵可攜帶獵犬外出打獵。從深秋到次年初春，田野裡無莊稼，士兵們可在田野上放馬奔馳，而此時打野兔則是他們的一大樂趣。營地中還修建了足球場和馬球場，以球類比賽娛悅士兵們。在夏秋季節，英國的遠東艦隊會到威海衛避暑，也有歐洲遊客到劉公島旅遊觀光，島上會熱鬧起來。華勇營有時會進行隊列

演練，供歐洲遊客觀賞，每次都得到遊客的讚譽[495]。

由於華勇們各方面表現出色，不論是駐華公使、威海衛行政公署官員還是華勇營各級軍官，都對他們讚譽有加[496]。這種讚譽並非表面文章，而是情眞意切的。一位英國軍官甚至在給家人的信中訴說：「華勇營的士兵非常出色，他們在訓練和行軍中能輕鬆戰勝英國軍隊」[497]。

華勇營的軍人待遇優厚，訓練刻苦，管理嚴格，獎罰分明，官兵融洽，身心愉悅。建軍之後，迅速成爲一支勁旅。「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最優秀的士兵，失去他們是大英帝國的損失」[498]。

庚子戰爭爆發後，人道救援迫在眉睫。駐紮在威海衛的華勇營有地利之便，戰爭爆發的第二天，6 月 21 日，首批華勇營 200 名官兵即乘坐英國軍艦趕赴天津大沽口。連同後續部隊，華勇營共有 363 名中國士官和士兵，14 名英國軍官，8 名英國士官，共計 385 名軍人參戰[499]。就是這 385 人，立下了赫赫戰功。



華勇營的機槍連和炮隊

華勇營的英國軍官

6 月 24 日中午，華勇營和香港軍團各兩個連隊運送海軍提供的 12 吋口徑大炮及彈藥增援前線。道路泥濘不堪，主要由華勇營士兵拖曳大炮，將大炮按計劃安放在濠牆（mudwall）上。25 日，華勇營冒著槍林彈雨，穿過清軍的封鎖線到達天津紫竹林租界增援，受到了守軍的熱烈歡迎[500]。

華勇營參加的第一場戰鬥，是攻打天津機器局東局，俗稱「東局

子」。天津機器局是清政府在華北最大的兵工廠，而且東局子地處要津，是大沽去天津的必經之路，又是砲轟天津租界的有利地點。聯軍決定偷襲東局子，由俄軍打頭陣。進攻開始，遭到了中國守軍的猛烈還擊。華勇營奉命前去增援，在路上遇到清軍的增援部隊和義和團團眾，於是戰鬥爆發。「我們絲毫沒有理會頭頂上呼嘯而過的子彈，排槍射擊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運的是，敵方持有許多種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旗幟，這有助於我方準確的選取射擊目標。這些士兵們表現得完全像一個老兵，……而且他們的群射技術非常好，槍槍命中目標，冷靜得如同在打靶場練習射擊時一樣。」[501] 華勇營的參戰，保護了俄軍的左翼。隨著聯軍後續部隊的到達，戰況迅速扭轉，清軍敗走，聯軍占領東局子，打開了天津的門戶。

7 月初，華勇營和香港軍團擔負清剿天津租界附近的清軍狙擊手的任務。在一次戰鬥中，香港軍團受到清軍炮火的猛烈壓制，華勇營緊急增援後扭轉了戰局[502]。

7 月 3 日，聯軍進攻京、津、沽的交通樞紐——天津老龍頭火車站。這是庚子戰爭中交戰時間最長、最爲激烈的一場戰鬥，雙方最後在火車車廂裡展開肉搏[503]。華勇營的士兵在這場肉搏戰中證明了自己的忠實可靠、英勇無畏，爲聯軍的勝利做出貢獻。

7 月 6 日，清軍大炮不斷轟擊天津的外國領事館。由於清軍大砲隱蔽得很好，聯軍派出一隊偵察兵去尋找清軍的炮兵陣地。「華勇營副總指揮布魯斯少校帶領的華勇營士兵，在英國軍艦巴福魯號火力掩護下，兩次奉命進入一個村莊，不巧，敵人隱蔽良好，他們持續猛烈地射擊——布魯斯少校腹部被劃開一個大口子，極其勇敢的艾斯達爾准尉也受重傷。」華勇營士兵冒著清軍猛烈的炮火，奮不顧身地用擔架抬回身受重傷、奄奄一息的長官[504]。

華勇營的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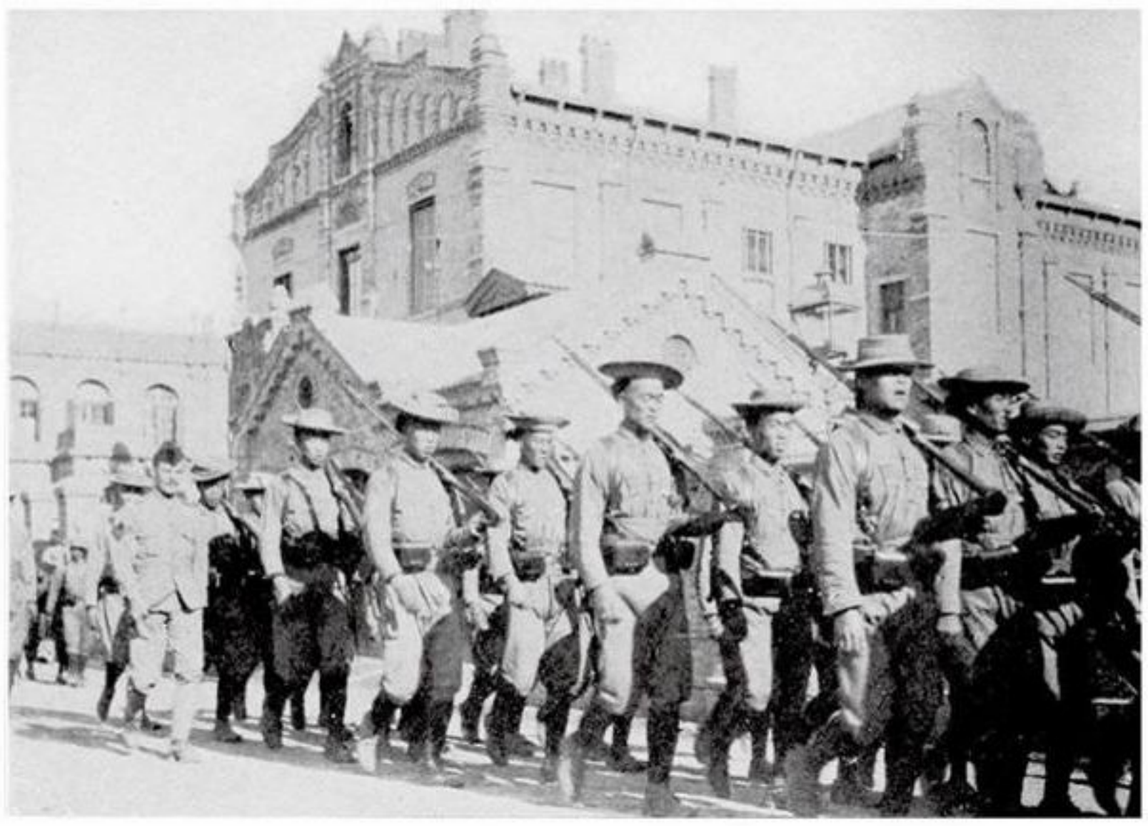
華勇營在運送武器彈藥

7月9日，聯軍發起了一次大規模攻擊（是役直隸提督聶士成中彈身亡）。華勇營的任務先是護衛和協同香港炮兵，向天津機器局西局的軍火庫（海光寺軍火庫）發起炮擊。在他們炮火的掩護下，日軍迅速占領了西機器局。轉移陣地時，華勇營必須拖曳笨重的大炮穿過被清軍火力覆蓋的一座小橋。一不小心，大炮就會滑落橋下。在橋上小心翼翼拖拽大炮、緩慢移動的華勇營軍人受到清軍猛烈的射擊。駐守在濠牆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則進行還擊，用火力掩護華勇營。過河之後，酷暑和體力透支拖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華勇們繼續拖曳大炮向預定陣地集結。事後，英軍司令對華勇營給予了高度評價[505]。

華勇營的巴恩斯（Arthur Barnes）中尉在他的日記中記述了天津戰役的一個片斷。美國步兵在戰鬥中有多人負傷，迫切需要擔架救助以及醫護人員的治療。皮埃爾少校率領華勇營第一連和第七連的官兵，冒著生命危險去支援美軍。陣地上的美軍軍官發現華勇營的增援部隊時，立刻站起身來，焦急地揮手示意，讓他們先退回去，因爲那裡正是炮火最密集的地方。但是華勇營的軍人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抵達陣地之後，華勇營士兵冒著猛烈的炮火，搶救傷員，用擔架將受傷者抬下去。其間，幾名華勇中彈犧牲了。皮埃爾少校發現美軍的彈藥將告罄，急需補充，於是歐理藩上尉率領第六連的士兵奉命運送彈藥到前線。途中歐理藩上尉中彈犧牲，馱

著武器彈藥的騾子也被打死了。華勇們不畏艱險，冒死前行，完成了運送彈藥到前線的任務。這場戰鬥中華勇們奮不顧身，英勇作戰，牽制住大量清軍，確保了聯軍右翼的安全，爲最後勝利立下汗馬功勞[506]。

在天津的攻城戰中，華勇營軍人再顯勇士本色。英勇無畏的一個傑出代表是士官紀殿魁。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面對「身邊呼嘯的子彈，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得他在冒著極大的危險」[507]。「他在沒有任何歐洲軍隊協助的情況下，獨自帶領半連人馬攻入天津城」[508]。後來紀殿魁在通州的戰鬥中犧牲[509]。在 1903 年的授勳儀式上，英國人對他的評價是「他將會永垂不朽」[510]。



華勇營在攻占天津數小時後行進在天津街道上

華勇營的鼓手

華勇營在天津戰役中戰功卓著，而且是第一支攻入天津城的聯軍部隊，因此獲得一項殊榮：英國陸軍部爲他們專門設計了只有英國精銳陸戰部隊才能佩戴的特殊軍徽。該軍徽的主體是天津城門樓，拱門上方是用漢字書寫的「天津」，在城門下方是英文的天津，黃銅的金屬飄帶上則鐫刻著「1st Chinese Regiment」（第一中國軍團）。這個軍徽不僅被用作華勇營的帽徽和領章，而且還鑲在紐扣上、印在信箋、茶具以及明信片上[511]。這種陸軍的最高榮譽是當時英國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租借地的軍隊從未獲得過的。

英國陸軍部為華勇營專門設計的軍徽

華勇營第四連連長巴恩斯中尉

8 月 5 日，華勇營和香港炮兵協同日軍進行了北塘戰役，迅速取得勝利。如此一路乘勝前進，8 月 15 日晨，華勇營開進了北京正陽門（俗稱前門）[512]，與友軍一起，解除了長達兩個月的使館之圍，贏得了人道救援的關鍵勝利。

除了衝鋒陷陣之外，華勇營還肩負著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運送重型武器和彈藥。在八國聯軍進軍北京的途中，巴恩斯中尉帶領華勇營 100 名士兵運送重型機槍和各國的大炮。由於道路情況惡劣，這些重武器基本上是靠人力運送的。在泥濘的田野拖拽大炮這項最爲艱巨的工作，主要由華勇營承擔。他們的勤勉和忍耐力，受到了華北英軍司令部的表彰[513]。希爾上尉曾帶領華勇營第五連的 30 名士兵，護衛一個滿載彈藥的獨輪車隊。希爾事後在報告中寫道：「無論道路多麼崎嶇，天氣多麼炎熱，他們排著整齊的隊列筆直地向前走，遠遠地超過了其他運輸隊，似乎他們從來不需要休息一樣」。這一幕給其他國家的部隊留下了深刻印象。聯軍總指揮、德國海軍上將蓋斯里爲中國軍團的出色表現特別頒布了一道嘉獎令。

庚子戰爭中，華勇營的士兵還利用他們華人的身分，爲聯軍作出了特殊的貢獻。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發，需要攜帶大量的輜重。「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華勇們爲輜重運輸問題和當地百姓打交道時，禮敬有

加，贏得了民心。沿著北河，華勇們在短短幾天內徵集（僱用）到上百艘大船和相應數量的船工，解決了輜重運輸的大難題，得到了聯軍指揮部的讚揚[514]。

華勇營徵集的帆船隊載著聯軍的後勤供應物資經運河向北京進發

庚子戰爭的戰火熄滅之後，中國軍團按照聯軍的統一部署，分別進駐京畿的幾處軍事要地。在清除匪患、維護治安、城鎮鄉村的恢復重建中，華勇營發揮了它特有的優勢。因爲華勇和百姓同文同種，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在北京，他們被分派守衛城門；在北京近郊的通州，他們擔任駐防軍。天津重鎮河西務有「津門首驛」之稱，由巴恩斯中尉指揮的華勇營第四連，有 70 名華人官兵駐守河西務。巴恩斯利用士兵們華裔身分的優勢，對這個「京東第一鎮」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大力推行「軍民共建」。河西務比八國聯軍所有其他的駐地，更早地進行了戰後的恢復和重建。前文曾提及，華勇營在當地恢復了一個大的農貿集市，乃戰後最先恢復的市集。天氣好的時候，市集上的攤位排成兩大排，成百上千人進行交易。華勇營對市場秩序進行了有效的維護和監督。比如，酗酒的日本士兵被華勇營懲戒過兩次。第一次，華勇撕下他們的肩章，扣留軍帽；日軍馬

上派了一名翻譯前來道歉。第二次，一個日軍騎兵擾亂市場，被華勇撕下肩章、扣留軍帽。日軍派來翻譯道歉，被華勇營軍官趕了出去，要求日軍軍官親自前來認錯、道歉。日軍軍官聞訊前來，低頭認錯，誠懇道歉。再比如，曾有德國兵在集市的水果攤上想白拿梨和葡萄，華勇立刻出面干預，德國兵只有照價付錢。在收割的時節，華勇們得到指令，盡力勸說躲避戰亂的河西務農民回家收割莊稼，以避免戰後可能發生的饑荒，華勇們並爲他們提供保護。華勇們和當地民眾關係融洽，打成一片，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擁護。他們將華勇營駐守的地區當作「自己人」的地盤，以至有些村莊要求華勇營長期駐守，以防止土匪的騷擾和劫掠。華勇營的美名傳揚之下，有一個相隔幾十里的鎮子專門派了「龐大的代表團」，請求將他們的鎮子也納入華勇營的保護。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通州，在那裡駐防的華勇營第五連也得到當地民眾的信賴和依靠[515]。

華勇營士兵與當地民衆角力

華勇營士兵與民同樂

庚子之役，華勇營作戰英勇，屢建功勳。巴恩斯中尉在他的日記中這樣總結華勇營的戰績：「中國軍團遠征作戰次數比任何部隊都多。即使不算解決威海衛出現的麻煩，天津之戰有我們的份，解救北京有我們的份，以及 1900 年 8 月到獨流（獨流鎮是義和團的老巢，張德成在那裡設

立了「義和神團天下第一壇」——引者註），這些遠征都是我們幹的，沒有其他軍團參加。最後，華勇們從南門第一個衝進了天津的圍城，成爲最後總攻中占領天津城的英國軍隊的唯一代表。」[516]

華勇營在庚子戰爭中的傑出表現和卓越功績，得到了八國聯軍指揮部、各級英軍軍官以及英國國內主流媒體的一致讚揚。《泰晤士報》在1901 年的一篇評論中說：「無論將來如何，談及華勇營的積極戰鬥精神時，他們當然會擁有勇敢無畏的口碑。」《每日畫報》稱讚他們「極好地、甚至是無與倫比地完成了出色的、棘手的、有價值的工作」[517]。華勇們被讚譽爲「最優秀的士兵」，「吃苦耐勞」，「出色地完成了各種艱巨的任務」；其行爲「令人欽佩」[518]；「服從紀律和管理、很勇敢」，「是優秀的射手，幾乎百發百中」[519]。「大炮的精準度簡直不可思議」[520]；「不怎麼活潑，但是堅忍沉著，這同樣是非常了不起的價值。在戰場上看過他們表現的人的結論是，只要領導有方，他們可以做任何事」[521]。

華勇營戰功赫赫，貢獻良多，讚譽、嘉獎、授勛接踵而至。前文提到了一些他們獲得的榮譽。1902 年，12 名華勇營士兵被挑選出來，代表中國軍團到英國本土參加國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的加冕典禮；愛德華七世親自向華勇營士兵頒發了勳章。這是英國歷史上最早爲華人頒發的軍功勳章[522]。1904 年，威海衛的行政長官駱克哈特（James S. Lockhart）代表英國國王爲中國軍團士兵頒發了維多利亞勳章。

威海衛的行政長官駱克哈特為「中國軍團」士兵頒發維多利亞勳章

華勇營獲得的勳章、獎章，有一枚與軍功、戰績無關。庚子之役中，八月的一天，華勇營之一部從水路行進去換防，途中一名華勇不慎失足落水。當時已是深夜，水流十分湍急，該名士兵迅速被水吞沒，面臨滅頂之災。英國軍官惠泰克（Whittaker）奮不顧身，縱身跳進激流，救起了這名士兵。這種捨己救人的品德、愛兵如子的情懷，受到英國社會的高度評價和讚賞，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協會（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銅質獎章[523]。

庚子之役中，華勇營陣亡 22 人。其中英國上尉兩人，華裔士官兩人，士兵 18 人。另有 18 人受傷；傷者中英國少校軍官兩人（包括副總指揮），士官 1 人，華勇 15 人（由於英國軍官作戰時身先士卒，他們的傷亡率實際上遠高於士兵）[524]。1901 年 1 月，英國在威海衛碼頭勒石立碑，將華勇營陣亡官兵的姓名「勒之於石，以爲永遠記憶」（紀念碑碑文）。在「一將功成萬古枯」的中華傳統中，這恐怕是數千年歷史上唯一一塊爲普通士兵樹立的紀念碑。

威海衛「華勇營」陣亡官兵紀念碑

本文不擬對華勇營作全面的歷史評價。在庚子戰爭中，華勇營是執行緊急人道救援任務的國際聯軍的一部分。與清軍相比較，在戰場上，清軍潰不成軍，一敗塗地，華勇營勇敢善戰，屢建功勳；從道義上，清軍陷民於水火，華勇營解民於倒懸；在人格上，清軍官兵是皇家的奴才，華勇將士享有做人的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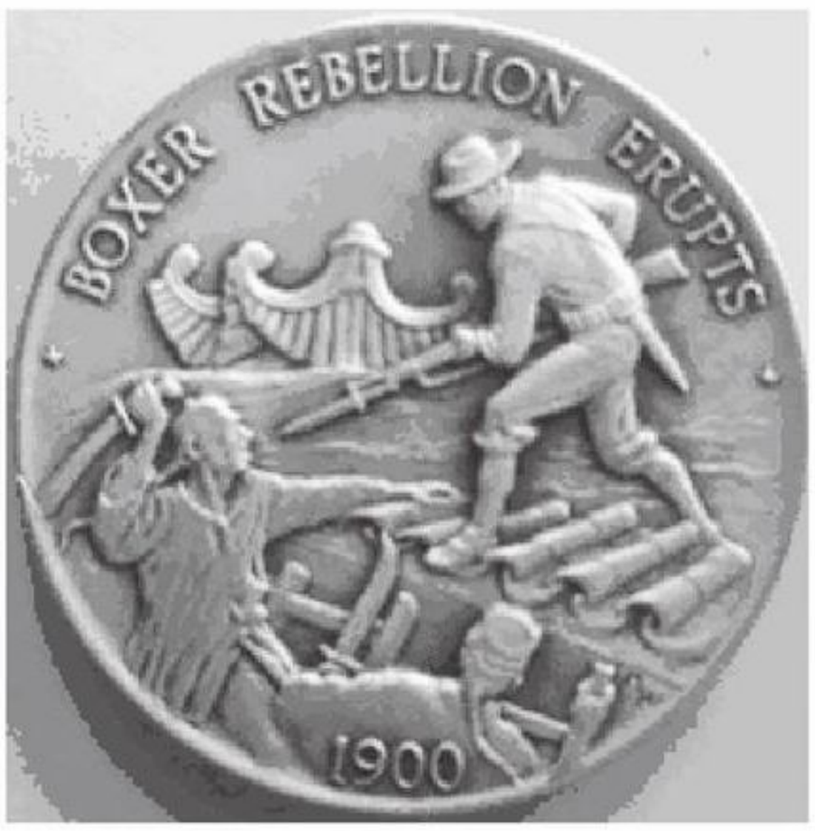
結語

綜觀歷史，庚子之亂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八國聯軍出兵之前，拳匪肇亂，兵連禍結；「殺戮西人，驅逐彼族」，「教民骨積如山，血流成渠」；「地方蹂躪，民生塗炭」[525]。不僅京津、華北等地區被破壞得滿目瘡痍，在滅洋、滅教的恐怖中，「各省風鶴頻驚，商務敗壞，市塵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幾無安枕之日」[526]。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解使、領館之圍，平息暴亂，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清廷的「滅洋」屠戮方告終結，社會才由亂入治。歷史清楚地表明，平息浩劫、解危紓難、人道救援，這是八國聯軍出師中國的唯一目的。如果說八國聯軍拯救了千千萬萬的外國人、華人基督徒和普通民眾，難道這不是明若觀火、千眞萬確的嗎？如果說八國聯軍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大反動，難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戰亂之中，聯軍對中國貧民、災民的救濟扶助和人道關懷，難能可貴。戰亂之後，聯軍把天津改造成爲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功績卓著。中國城鄉在戰爭中大量湧現的「帶路黨」，康有爲、孫中山等人對八國聯軍公開的支持和籲請，體現了人心的向背，粉碎了聯軍在中國燒殺淫掠的讕言。八國聯軍是人道救援的正義之師，這是全世界的公論。

中國婦女簞食壺漿，慰勞八國聯軍

庚子拳亂的浩劫結束之後，梁啟超曾經說過：「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527]。進入民國，陳獨秀在文章中也感歎過：「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528] 這是梁啟超、陳獨秀的杞人憂天，還是他們的先見之明？

八國聯軍頒發的獎章和紀念章



美國的銀質紀念章（正面）

美國的銀質紀念章（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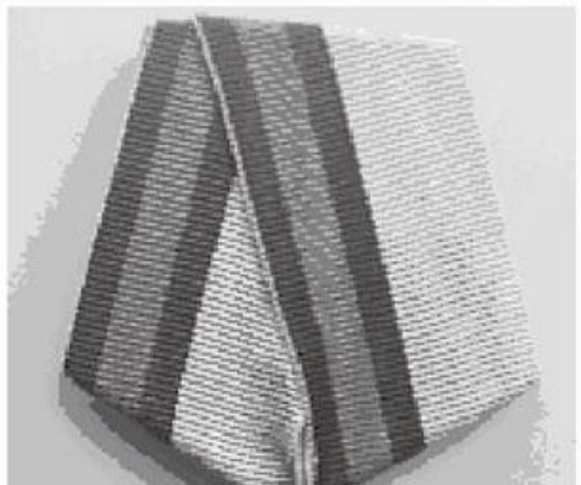
美軍的獎章之一

美軍的獎章之二

英軍的獎章

法軍的獎章

日軍的獎章



俄軍的獎章

義軍的獎章

奧匈帝國的獎章

德軍的銅質獎章

德軍的銀質獎章

附註

1. 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西方各國」、「西方列強」包括日本。日本既已「脫亞入歐」，稱之為西方國家似無大錯。
2. 沈祖憲：《養壽園奏議輯要》卷 2
3. 中華書局：《山東巡撫袁世凱摺》
4.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5. 《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
6.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7. 史料來源於王樹增：《1901》
8. 五月七日清廷上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
9. 左原篤介、漚隱輯：《拳事雜記》
10. 佚名：《天津一月記》
11. 柴萼：《庚辛紀事》
12.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3.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14. 柴萼：《庚辛紀事》
15. 蔡東藩：《清史演義》
16. 管鶴：《拳匪聞見錄》
17. 雷頤：《歷史的裂縫 ── 對歷史與人性的窺探》
18. 美國政府刊印的當時的外交文件
19. 北明：《出兵中國是被迫自衛》
20. 光緒帝：《罪己詔》1901 年 2 月 14 日
21. 洪壽山：《時事志略》
22. 《維基百科》「河北天主教」條目
23. 袁昶：《亂中日記殘稿》
24.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25. 荊棘冠冕：《中國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第四十七章「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26.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27.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28. 普特南 · 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29. 《百度百科》「義和團歌謠」

30.《義和團史料》上冊
31.《景善日記》
32.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3.胡思敬：《驢背集》
34.蔡東藩：《清史演義》
35.佚名：《天津一月記》
36.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7.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8.管鶴：《拳匪聞見錄》
39.《申報》1900 年 6 月 20 日
40.《維基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
41.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42.柴萼：《庚辛紀事》。殘殺杉山彬的兩個主兇庚子戰後安然無事
43.《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44.李希聖：《庚子國變記》；「董軍」即董福祥統領的甘軍
45.《義和團檔案史料》(上)
46.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47.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 義和團》；「宣戰照會」同時給了與各國公使熟絡的英人赫德
48.雷頤：《東南互保之怪象》
49.《景善日記》
50.《辛丑條約紀實》
51.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52.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3.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54.《景善日記》
55.《景善日記》
56.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57.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58.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59.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60.《學點清史八十七、東南互保》
61.雷頤：《東南互保之怪象》
62.劉鳳翰：《武衛軍》

63.《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64.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65.《百度百科》「武衛軍」條目
66.英國檔案《關於在天津附近武庫中所發現中國新式軍用物資報告單》
67.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68.鮮評：「馬克沁機槍威力巨大，為何李鴻章不願採購？真相來了，驚歎」
69.《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70.光緒帝：《罪己詔》1901 年 2 月 14 日
71.僑析生：《拳匪紀略》卷 1
72.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73.西里爾 · 珀爾：《北京的莫理循》
74.胡思敬：《驢背集》
75.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76.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
77.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78.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79.北堂被圍攻兩個多月，教民死 400 人，76 名兒童遇難；法、義士兵 15 人陣亡，指揮官、副指揮官殉職
80.《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81.《明騎西行記》：「八國聯軍時雙方交戰經過」
82.胡思敬：《國聞備乘》
83.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84.胡思敬：《驢背集》
85.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
86.胡思敬：《國聞備乘》
87.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88.《中國歷史紀事 —— 光緒二十六年》，《景善日記》
89.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90.仲芳氏：《庚子記事》
91.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92.《景善日記》，高陽：《慈禧全傳》
93.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94.《辛丑條約》第二款
95.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96.《維基百科》「清末新政」條目
97.馬勇：《清末新政開啟了中國現代司法改革之門》
98.馬勇：「晚清改革符合國際趨勢 中國人要容忍不完美」，2011-07-23 鳳凰網歷史
99.楊天石：《海外訪史錄》
100.《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101.《維基百科》「東南互保」條目
102.北明：「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一)」
103.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104.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105.苑書義：《李鴻章傳》
106.根據《辛丑條約》第二款，載漪應「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減免」；但實際上他隱居在西安，十幾年後即獲自由。
107.《辛丑條約》第二款
108.《維基百科》「董福祥」條目
109.御林軍軍官恩海刺殺德國公使後，被獎賞和提拔。庚子戰後他本來安然無事。當他在當舖出售他劫奪的克林德的銀表時，被日本在京的偵探發現，據此追查出他是殺害克林德的兇手，遂被抓捕。
110.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11.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 , 結與國之歡心』，不是賣國，是減損」
112.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113.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14.佐原篤介、溫隱輯：《拳亂紀聞》
115.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16.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117.騰訊新聞：「為何晚清的財政收入，是康乾盛世時的 10 倍，卻還是迅速垮台了？」
118.【文史】「晚清海關：廉政竟靠洋人來辦」
119.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120.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121.瓦德西 1901 年 1 月 3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22.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不是賣國，是減損」
123.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新解」
124.馬勇：「知識分子要引導人民容忍漸進變革」
125.《百度百科》「納依條約」條目
126.《維基百科》「凡爾賽條約」條目

127.《庚子見聞錄》，《近代史資料》
128.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129.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130.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1.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32.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五
133.瓦德西 1900 年 12 月 9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34.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5.《百度百科》「庚子賠款」條目
136.張鳴：《義和團運動（續）》
137.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諭（西曆 1901 年 2 月 14 日）
138.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139.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140.史料來源於《維基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以及著名作家、清史專家高陽的《慈禧全傳》
141.左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142.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143.荊棘冠冕：《中國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第四十七章「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144.李杕：《拳禍記》下，「景州朱家河教難」
145.威廉 • 亨特：《天朝拾遺錄 ── 庚子事變》
146.包士傑：《拳時北京教友致命》，1920 年版
147.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148.《維基百科》「太原教案」條目，史料來源於羅惇曧的《拳變余聞》
149.《景善日記》
150.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51.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52.羅惇曧：《拳變余聞》
153.史料來源於《維基百科》「太原教案」條目
154.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55.李杕：《拳禍記》
156.「義和團事件史料一窺」
157.互聯網檔案館的存檔：「南關天主教堂」，瀋陽民族宗教
158.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 14 章
159. ZIRCON：《宣教士與中國》

160. 神州傳播協會《宣教士》第二集：落地
161. 王澤民：「義和團和清廷的大屠殺」
162.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63. 柴萼：《庚辛紀事》
164.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6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
166. 羅惇曧：《拳變余聞》
167. 胡思敬：《驢背集》
168. 胡思敬：《驢背集》
169. 戴玄之：《義和團研究》
170.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
17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172. 白馬嘯西風：「愛國還是誤國？揭祕義和團的歷史真相」
173. 阿英：《義和團文藝選輯》
17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175. 張黎輝輯：《義和團運動散記》
176. 柴萼：《庚辛紀事》
177.《百度百科》「義和團歌謠」
178.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179.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180. 孫越：《一九〇〇年：血戰北館紀實》
181. 僑析生：《拳匪紀略》卷 5
182.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183. 黎仁凱主編：《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
184.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
185.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186. 管鶴：《拳匪聞見錄》
187. 仲芳氏：《庚子記事》
188. 仲芳氏：《庚子記事》
189. 楊慕時輯：《庚子剿匪電文錄》
190.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191. 佚名：《綜論義和團》
192. 柴萼：《庚辛紀事》
193. 朱壽彭：《安樂康平室隨筆》

194.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195.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196. 仲芳氏：《庚子記事》
197. 徐緒典主編：《義和團運動時期報刊資料選編》
198. 左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199. 仲芳氏：《庚子記事》
200. 林紓：《京華碧血錄》
201. 普特南 · 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202. 林紓：《京華碧血錄》
203.「穩定行市事上諭」，《史料續編》
20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05.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206.《逆流而動，禍亂中華 ── 重評義和團運動》
20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08. 仲芳氏：《庚子記事》
209. 邢超：《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真相》
210. 蔡東藩：《清史演義》
211.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212.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
213. 羅惇曧：《拳變餘聞》
214. 陸士諤：《清朝祕史》
215.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216.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217. 仲芳氏：《庚子記事》
218.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箚》
219.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220.《義和團檔案史料》(上)
221. 佚名：《天津一月記》
222. 秦暉：《關於義和團》
223. 佚名：《天津一月記》
224. 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
225. 陸士諤：《清朝祕史》
226.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
227. 仲芳氏：《庚子紀事》

228. 管鶴：《拳匪見聞錄》
229. 梁啟超：《革命駁議》
230. 嚴復 1902 年發表於《大公報》的「主客平議」
231.《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32.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233.《維基百科》「湯若望」條目
234. 康熙諭祭湯若望
235.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236.《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37.《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38.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39.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40.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241. 王守禮：「邊疆公教社會事業」，北平，上智編譯館
242.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43.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44.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45.《維基百科》「土山灣孤兒院」條目
246. 史式徽神父：《土山灣孤兒院：歷史與現狀》
247. 黑門：「被汙名的西方傳教士：是危害還是陌生的愛？」
248.《維基百科》「土山灣孤兒院」條目
249. 江繼蘭：「上海土山灣孤兒院的藝術教育」
250. 江繼蘭：「上海土山灣孤兒院的藝術教育」
251.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52. 本段落中的引文出自周秋光的「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53. 水母網：「煙臺的中國之最：中國最早的聾啞學校 —— 啟喑學館」
254. 史料來自周秋光著「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55.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56. 周秋光：「近代西方教會在華慈善事業述論」
257. 楊愛程：「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貢獻 (上)」
258. 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梁家麟
259. 楊愛程：「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貢獻 (上)」
260.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
261. 陳上宇：「西方宣教士對中國教育的歷史貢獻」

262.《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63.佳和傳媒：「中國人為什麼要過『聖誕節』？」
264.簡・亨特：《文雅的福音》
265.金鑫：「默認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
266.《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67.楊愛程：「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貢獻（上）」
268.楊愛程：「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貢獻（中）」
269.「可惜！那些蜚聲世界卻黯然消失的民國一流大學」
270.楊愛程：「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貢獻（上）」
271.《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72.楠瓜溪水旁：「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告訴你真相（附真實照片）」
273.小韓：「國民政府時期助產士的出現及其發展演變」
274.神州傳播協會《宣教士》第二集：落地
275.楠瓜溪水旁：「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告訴你真相（附真實照片）」
276.《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77.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 —— 梁家麟
278. ZIRCON：《宣教士與中國》
279.劉家峰：「福音、醫學與政治：近代中國的麻風救治」
280.楊愛程：「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貢獻（上）」
281.劉家峰：「福音、醫學與政治：近代中國的麻風救治」
282.《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83.《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84.《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85.《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86.陳恭祿：《中國近代史》
287.陳恭祿：《中國近代史》
288.神州傳播協會《宣教士》第一集：叩門
289.《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百度百科》「理雅各」條目
290.蘆選主編：「紀念白求恩的先驅李提摩太（二）」
291.《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92.《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93.《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294.《維基百科》「廣學會」條目
295. Messianic Jewish：「簡述近代基督教宣教士對中國的貢獻」

296. 張鳴：《義和團運動 (續)》
297. 張鳴：《義和團運動 (續)》
29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9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300. 國際大使命教會：「戴德生牧師的故事」
301.《維基百科》：「戴德生」條目
302. BBCChinese.com：「教皇在梵蒂岡加封中國聖徒」
303.《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304.《照錄與總稅務司赫德問答節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
30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06.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07. 許指嚴：《十葉野聞》
308.《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309.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1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311.《吏部尚書徐郙等奏報洋人入都十餘日都城近日情形折》，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彙編》第 2 冊
312.《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313.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314. 瓦德西 1900 年 11 月 25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15.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16.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17. 瓦德西 1900 年 12 月 27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18. 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
319. 杜某：《庚子日記》，《義和團史料》下冊
320.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321.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22. 瓦德西 1901 年 2 月 12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23.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24. 瓦德西 1900 年 11 月 12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25.《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戰史》，《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彙編 • 日譯文卷》
326. 陸士諤：《清朝祕史》
327. 胡思敬：《驢背集》
328.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29. 瓦德西 1900 年 11 月 12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3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331. 北明：重審八國聯軍中的美國 (22)—— 附篇：「聯軍無擾紫禁城」
332.《百度百科》「兩宮迴鑾」
333. 耿寶昌：「不要為了仇視帝國主義而胡編亂造！」
334. 同治十二年（1873 年）內務府關於圓明園的報告
335.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事雜記》
336.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37.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
338.《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339.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34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341. 佚名：《天津一月記》
342. 瓦德西 1900 年 12 月 27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43. 瓦德西 1900 年 12 月 28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44. 許指嚴：《十葉野聞》
345. 瓦德西 1900 年 10 月 5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46. 瓦德西 1900 年 10 月 5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47. 許指嚴：《十葉野聞》
348.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349. 陸建德：「賽金花的故事：關於腐敗的想像」
350.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351.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35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353.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354.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355.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356.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357.《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學警察、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358.《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35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360. 瓦德西 1900 年 11 月 20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61. David Silbey: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拳民暴亂與中國

的大博弈》）
362. James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363. James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364.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365. 網易歷史
366.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367.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368.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369.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70.《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371. 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
372.《瓦德西拳亂筆記》，瓦德西 1900 年 10 月 22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73.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74.《維基百科》「柴五郎」條目
375. 寶復禮：《京津隨軍記》
376. 蘆笛：《刺刀逼著蓋起來的廁所》
377. Franz-Stefan Gady: “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378.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
379.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380.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81.《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382.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383. 瓦德西 1900 年 11 月 25 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38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385.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386.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二十段「日本出告示」
387.《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學警察、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388.《紐約時報》1901 年 2 月 10 日
389. 佚名：《天津一月記》
39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91.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
392. James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393.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394. 錢文軍：「義和團戰爭之感歎」
395.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96.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397.《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398.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399. 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400. David Silbey: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拳民暴亂與中國的大博弈》）
401.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第三章
402.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事雜記》
403.《維基百科》"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條目
404.《互動百科》「馬克・吐溫」條目
405.《北美評論》1901 年 4 月號，馬克・吐溫："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406.《維基百科》"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 條目
407.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08. James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409. James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410. James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411.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12. Harrison Wilson: *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413.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
414.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415. Franz-Stefan Gady: "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416. Franz-Stefan Gady: "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417.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18.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19. Franz-Stefan Gady: "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420.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21.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22.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23.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24. 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Rockhill）1901 年 11 月 30 日寫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匯報談判情況的信
425. William C. Harlow: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26.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427. Franz-Stefan Gady: "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428. 本文中關於天津臨時政府的施政，史料主要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429.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430.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第 2 項，1900 年 12 月 12 日
431. 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432. 儲仁遜《聞見錄》
433.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 118 次會議，1901 年 3 月 13 日
434.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 293 次會議，1902 年 5 月 12 日
435. 儲仁遜《聞見錄》
436. 張鳴：「太監的醬缸動不得」
437.《鳳凰大視野》「義和團事件始末」
438. 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439. 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440. 仲芳氏：《庚子紀事》
441.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一段「清淨街道」
442.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八段「有職無俸」
443. 劉海巖：「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444.《維基百科》「1894 年香港鼠疫」條目
445.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446. David Silbey: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拳民暴亂與中國的大博弈》）
44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448. David Silbey: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拳民暴亂與中國

的大博弈》）
44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450.《齊如山回憶錄》
451.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事雜記》
452.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453.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454. 狄平子：《庚子紀事》
455. 光緒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一
456. 孔祥吉：「鎮壓義和團後清政府獎勵日本官兵」
457. 胡思敬：《驢背集》
458.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459.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460.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461.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
462. 惲毓鼎：《庚子日記》
463.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464. Sarah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中國來鴻》）
465. 蔡東藩：《清史演義》
466. 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 —— 以京官動向為中心」
467.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468.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469.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470.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471.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事雜記》
472.《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學警察、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473. Martin Miller: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74.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三十三段「感德報恩」
475. 佚名：《天津一月記》
476. 寶復禮：《京津隨軍記》
477. 寶復禮：《京津隨軍記》
478. 佐原篤介、漚隱輯：《拳亂紀聞》
479. 史料來源於王樹增的《1901》
480. 德米特里・揚切韋次基：《八國聯軍目擊記》
481. 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 —— 以京官動向為中心」

482. 邢超：《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真相》第四章 哭泣的古都
483.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484. 張延襄：《不遠復齋見聞雜誌》
485. 邢超：《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真相》第四章 哭泣的古都
486. 邢超：《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真相》第四章 哭泣的古都
487. Extract from the Diary of the Railway Staff Officer Peking, 26 Nov.1901
488.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489. "Military Report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ependency of Wei-Hai-Wei (1904)"，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490.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491. "Military Report (1904)」，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492. 轉引自 Ian Hill Nish, "The Royal Navy and The Taking of Weihaiwei, 1898-1905"
493.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494. 維奇 · 蘭德爾：《中國與聯軍》
495.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496.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497.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498.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499.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00.「【威海衛】殖民歲月 ──『以華制華』華勇營（二）」
501.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02.「【威海衛】殖民歲月 ──『以華制華』華勇營（二）」
503. 中華遺產雜誌：「『華勇營』：八國聯軍裡的中國軍團」
504.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05.「【威海衛】殖民歲月 ──『以華制華』華勇營（二）」
506.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07.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508. "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s at weihaiwei"，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509.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10. "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s at weihaiwei"，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511.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
512.「【威海衛】殖民歲月 ──『以華制華』華勇營（二）」
513.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14.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15.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16.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17. *The Daily Graphic*, 12 Jan, 1901
518. *Manchester Courier*, 9 May, 1900
519.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20. *Daily Mail*, 11 July, 1900
521.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4 Sep, 1900
522. 雪珥：「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
523.「皇家人道協會」第 31195 號事例
524. Arthur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525. 清廷上諭，《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526.《申報》1900 年 10 月 2 日社論
52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 文集》之五
528. 陳獨秀：《獨秀文存》卷一

History 068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作　　者—劉淇昆
主　　編—李國祥
企　　畫—吳儒芳
總 編 輯—胡金倫
董 事 長—趙政岷
出 版 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19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眞—（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 10899臺北華江橋郵局第99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genre@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絃億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定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成立於一九七五年，並於一九九九年股票上櫃公開發行。
於二〇〇八年脫離中時集團非屬旺中，以「尊重智慧與創意的文化事業」爲信念。

八國聯軍是什麼？餓的話每日熬一鷹？
慈禧跟義和團是合作關係還是彼此利用？
是境外政治勢力介入想遏制中國崛起？
世世代代的中國人要銘記在心、勿忘國恥？
最後結果是中國人輸了還是滿清輸了？

想像一下，如果你生活在1900年的北京，
你會遇到腐敗的朝廷、沉重的賦稅、殘暴的義和拳……
最後是八國聯軍救了你？！

★其實，中國沒有正式對列強宣戰，列強也沒有對中國宣戰。

★其實，八國聯軍是一場救援行動，而不是侵略行為。

★其實，當時的中國百姓大多感謝八國聯軍的占領行動。

★其實，辛丑條約不是戰爭的和約，而是賠償的合約。

★其實，八國聯軍間接導致了共和中國的最終誕生。

在教科書裡，八國聯軍歷來被描述為西方列強欺凌清末軟弱中國的一項具體事證，然而實際上卻是一支因為人道危機而不得不興的仁義之師。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解使領館之圍，平息暴亂，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清廷的「滅洋」屠戮方告終結，社會才由亂入治。歷史清楚地表明，平息浩劫、解危紓難、人道救援，這是八國聯軍出師中國的唯一目的。

時報悅讀網
VL00068　NT$380